礼乐人生

庙堂宗的君子风范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礼乐人生前言
- 第2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
- 第3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2)
- 第4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3)
- 第5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4)
- 第6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5)
- 第7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6)
- 第8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7)
- 第9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8)
- 第10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9)
- 第11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0)
- 第12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1)
- 第13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2)
- 第14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3)
- 第15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4)
- 第16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5)
- 第17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6)
- 第18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7)
- 第19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8)
- 第20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9)
- 第21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20)
- 第22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
- 第23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2)
- 第24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3)
- 第25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4)
- 第26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5)
- 第27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6)
- 第28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7)
- 第29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8)
- 第30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9)

- 第31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0)
- 第32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1)
- 第33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2)
- 第34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3)
- 第35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4)
- 第36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5)
- 第37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6)
- 第38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7)
- 第39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8)
- 第40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9)
- 第41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20)
- 第42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21)
- 第43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22)
- 第44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23)
- 第45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24)
- 第46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1)
- 第47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2)
- 第48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3)
- 第49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4)
- 第50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5)
- 第51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6)
- 第52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7)
- 第53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8)
- 第54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9)
- 第55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10)
- 第56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11)
- 第57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12)
- 第58节：礼仪践行与古礼寻访(1)
- 第59节：礼仪践行与古礼寻访(2)
- 第60节：礼仪践行与古礼寻访(3)
- 第61节：礼仪践行与古礼寻访(4)
- 第62节：礼仪践行与古礼寻访(5)
- 第63节：礼仪践行与古礼寻访(6)
- 第64节：礼仪践行与古礼寻访(7)

第1节：礼乐人生前言

礼乐人生前言

中华是礼仪之邦，中华传统是礼乐文化，这曾经作为一种常识，印入每一位华人的心田。

中国古代礼学有三部经典：《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它们是中华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研究礼学不能不从这里起步。

我与传统礼学结缘，始于做研究生的年代，业师赵奉生（讳光贤）先生指定我以《周礼》的成书年代为主题做博士论文。《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自来以古奥难读而著称。但在三读之后，发现它既有丰富的治国理念，也不乏周密的管理措施。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赞美它是从黄帝、颛顼，直到周武王的八代典制精华之集粹，绝非溢美之词。历代学者每每用“体大思精”这四个字来评价它。这是一个博大的世界。

毕业后，我开始研究《仪礼》，它是以人生礼仪为主的先秦仪轨的集锦，一共有十七篇。所谓人生礼仪，是指从成年、结婚，一直到丧葬、祭祀的许多礼仪。除此之外，还有某些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礼仪以及一些贵族的礼仪。人的一生涵泳在礼乐之中，揖让周旋，诗歌唱和，变化气质，涵养德性，其乐融融。这是一个典雅的世界。

之后，我又开始研究《礼记》，这是孔门七十子探讨礼学思想的文集，一共有四十九篇。书中既有对礼义的阐发，又有对礼节的点评；既有对人生的感悟，又有对道的体味。说理雄辩，论道精微，而且多睿语与警句，美不胜收。书中有许多流传千古的典故，抚今追昔，令人遐思万端。这是一个深邃的世界。

“三礼”之学，历来以繁难著称，研究者不绝如缕，寥若晨星。从我研究《周礼》开始，就进入了一种近乎孤寂的氛围。我被周围的师友告知：这是一门冷学问，而且注定不可能成为“显学”。媒体也偶尔

会出现关于“三礼”之学可能要成为“绝学”的感叹。这对于我个人而言并没有什么关系。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读书的欲望源于自身的精神需求，只要自己觉得心安理得，再寂寞的学问也是可以做得下去的。但是，“三礼”的妙旨奥蕴、儒家的高超智慧不能成为大众的财富，则是全社会的莫大损失。我每每扼腕长叹：这是何等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长久的疏离之后，礼乐文化正在淡出人们的记忆，虽然耳熟能详，却是依稀仿佛，不知所云。礼乐文化是怎么来的？它的学理又是怎样的？礼乐文化对于人的成长能有什么裨益？它与现代社会能否兼容？这些重要的问题，似乎很少有人理会。

正在山穷水尽之时，2008年北京奥运申办成功，使得礼学的境遇出现重大转机。由于政府把“人文奥运”作为北京奥运的三大目标之一，于是，举国上下都开始关注公众的文明程度。人们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现：大众层面礼仪文明的缺失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随着北京奥运的日益临近，人们无不为这一现状感到焦虑，进而意识到要呼唤中华礼仪文明。这应了一句古话，叫做“天不灭斯文”！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我应一些媒体和学校、机关之邀，就中华礼乐文化的主题做讲演。听众的反应之热烈令我深受感动。但我深知，这并不是我的演讲有多高的水准，而是礼乐文化自身的魅力所致。我由此看到了礼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需求。

其实，我们无论是否举办北京奥运，中华礼仪文明都是要振兴的，因为它既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是我们未来的文明标志。北京奥运的历史功绩之一是给了全国人民回归中华礼仪文明的契机，并且给了我们强大的动力。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中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同时崛起，是物质和精神的同时发皇，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伟大复兴。而每一位有志于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公民，尤其是青年朋友，都可以从礼乐文化中得到智慧和启迪。这就是本书试图告诉读者朋友的。

彭林

2006年3月2日于清华园寓所

第2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

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

礼乐人生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

文明的进步与礼乐的边缘化这里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第二个是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第三个是儒家礼学思想的边缘化。

关于周公“制礼作乐”

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那么，这个礼仪之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司母戊大方鼎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追溯到周公，就是西周的开国之初。周公对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制礼作乐”。

商朝是我们中原地区一个以青铜文明著称的强大王朝。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许许多多最精美、最雄伟的青铜器几乎都是商朝四羊方尊的，最著名的如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但是，这个朝代是一个跛足的巨人，它的物质文明非常发达，但是它在精神上却是一个侏儒。近百年以来，安阳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大多是商王占卜的记录。他事无大小都要占卜，真所谓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明天天气好不好，昨天做了一个什么梦，乃至他配偶要生孩子了等等，统统都要占卜。商王非常迷信鬼神，迷信天命，认为他执掌这个国家是出自天命，谁都奈何他不得。另外他还非常残暴，商朝有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叫做“人殉”和“人祭”。所谓“人殉”，就是拿活人去殉葬，一个商王死了以后，要拿几百人去殉葬，这种现象我们今天在殷墟可以清楚地见到。所谓“人祭”，就是拿活人做祭品，商王祭祀用的供品，不仅用牛羊，而且用活人，非常野蛮和残忍。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商朝统治者非常不得人心。到了商纣王的时候，民众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点。

当时的周不过是偏处于西北地区的一个小国，它的国力跟商是不能比的，但是周文王懂得要用“德”来收揽人心，所以许许多多小国都

愿意归附它，希望跟随它去跟商王朝做最后的决战。大家知道，在“牧野之战”的时候，商王调集了七十万人上阵，结果是前途倒戈，士兵周公像

在阵前起义了。这场战争，只用了一个早晨的时间就结束了。一个国力那么强大的帝国，就像纸糊的房子一样，说倒就倒了。

这样一个局面，让武王和周公感到非常震惊，简直不能相信。《史记?周本纪》上面记载，晚上两个人都睡不着，就在一起讨论这件事，研究怎样才能避免重蹈殷人的覆辙，怎样才能长治久安。由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看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所以意识到今后的统治政策不能再信什么天命，而要重视民心的向背，要考虑到民众的感受。周公在发表的一系列文诰中，反反复复谈到这一点，比如他在《酒诰》中引用先人的话，“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古人把镜子叫“鉴”，我们常说以人为鉴、以史为鉴、以铜为鉴，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不要拿水当镜子，应该以民为鉴，要把老百姓的反应当作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一面镜子。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后来成为我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的一个主旋律。我们看《左传》《国语》《孟子》《荀子》以及后代的文献，有关的论述非常之多，真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殷人很相信天，认为天就是鬼神；周人也讲天，但他们把鬼神置换成了“民”，他们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样一来，民心和天意就基本上画了等号。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都是源于周公的这个思想。所以说，古代中国在殷周革命的过程当中，实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转变。

这样一个转变，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清华的前辈王国维先生有一个代表作叫《殷周制度论》。他在《殷周制度论》里面一开头就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他认为，周公改革政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道德之团体”，要用道德把贵族、平民和

其他的人维系起来。为了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周公制定了一整套礼乐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制礼作乐，使得我们中国实现了由鬼道向人道的伟大飞跃，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不可等闲视之。

第3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2)

经常有同学问我："古希腊的神话非常灿烂、非常丰富，我们中国的神话却是很贫乏、很单调，这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他们说，这恰恰是我们值得自豪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古希腊一直到我们的战国时代才走出神话时代，进入人本主义时代，在此之前，它还生活在神的阴影之下。也就是说，他们的神话时代要比我们长几个世纪，他们的神话当然要比我们的灿烂。可是，我们中国在西周的时候已经进入了"人本主义"的时代。所以，在全世界范围，我们中国是最早出现民本主义思想的地区之一，而且有着非常成熟的思想体系。

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把周公"制礼作乐"的来龙去脉给大家作了简要的介绍，为的是说明我们这个礼仪之邦是从周公开始的。

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

周公要求执政者懂得尊重人，哪怕是一个小民、是一个鳏寡之人，都不要欺侮他，身份更高的人当然就不用说了。那么，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自身又应该如何处世，怎样才能被他人所尊重呢？也就是说，人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才能成为受他人尊重的人，对不对？所以，作为一个政府来讲，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提升人民的道德水准，而不仅仅是要把经济搞好。如果经济上去了，而人的精神面貌非常之差，那这社会是不能进步的，甚至要灭亡的。商朝的灭亡就是一个教训。

大凡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思想家，在推出他改造社会的理论体系或者方案的时候，他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这套理论怎样最大限度地切合人自身的特点。这个切合点找得越准，他那套理论的效果就越好。道家认为人都不希望别人约束，喜欢放任自流，所以主张"无为而治"。法家认为人都害怕刑法，所以主张一切问题都用"法"来解决。儒家认为，人是有丰富情感的动物，因此，所用的政策都要从顺应人性出发。

1995年，湖北荆门郭店乡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楚国的儒家文献，由于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称为“郭店楚简”。大家知道，在早期儒学中，孔子的孙子子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相传今本《礼记》里的《中庸》《缁衣》《表记》《坊记》等四篇就是他作的。这四篇文章对思想界的影响非常之大，尤其是《中庸》。它们原本收录在《子思子》一书中。大约在隋唐时期，《子思子》就亡佚了。因此，后世的学者大多不太相信子思作《中庸》的说法，认为是出于汉儒之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郭店楚简中居然就有与今本几乎相同的《缁衣》篇，此外，还有一篇《性自命出》，内容和文句与《中庸》颇多雷同，其他各篇与子思学派的思想也如出一辙，因此学者大多认为它们就是《子思子》的佚篇。

郭店楚简里有许多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儒家礼乐思想。例如，其中有一篇说到，圣人治理人民，就一定会顺从“民之道”。为什么呢？他说大禹治水为什么能成功？是因为他遵循了“水之道”；秦人的祖先造父，非常善于养马，这在《史记?秦本纪》里有明确的记载。造父为什么能把马养得很好呢？是因为他懂得“马之道”；周人的祖先叫后稷，种地种得非常好，原因何在呢？是因为他熟知“地之道”。所以，郭店楚简说“莫不有道”，就是说，你要想做好一件事情，首先要了解这个对象它有什么特点、什么规律。“水之道”、“马之道”、“地之道”，都是自然赋予它们的一些规律和特点，属于今人所说的“客观规律”之类。这种东西你没法抛弃它，而只能顺应它。那么，所谓的“人之道”又是什么呢？郭店楚简说，人之道就是人性。人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不学而能、不教而有的天性。具体来说，是指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儒家认为，统治者要想长治久安，就一定要尊重、要顺从人的这种“性”。

人性原本深藏于我们的生命体内，无所偏颇。但是，当外物影响你的时候，你就会做出反应：是喜还是怒？是哀还是乐？等等。性一旦表露出来，就称为“情”了。儒家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

不喜欢的东西就不要强加于他人，因为“四海之内，其性一也”，人性是通的。你不喜欢饥饿，就不要让别人饥饿；你不喜欢战争，就不要把别人推入战争。你喜欢的东西老百姓也同样喜欢，所以要“天下同乐”。从商朝的把人不当人，到周公提出要尊重人，再到儒家提出要尊重人性，这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不仅要把人当人，而且要尊重他的喜怒哀乐，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非常不简单。

第4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3)

说到这里，好像很简单，儒家要求执政者懂得尊重人性，不是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吗？其实这仅仅是一个前提，只说了一半，而且是非本质的一半。为什么？因为人性它有弱点。人跟动物一样，是从动物界来的，动物性与人性，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许多从动物身上见到的那种不好的动物性，其实在人性上都有，比方说贪婪、残暴、争斗、不守秩序等等，这些东西人身上也有。

因此，如果过分地强调人性得自天命，过分地强调它的合理性，不许对它有半点限制，那就是将人性等同于动物性。道家就是这样。儒家认为人性不能放纵，人是动物的灵长，人应该对自己的性情有所把握。有些人很欣赏“性情中人”，我说这要看什么场合。如果过分强调个人的性情，不适当地张扬它，只要是我的真性情，我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那这个社会非乱套不可。举个例子来说，拳王泰森，他跟人家争论起来急了，就把对方的耳朵给咬了。类似的情况，《水浒传》上也有，叫做“一时性起”。像马加爵也是“一时性起”，好家伙，拿榔头一气砸死了好几个人。如果人人如此，这社会非大乱不可。所以儒家认为，人的性情是要用理智来把握的。

那么，人性要把握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话，叫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人的性情要有一个度，要达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这样一种境界。子思的《中庸》，我想很多同学都读过，《中庸》开头有一句话叫“天命之谓性”，什么叫“性”呢？天赋予你的就叫“性”。《中庸》接着说“率性之谓道”，“率”就是沿着，沿着人性去治理民众，庶几乎就是治民之道了，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中庸》又说：“修道之谓教。”人性有天生的弱点，任何人不可能生下来的时候，他的人性就是不偏不倚，而且一辈子都不偏不倚，这不可能。所以要通过“教”来修正人性，这个教就是教育。而教育的手段就是“礼”和“乐”。《礼记》说“礼缘情而作”，意思是说礼是

从人的情感出发来制定的。但礼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为目标的，《礼记》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孔子有一位高足叫做子游，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孔子曾经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来赞扬他的十位最杰出的弟子，人称孔门十哲，后世在孔庙里受到配享，其中文学一科是子思和子夏。孔子还有一位学生叫做有子，“子”是那个时候对人的尊称。有一天，子游和有子在街上闲步，看到一个小孩跟他父母走丢失了，这小孩就痛哭。这个时候有子就借题发挥了，他对子游说：你看你看，孩子一旦见不到父母了，他那种悲伤，又是跺脚，又是哭，又是喊，人性就应该像这样，不要约束他，让他去发泄。可是在丧礼里面，对于“踊”（就是跳脚）却是有限制的，每次只能跳三次，称为一踊；最多只能三踊。在你踊的时候，旁边会有人告诉你：要节哀。有子说到这里，就诘问子游：“为什么要叫人家节哀呢？父母死了，伤心的程度要比这孩子与父母一时走失严重得多，应该由着孝子去尽性情发泄悲痛嘛，这才是正道。”有子觉得自己讲得很有道理，他说准备要把丧礼里面关于踊的规定都给去掉。子游是大儒，识见要比有子高深得多，他听了微微一笑，说“此戎狄之道也”。“戎狄”，是指古代的少数民族，那时文化不太发达，所以还不大懂得礼的要旨。子游接着说：“礼道不然。”“礼道”教育大家不能以死伤身。假如是父母刚死，你不能节哀顺变，悲伤过度，把你哀恸之情尽情地宣泄，结果呢，以死伤身，那边刚死了一个，丧事还没办完，这里又死了人了。这难道是死者愿意看到的吗？所以要节哀，这个“节”，就是节制，“礼”的作用，就是节制你的情感的。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人，父母去世了，他毫无悲伤之心，不念父母之恩，那怎么办？古代为什么死了人以后要穿丧服？这是礼的规定，你必须得穿，目的是要提升你内心的悲伤之情。你早晨起来一看，怎么穿这衣服？一想，原来是自己有热孝在身。每天看到这个丧服，你就会想起老人家生前对于你的种种慈爱，对于你的抚养。因为你对父

母的情感达不到常人应有的程度，所以要以此来提升它。而对于悲伤过度的，则要把它降下去，不能以死伤生。悲痛达不到的，要把它提升起来。你父母死了，应该要有悲伤的，不能这样无所谓。目的就是让人的心情要达到合于礼的境界。《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是说，在受到外物的影响之前，喜怒哀乐没有偏向，处在中立的状态。一旦受到外物的作用，喜怒哀乐被诱发出来时，都能恰到好处、合于道的要求，这就是"和"的境界了，和是天下最大的"道"。所以，人的情感不能大喜、大悲、暴怒，也不能怠惰、懦弱、无情，要力求进入"大中至正"之域，这样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文明时代的人、一个脱离了动物境界的人。

第5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4)

所以说，这个“礼”是规范你的行为的。有同学问，你不是说“礼乐教化”吗？你光讲了礼，还有乐呢？好的，现在我就来谈一谈儒家的音乐思想。

音乐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许多民族在新石器时代就掌握了音乐的原理，能够演唱歌曲。对于绝大多数民族而言，音乐是娱乐的工具，自娱或者群娱；而中国却将音乐作为教化的工具，而且是教化的最高形式，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要了解儒家的音乐思想，必须了解《礼记?乐记》阐述过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乐为心声，二是声、音、乐三分的理论。

所谓“乐为心声”，是说乐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情感之声。人的快乐，是“情动于中”的结果。某件事情感动我了，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说“好啊！”就会“形于言”。如果我觉得这样还不足以表达我的情，“言之不足”，就要“嗟叹之”，“好啊，唉呀！”如果嗟叹之仍然不足，我就会“咏歌之”，想用唱歌来表达内心的兴奋。如果觉得“咏歌之”还是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就会不知不觉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高兴得手舞足蹈。所以说“乐”是表达人类感情的方式之一。

那么，什么是声、音、乐三分呢？自然界有各种各样的自然声响，刮风、打雷、物与物相互撞击，都可以发出响声，还有人的叫喊声，只要是有感觉器官的动物，都能感知这种响声。这种响声没有节奏，没有审美价值，杂乱无章，儒家称之为“声”，实际上是一种噪声。人比动物高明在哪里呢？人能够从自然界众多的声中找出规律，找到它的音阶，1234567，而且发现这个音阶可以组成旋律，这个旋律又可以配合成声调，声调和旋律的不同组合，可以变成风格各异的乐曲，用来表达不同的情感。儒家把这种有节奏、有旋律、有审美情趣的乐曲称为“音”，它相当于今天人们所说的“音乐”。这是人比动物高明的地方，所以《礼记?乐记》上讲“禽兽知声而不知音”。

人类创作的“音”丰富多彩，那么大家知道，在我们当今这个世界上，音乐的风格是非常非常多的，“摇滚”、“重金属”、抒情歌曲、古典音乐、流行歌曲等等，这些不同风格的乐曲给人的心灵带来的感受是千差万别的。有的歌曲能够让你疯狂，你听久了就要疯狂；有的音乐听久了能让你消沉，让你颓废；也有的音乐能够让你向上，催你进取；等等。我想，这个道理不用我多说，大家一定都有过体验。

儒家觉得，人既然是情感的动物，而对情感影响最直接、最强烈的又是“音”，这样就有必要对“音”进行审视。在“音”里面，我们应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来推荐给大众呢？儒家认为要选择对大众身心健康有益的、对社会有益的、对人有道德教化作用的歌曲，儒家把这样的歌曲称为“乐”，并且明确地界定说“德音之谓乐”。《礼记?乐记》又说“众庶”“知音而不知乐”，“唯君子能知乐”。君子比众庶高明的地方是，君子懂得用“乐”作为教化大众的工具。例如《诗经》里面的诗篇，在古代是可以演唱的，它们主题纯正，节奏平和，你在听这种乐曲的时候，就会涵泳在它的氛围之中，心灵和情感就会随之变化，所以孔子的教育理论中有“诗教”之说。儒家喜欢讲“教化”，你的情感在听音乐的愉悦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被改变了，好像一颗糖放在水里，不知不觉地化了。这种教育方式一点也不生硬，不仅易于被大众接受，而且好的乐曲“其感人也深”，能深入你的心田，可以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孝经》上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儒家主张人应该“内外兼修”，礼乐文化的分工，是礼内、乐外。人的外在的言谈举止，要通过“礼”来加以规范；而内在的德性以及和谐的性情，则要通过“乐”来提升。内在德性的提升比较困难，可能需要一生的努力才能达到，而外在的行为举止比较容易规范，对不对？为了便于大家修身，儒家制定了一套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规范，就是通常所说的“礼”，拿来教育大众。《礼记》说：“礼者，理也。”就是这个意思。你每天践行礼仪规范，不仅可以端正行为，而且可以反过来促进你内心的修养，使你的德行内化。我们知道，许多宗教都有仪

式，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有复杂的仪式和戒律，它们的目的也都是要让人在践行的过程中，强化内心的信念。形式虽然彼此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儒家认为，涵养心性，最好的方法就是听德音雅乐。古代的文人都喜欢抚琴，有的还要燃上一支香，它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陶冶心性。一个人沉浸在这种德音雅乐里面，他的心态一定是非常平和的。

第6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5)

古人讲“礼乐教化”，是“寓教于礼”，就是把教育理念隐含在具体的礼仪形式之中。这种礼仪可以伴随你的一生，所以有“人生礼仪”的说法，比方成年有成年礼，结婚有婚礼，人际交往有交际礼，乡人聚会有乡饮酒礼，人死了有丧礼和祭礼，国与国交往有聘礼等等，把这套东西变成一个社会规范，人人去做，家家去做，这个社会风气就改变了。

礼与乐，乐更加重要，是礼的内在动力。儒家特别强调人内在的德性，《礼记》有一句话，叫做“德辉动于内”，“理（礼）发诸外”。你内心要有一个“德”字，这个“德”字在发着光辉，你的合于礼的行为就会自然流露于外，内外俱修，这才是一个君子。

儒家礼乐思想的边缘化

有同学讲了，照你这么讲，我们传统的礼乐思想是非常讲究互相尊重的，怎么现在大家一提起古代的“礼”，脑子里就会想到好像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就会想到电视连续剧里面三跪九叩，口口声声喊“奴才”、“奴才不敢”、“奴才如何”之类的画面，尽是一些尊卑分明的东西呢？那么我要告诉大家，这就是历史，历史的发展有的时候是曲折的。在孔子和他的弟子在世的时期，他们把怎么样教化人、怎么样做可以最有成效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已经发挥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可是，治国的权力却是在统治者手上，统治者是否采用他们的理论，就很难说了，这要看各方面的情况。孔子生前，曾经周游列国，希望能有君王采纳他的治国方案，结果是到处碰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史记?叔孙通传》说了这样一件事。汉高祖取得天下之后，有一天召开庆祝会，满朝的大臣都是跟着他打仗的，很多人是草莽出身，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结果在喝醉了之后互相争功，胡喊乱叫，甚至拔剑击柱。刘邦一看很生气，但是拿他们没办法。这个时候，他下面有一位谋臣叫叔孙通，这个人很能揣摩刘邦的心思，他说别着急，我

来给你想办法。于是，他就找了他的学生，又找了朝廷里面一帮人，着汉高祖祭孔图

手制定礼仪，然后教他们演习。演习完了让刘邦看，刘邦一看很高兴。后来，长乐宫建好了，要举行朝会，所有的大臣走到宫殿门口就被拦住，不许随便进去，要有“谒者”，就是礼仪官，一个一个把你引进去，文官站在什么地方，武官站在什么地方，都有规定。宫廷内外，到处是骑兵步卒，到处是各种旗帜，显现出一种威严的气象。等到人全部站齐了，好，这时候刘邦才坐在辇中，前呼后拥地被人抬着上殿。这个时候，所有的大臣都要在礼官的引导下，一个一个上来给他磕头祝贺。满朝文武，人人震悚肃敬。这样一来，刘邦可高兴坏了，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有多快活，有多神气。后来，这套东西叔孙通不断地让它完善，当然是投其所好，因为帝王很喜欢这套东西。儒家的礼仪本来是为了改造人性的，人跟人要互相尊重的，结果在朝廷里面多出了这么一块，这一块后来越来越发展、越来越重要。孔子和他的学生的那一套理论尽管一直有学者在研究，但在政府机构里，却是慢慢地被边缘化了。一讲到“礼”就是朝廷的礼仪，天子的威仪。其实我们读《左传》《战国策》等先秦文献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朝仪，君臣是互相对坐的。可是，后来不许臣子坐着了，得要站着。最后是不能站着，得要跪着。这种仪式和思想跟孔子的礼乐教化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

我曾经把“二十四史”里面所有《礼乐志》给翻了一遍，觉得孔子的礼乐思想一步一步被边缘化的轨迹是非常清楚的。在《史记》里面，有“八书”，“书”是记载典章制度的，后来的史书改叫“志”。《史记》里的八书，《礼书》是第一，《乐书》是第二，《礼书》、《乐书》是摆在最前面的，后面才是《平准书》《河渠书》等等。司马迁把礼、乐看作是引导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最重要的制度。到了《汉书》里面就不同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影响很大，就把《律历志》放在最前面，首先要看天，天答应不答应，就把自然的天变成一个神灵

的天，《礼志》《乐志》放到后面去了。再到《晋书》里面，《天文志》下来是《地理志》，《地理志》下来是《律历志》，《礼志》摆到第四去了。再到《隋书》里面，它又把这个“礼”摆到前面，第一是《礼》，但是它改叫《礼仪》了。“礼”改称“礼仪”，这是很大的变化。古人讲“礼”，是包括形式和内涵的，是有思想的仪式；而“仪”主要是指仪式，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古人批评某些形式主义的东西的时候，往往会说：“这是仪，不是礼。”这样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因为你丢掉了礼的灵魂，只剩下形式了。这时候的《礼仪志》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不外乎是几品官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衣服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等等，这哪里还有孔子礼学思想的气味？《隋书》里的《乐》，改叫《音乐》了，这个改变看似无关紧要，实际上是触到了儒家礼乐思想的根本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在儒家音乐思想里面，“音”和“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怎么可以混在一起呢？《乐记》里有魏文侯跟子夏的一个对话。魏文侯说，哎呀子夏，你很有学问，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端冕而听古乐”，把这帽子弄得端端正正，想恭恭敬敬地听一段古乐，没想到，我听一会儿就想睡觉了，实在提不起兴趣来。可是我听那些新乐（拿我们今天的话叫流行音乐），哎呀，我一个晚上都不想睡觉，请问这是什么道理？子夏听了就笑了，说你问的是“乐”，实际上说的是“音”。你所说的新乐，是乱七八糟的音，靡靡之音，亡国之音，哪里配称“乐”！只有具有道德教化的音才可以称为“乐”。历史上的圣王，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功成治定，国泰民安，都有当时的颂歌。这种颂歌有乐舞，你看了之后，可以知道他们怎么除暴安良、如何安定社会。可是你喜欢听的那种新乐呢，男女杂厕，一帮人在上面窜来窜去，看完以后不知所云，不知道它要表达什么主题。我们从子夏的这段回答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儒家是非常看重音和乐的区别的，这一点千万不可小看，而《隋书》不仅犯了这个忌，而且《音乐》里记载的东西，开始

偏重于乐器和技术方面了，各种各样唱的东西都叫音乐，这就远离了先秦儒家的“乐”的概念。

第7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6)

到了《宋史》里面，大家知道“二十四史”里面《宋史》的篇幅是最大的。《宋史》里面的“志”，首先是《天文》，接着是《五行》《律历》《河渠》，下来才是《礼》。而这里的《礼》记载的都是什么呢？帽子上面有几道梁，鞋子是什么颜色的，袖子是什么颜色的，等等，《礼》整个地趋向形式化了，而且这些形式是服从于皇权和特权等级的，已经异化了，和孔子所讲的“礼乐教化”的理论是背道而驰的，同时也说明先秦儒家的礼乐思想已经被边缘化了。今天我们往往拿这些东西来说我们古代是礼仪之邦，这就大错特错了。

附：彭林答问曾子墨（主持人）：听了您的演讲，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学可能都会觉得是受了一场中华传统文化的洗礼。其实在座很多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像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人真正地受过这种“礼乐教化”的熏陶，可能我们所接受的都是正统的西式的教育。那您认为这些接受了西式教育的人，是不是就是缺乏文化底蕴？

彭林：是的，还不仅是文化底蕴。我先说一个这样的事情吧，顾炎武曾经借用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问过许许多多同学，发现没有一个同学是把这话读懂了的。其实顾炎武在《日知录》里面就说过，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换了一个皇帝，姓张的皇帝换成了姓李的皇帝，但是国家的文化并没有变，还是中华文化，这叫“亡国”，这没有关系。另一种情况，不仅皇帝换了姓，而且连你的整个的文化也被人家替换了，或者被人家消灭了，尽管你的人一个个都还在，可是你这个民族已经消亡了，这叫“亡天下”。每一个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文化的，我们到云南去，说这是傣族，那是苗族，因为它的文化不同，所以我们才可以区别她们。要是民族文化都没有了，这民族怎么会存在呢？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有一幅唐代地图，显示出北方有个民族国家叫契丹，后来到哪里去了？今天我们五十六个民族里面是没有契丹的，但当时它是一个非常

强大的国家。在俄文里面“中国”这个词的读音就是“契丹”的音译。契丹这个民族在跟人家交往的过程当中，不注意固守自己的传统，被人家同化了，它的文化没有了。今天我们如果做基因分析的话，社会上可以找到很多有契丹血统的人，他的祖先是契丹人，说不定在座的就有。可是你不是契丹民族，因为什么？你的文化没了。我们这个民族经过了五千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这套文化的核心是“礼”。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的。他说过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丢光了，最后问题就来了：你们是什么民族？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民族服装，我今天来做讲演，只能穿着洋服，很惭愧啊。

你看我们某些地方的房子，都是欧陆风情，已经没有了文化个性。现在学生的节日也西化得很厉害。我去年在北京某高校上课，上一个学期课，有一天晚上，有一位同学来跟我请假说：“老师，这堂课我要请假。”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班有个活动。”我说：“学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上课，什么活动能让你们不上课啊？”他说：“今天是平安夜。”我听了特生气，说：“平安夜，关你什么事呀。”圣诞节是外国的宗教节日，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目前，大家普遍没有文化自尊，也没有文化自觉。小平同志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朴实，但是非常好，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爱着这片土地。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我们血管里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我们要珍爱自己的文化、珍爱自己的传统。北京有一个礼仪学校，给了我一些教材，我一看前言，说我们是五千年礼仪之邦，我们如何如何好，前言完了，下面就是怎么描眉、涂口红、打领带，怎么拿刀拿叉，全是西方的那一套礼仪。这样的礼仪学校办得越多，我们民族的文化就消灭得越快。现在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2004年4月，我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讲演，讲完后，有一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女同学站出来提了一个问题，把我深深地震动了！她说，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为了将来更好地从事外交工作，他们创办了一个礼仪

学校，学习阿拉伯礼仪、非洲礼仪、欧洲礼仪等等，最后发现居然没有中国礼仪！五千年的礼仪之邦，我们已经拿不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民族礼仪了！

第8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7)

有一句古话叫“入境问俗”，如果我们要到欧洲去，总是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化是怎么样的，语言风俗是怎么样的，以免由于无知而做出不尊重对方的事情来。可是现在有个例外，外国人到中国来不需要“入境问俗”，你懂得欧美的风俗就行了，因为我们不需要别人尊重。这不是滑稽吗？对不对？现在我们已经是没有了文化表征，人家怎么对我们都可以。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有些人正在大力普及西方礼仪，急着要大家学拿刀、拿叉，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筷子拿不好有什么关系，我们会笑他吗？不会的。学习拿刀拿叉对我们这个民族真有这么重要吗？我们还有尊严没有？

还有一个现象，深圳有一个“锦绣中华”，咱们北京有个“中华民族园”。里面有中国境内所有的少数民族，但就是没有汉族。没有汉族能叫“锦绣中华”吗？能叫“中华民族园”吗？滑稽。可是话说回来了，我们退一万步来讲，里面给你划块地方，让你去展示汉族文化，你又能展示什么？难道找一伙穿夹克衫的、穿西服的人在里面，互相说“妈咪”、“爹地”、“拜拜”？

近代以来，我们受到了列强的侵略，在这种很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急于强国，所以不是想“全盘西化”，就是想“全盘苏化”，自己的民族文化总是挺立不起来，没有文化自信，也没有文化自觉。我们五千年的文化，正以加速度的态势在流失。长此以往，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我曾经套用《红楼梦》里面的一句话来作比喻，形容我的担心。林黛玉很爱哭，一年到头，流不完的眼泪，所以有人担心说：“怎禁得住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这么流失下去，会不会有流失殆尽的一天？不好说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有三个都已经中断了，比如现在的埃及文化与古埃及的文化，所以有人把他们叫“失落了的文明”。我们中国是其中惟一一个没有中断的古文明，但是我不敢说

它会不会最后流失殆尽。这个要看我们大家有没有文化自信，有没有文化自尊？

现在西方人要占领我们的市场和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还需要像一百多年前那样用大炮吗？用鸦片吗？不必了，用文化就解决问题。现在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喜欢过洋节，不喜欢过中国节，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被征服了。

提问：彭老师、主持人，你们好，我是北京理工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研究生，我曾经和一位外国朋友聊过天，谈到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我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甚至远远超过我，我就感到很奇怪了。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文化了解甚至超过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那么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又能了解多少，又能保存多少呢？我就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何以成为一个中国人？今天听了您的讲座，我深有体会，但同时又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就是您提到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但是即便在孔子的著作中，他都要慨叹“礼崩乐坏”，他要上西周，要上周公的那个时代去寻找真正的礼。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几千年过去了，无数的灾难，无数的重建，那么我们该上哪儿去找真正的礼呢？谢谢。

彭林：我想，这个礼它是一种文化，我们不能简单地这么做比较，说是孔子找不到，我们到哪里去找？我们当然要到传统文化里面去找。古代的礼，在许多文献里都有记载，不过比较难读，只要找，还是可以找到的。我们不是要去全盘恢复古礼，而是要去寻找智慧和思想。近代以来，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抛弃了。近年有人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助于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国家怎么强大呢？怎么样不失去自我呢？请大家牢记这样一句话：“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无文化则足以亡种。”你们是理工大学的，发展科技的重任在你们身上，但是文化传承的重任也在你们身上。不能认为我只是学理工专业的学生，文化问题与我无关，你们不能这么想。我们刚才说了，这是匹夫都有责任的事情。我这里要讲到我们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办学的

理念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非常清楚。梁启超先生曾经给清华的学生做过一次讲演，题目叫《君子》。办大学的理念是什么？是不是给大家一个饭碗呢？我是学计算机的，我是学工程的，我是学化学的，不是的！大学是要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有很强的专业技术，同时又有人文关怀的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梁启超称之为“君子”，说清华大学就应该培养这样的人。他说，将来清华的学生到了社会上以后，能够挽既倒之狂澜，社会就有希望了。那么，怎么样成为一个君子呢？梁先生取了《易经》里面的话，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后来成了我们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把要说的话全说了，比我们今天见到的许多口号式的厂训、校训深刻多了，这就是水平。

第9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8)

曾子墨：最后也是按照我们的传统，请您用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一下您今天的演讲。

彭林：请善待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2005年1月15日在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205期的讲演）

如何祭祀黄帝：

恢复古礼与另制新仪黄帝乃五帝之首，中华人文始祖，司马迁作《史记》，从黄帝开篇，其历史地位可想而知。早在先秦，黄帝就因“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国语?鲁语上》）的历史功绩而被列入祀典。西汉一统之初就“祀黄帝于沛庭”（《汉书?高祖本纪》），开帝王祭祀黄帝之先。此后，历代对黄帝的祭祀，史不绝书。从隋唐起，黄帝牌位正式进入历代帝王庙，列入政府祀典，万世享食，绵延至近代。近年，政府决定将祭祀黄帝作为国家大典，于每年清明在黄陵举行，这是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举措之一。

海外华侨华人祭拜黄帝古代祭祀，乃是“所以追养继孝”（《礼记?祭统》）的一种形式，所以，在设计上有许多的讲究，仪节也非常之多。时移世易，今天我们祭祀黄帝的仪式应该如何制定？有人主张完全抛弃传统的形式，另制新仪；也有人主张全部恢复古代的典礼，不得改易。这两种意见都比较极端。传统的形式是否可以完全抛弃呢？显然不可以，祭祀黄帝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承，以黄帝为共同的祖先已经成为全球华人根深蒂固的理念，成为巨大的民族向心力。若将祭典改得面目全非，难以为华人世界所认同。而传统的祭典不仅非常繁琐，而且今人大多已经看不懂，若执意行之，势必令人生厌烦之心，同样收不到实效。2004年祭祀黄帝的仪式对传统的祭典作了改革，成功与否？我想就此谈一些浅见。

祭祀的名与实

2004年的祭典名称是“社会各界公祭黄帝典礼”，祭典的仪仗队中也有大写“祭”字的旗帜，这是一场祭祀活动，主办者的意识非常明确。

什么是“祭”？“祭”字至迟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象以手持肉奉于神祇之形。可见，祭字的本义，是借助于食物向神表达敬意的一种仪式。

古代宗庙祭祀因祭品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荐”，一类称为“祭”。关于荐，屡见于文献记载，其中《礼记?月令》最为系统：（仲春之月）“天子乃鲜羔开冰，先荐寝庙”；（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孟夏之月）“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孟秋之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仲秋之月）“以犬尝麻，先荐寝庙”；（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季冬之月）“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先荐寝庙”。可见，所谓荐，乃是按照时令向受祭者荐献麦、谷、麻、鱼等食品的仪式，即《中庸》所说“荐其时食”，旨在表达凡有时令鲜物出，必须首先请祖先尝新，然后自己才敢食用之意。

祭是较荐更为隆重的仪式，致祭的次数要比荐少，但级别更高，仪式更为复杂。祭的供品有酒、有牲。牲指牛、羊、豕三者或者羊与豕二者的组合，前者称为太牢，后者称为少牢。荐与祭二者，有同有异，浑言之均可称祭；析言之，无牲者称为荐，有牲者称为祭。

黄帝受祭，自然要有供品，汉代祭祀黄帝用怎样的物品，文献语焉不详。最早提到祭祀黄帝用牲等级的，是《魏书?太宗本纪》，称北魏神瑞二年（415）“以太牢祠黄帝庙”，其后历代相沿，赓续不废。

黄帝陵旧照自古以来，祭祀一定要有供品，是祭之所以为祭的最基本的原则。韩国是举国保留祭祀传统的国度，汉城的朝鲜王室宗庙大祭沿袭古代仪式至今，受享诸王均有祭品。乡间民家祭祀也是如此。我国今日民间的祭祀也无例外。

2004年的祭祀黄帝大典，与祭代表除了敬献花篮之外，自始至终没有向黄帝奉献任何祭品。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根本就不是祭祀。更为奇怪的是，主祭者宣读祭文结束时，大声念道“尚飨！”“尚飨”是传统祭文中固有的词令，其意思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敬请享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供桌前有祭品。祭文的文稿，显然是沿袭了传统祭文的格式，所以才会有“尚飨”一词。而这次祭典除了花篮，什么祭品也没有，却还要对黄帝说“敬请享用”，真是莫名其妙，难道要请黄帝吃花篮？可见，无论是撰写祭文者还是主祭者，都不清楚“尚飨”一词是什么意思，结果弄巧成拙。

第10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9)

我们并不是要恢复繁琐的古礼，恰恰相反，是主张在保留传统祭典精神的原则下，删繁就简。礼仪并非形式越繁琐越好，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可见孔子主张形式要节俭，内心要诚敬。但孔子是说要"俭"，而不是说要"无"，最核心的形式必须保留，否则就不成其礼。《论语?八佾》说，子贡准备废除告朔仪式中用的饩羊，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如果连饩羊也废除了，那么，告朔之礼就连起码的形式也没有了，可见孔子对于涉及到礼的存亡的仪式是坚守的。

历代帝王深明于此，据《册府元龟》记载，开元十二年（724）十一月庚午，唐太宗幸东都，"敕有司，所经自古帝王陵，精意致祭，以酒脯时果，用代牲牢"。这显然是一种简化的方式，但"酒脯时果"依然有"告朔之饩羊"的意义。

我们揣度，祭祀黄帝典礼的设计者之所以没有安排敬献供品的仪节，可能是觉得向黄帝献牛、羊、豕太过时，或者是嫌麻烦，不如献花篮来得时髦和简便。如果真是这样，也并非不可，只是仪式的名称应该改作"追思会"或者"纪念会"。时下北京、广州等地纪念孙中山、毛泽东的仪式都是采用敬献花篮的方式，只是这些仪式都没有一个是叫"祭祀"的。顺便要说一句，献花篮是西方的仪式，而祭祀黄帝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有特殊的文化意义，用西式的花篮献给黄帝是否合适，值得推敲。

笔者认为，仪式的名称至关重要，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既然是祭祖，就应该用符合其基本定义的形式，不要冒其名而无其实。前些年，四川某地利用国际会议之机举行祭孔典礼，由于没有文化底蕴作基础，形同儿戏，引起海外学者反感，媒体多有讥评，损害了我国的文化形象，应该引为鉴戒。

关于九鼎八簋

2004年祭祀黄帝大典之前，媒体突出宣传说，此次祭祀规格西周?“师酉”铜簋是九鼎八簋（guǐ），是天子的等级云云。

将九鼎八簋作为天子等级的说法，始见于《公羊传》。关于用鼎的数目，《仪礼?少牢馈食礼》明确说到用五鼎，少牢馈食礼是大夫之礼，《仪礼》没有提到诸侯、大夫之礼，所以有人按照等差向上推测诸侯用七鼎、天子用九鼎。

西周?“大盂”铜鼎

簋是盛黍稷类主食的器皿，《说文》说是“黍稷方器”。其数目也是根据文献推测出来的，《礼记?郊特牲》说“鼎俎奇而笾（biān)豆偶”，意思是鼎俎都是奇数，笾豆都是偶数，因此说天子是九鼎八簋、诸侯是七鼎六簋、大夫是五鼎四簋。九鼎八簋之类的器物组合，在先秦墓葬中曾经发现过。但它们在祭祀中的具体作用和位置，却很少有人深究。

鼎原本是炊器，后来演变为盛放牲体的器具。古人煮牲用镬（相当于后世的锅子），陈设在庙门之外。牲煮熟之后要取出来，盛在鼎中，然后和以五味。鼎也是陈设在庙门之外，而且是靠近镬，例如《少牢馈食礼》说到五个鼎的位置是“三鼎在羊镬之西，二鼎在豕镬之西”，就是说为了取牲的方便，三个盛羊牲的鼎放在煮羊牲的锅子旁边，两个盛豕牲的鼎放在煮豕牲的锅子旁边。接着，要用匕首将鼎中的牲肉取出来，放在俎之上，俎类似于长方形的案板，下面一般有腿。俎与鼎配套使用，所以两者的数量总是相等的。将牲肉从鼎中取出放到俎上的地点有两个：一是在庙门外的陈鼎处就近取放；二是先将鼎抬到门内的堂下，然后取放，决没有将鼎抬到堂上去的。原因是，食用者是从俎上而不是从鼎中取用牲肉的。即使是祭天，也是用俎盛牛羊豕，决没有将鼎供奉在神主前的。好比私家祭祀，绝不会把锅子直接端到木主前面供奉，而是要将锅子里的肉先盛到碗里，这是常识范围内的事。

因此，文献记载提及祭祀历代先王的礼器，都没有涉及鼎，而只有具体的盛食器。例如《开元礼》的记载，每位先王的祭器为：“尊六、笾十、豆十、簠（fǔ）二、簋二、铏(xíng)三、俎三。”尊是酒器，笾豆盛菜肴，簠簋为黍稷之器，铏盛汤，俎陈牲肉。在这套祭器组合中没有鼎，簋也只有两个，证明古代祭祀黄帝并非用九鼎八簋。

第11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0)

古代祭祀的等级主要是看用牲的情况，而不是看祭器。古代天子用太牢，诸侯用少牢，士用特牲（豕），所以礼书才有《郊特牲》《少牢馈食礼》《特牲馈食礼》等等的名目。但也不是一律的以多为贵，天子南郊祭天就用特牲——一头牛，《礼记?礼器》说："祭天，特牲。"孔颖达疏："特，一也。天神尊贵，故止一特也。"

由于上述的理由，祭祀黄帝的仪式用九鼎八簋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出难题，放在哪里都不是。如果把它当作祭器陈设在享殿正前，鼎内就必须盛牲体，但由于典礼没有牲，就只好陈设空鼎空簋，实在是不成体统。如果按照礼书的记载，将鼎陈设在门外，也很困难，因为祭祀广场根本就没有门；退一步而言，即便有门可以放鼎，簋也无法处理，簋原本是放在堂上的，里面必须有黍稷，现在将八个空簋放在堂上，其他什么也没有，显得十分尴尬。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主办者居然将九鼎八簋放在了祭祀广场的两侧，实在是出人意料。不知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我们由此得到的印象是：它们连正经的摆设都不是，而是如同戏台上的道具。

我认为，礼器的安排一定要前后照应。如果决定不按照传统的祭祀方式，就不必再陈设九鼎八簋，完全可以取消。

与祭者的服装

古代祭祀，参与祭祀者必须身穿祭服；若是国家大祭，则有更为严格的着装要求。《开元礼》规定："诸享官以下，各服祭服。"不同级别的官员有不同的祭服。如今祭祀黄帝，当然没有必要再去穿旧时的祭服，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祭祀民族之祖的国家级典礼，与祭者理应身穿民族服装。韩国、日本等地祭祀孔子的仪式，主祭者或者穿祭服，或者穿民族服装。奇怪的是，黄帝故乡的祭祀大典中，站在主祭方队中的所有成员居然一律都是西装革履！有人或许会说："这是顺应时代潮流，有什么不可以！"这是似是而非的说法。

相传嫘祖发明蚕桑，黄帝制作衣裳，民众得以御寒抗冻，遮羞蔽体，渐入文明之境。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尚在披兽皮树叶之时，我们的先民已经穿上麻和葛类，甚至是丝绸的衣服，这是人类历史上何等骄人的大事。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不断推陈出新，琳琅满目，尤以汉、唐、宋、明最为绚丽多彩。《大明宫词》等电视连续剧，根据各种资料制作的中华古代服装，款式大方，色泽明快，曾经引起国内外观众的惊羡。因此，身穿民族服装祭祀黄帝具有特殊的意义。滑稽的是，2004年清明节，中央电视台直播祭祀黄帝大典时，演播室里的主持人和嘉宾都身穿“唐装”出现在观众面前，表明他们都知道今天的祭典有特殊意义；而黄陵的主祭者对此似乎浑然不知，一个个身穿“洋服”站立在祭殿之前，并且时不时在镜头前整一整西服、领带。主祭者在祭文中还自称黄帝子孙，侈谈五千年文明，岂非绝大的讽刺?

早期的中山装

众所周知的原因，如今的中国事实上已经没有统一的民族服装，但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依我之见，祭祀黄帝大典的服装，至少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中山装。辛亥革命之后，满清服装不受欢迎，孙中山发明了著名的“中山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山装被作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服装，受到社会各阶层和海外华人的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总是身穿中山装接待外宾，出席各种盛大的典礼，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和自信。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服取代了中山装，成为中国官方活动的“正服”，民族服装遂归于虚无，令人扼腕长叹。二是“唐装”，这是在上一世纪中国民间服装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海外华人中多有穿着者，由于在2001年上海的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都穿着“唐装”亮过相，大众也可以认同，只是样式、用料等还可以进一步改进，以便为更多的人接受。三是综合各朝传统服装之长专门设计一套。我国服装是一份宝贵的资源，应该充分利用。

第12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1)

中国人穿西服祭祀黄帝，猛一想，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如果我们做一个换位思考：假设美国人祭祀华盛顿都身穿中国旗袍，或者法国人祭祀拿破仑都穿伊斯兰服装，世人会有怎样的感觉？我想一定是举世惊愕！其中的道理不是完全一样吗？

世界上的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它是民族的表征。时下，阿拉伯国家经济极度富裕，完全有条件“全盘西化”，但他们依然身穿自己的民族服装。还有许多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人民也不以身穿民族服装为耻。这些都反映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尊。而这种自信和自尊，正是一个民族得以凝聚的核心之所在。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文化最为悠久的中华民族，无论如何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利用清明祭祀黄帝这一盛大典礼的影响，推出我国的民族服装，唤起国人的文化自尊。

关于乐舞

古代祭祀尧、舜、禹、汤等圣王，一定要有乐舞。目前的祭祀黄帝大典安排了乐舞是对的，但存在如下三个问题。

首先，古代的乐舞的时间安排。古代祭祀要想象神明接受邀请、降临享殿。祭祀有酒、有牲，致祭者要向神明三次献酒，分别称为初献、亚献和终献，合称“三献”。初献时，祝官要诵读祝文。三献毕，致祭者要撤去馔席，最后送别神明。在上述的每一个仪节中，乐舞生都要奏乐、起舞。也就是说，礼与乐浑然一体，含有歌颂神明和欢娱神明的意思，整个祭祀过程中伴随着乐曲。而现在的祭祀黄帝大典将乐舞安排在最后，此时神明已经远远离去，乐舞成了会议结束之后的余兴节目，是给场上的观众看的，因而有很浓重的表演气息。应该说，这是违背祭祀乐舞本义的。

第二，不同的古帝王有不同的乐舞，不得混用。祭祀黄帝大典的乐舞有四章，其中不乏张冠李戴之嫌，最典型的是“百兽率舞”一章。

“百兽率舞”一词出自《尚书?尧典》，原文大意是说，舜的乐官夔典掌音乐，由于他的高明领导，使得八音协谐，神人相和，乃至感及兽类，故敲击石磬时，“百兽率舞”。可见，百兽率舞说的是舜的时代，把它用到黄帝身上，未免牵强附会。

第三，音乐过于现代化。古代宗庙祭祀，一定要用节奏缓慢而庄严的雅乐，绝对不能用“新乐”。这在《乐记》等文献中是反复阐明的思想，切不可等闲视之。雅乐是歌颂先王创业的历程和功烈，富有思想内涵；而新乐注重的是感官的享受。但是，祭祀黄帝大典的乐舞节奏过快，音乐风格也比较时髦，完全不像雅乐，有比较明显的商业气息。作者可能有把它做得“好看”或者有提高收视率的动机在内。但是，既然是一次传统的祭典，就应该尽可能把它做得原汁原味，切不可在“贴近时代”的旗号下，错将传统做成了现代，其结果必然对大众造成误导，以为古代的宗庙雅乐就是这种风格。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用祭祀的方式来纪念对民族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以表示崇德报功之意，使之流芳千古，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人文精神具有积极意义。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制定了万世享祀的原则及其人物。《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

第13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2)

文中提及的“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等五种功烈，都足以造福万民。这些民族英雄已经久别人世，为了让后人世世代代记住他们，古人采用了祭祀这种方式来追思和歌颂之。

人已不在，却还要向他们献酒，请他们观看乐舞，岂不是多此一举？我想，古人还不至于糊涂到连人死不能复生的道理都不懂的地步。祭祀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死者，毋宁说是为了生者。这是培养生者对民族英雄恭敬之心的一种方式。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说要像神明就在眼前那样恭恭敬敬地奉行敬养之礼，诚敬是礼之根本。因此，从迎神、三献、撤馔到送神，无不如身临其境。

如今的祭祀黄帝大典当然不可能恢复到古昔，但是起码的恭敬之心还是要有的，否则就没有必要举行如此的仪式。整个祭典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主祭者念祝文时居然背朝着黄帝的享殿，他此时的心态，大概是在向大众作报告。在正式的礼仪场合中，用背对着长辈是不礼貌的，背对着致祭对象是尤其不能允许的，它表明致祭者根本没有“祭神如神在”的意识，也没有发自内心的敬意。

祭祀黄帝是国家大典，它直接关系到中华文化的形象，因此，形式和内容的设计都应该慎之又慎，要有充分的学术依据，如果率尔操觚，流于形式，只能贻笑于海内外方家大雅。尤其是不要弄得不中不西，不知是哪国的仪式。

（2005年4月4日在西安黄陵县举行的“黄帝祭祀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为礼乐文化正名：

“以礼杀人”与“以理杀人”1919年11月1日，吴虞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发表了《吃人与礼教》一文，他说：“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新青年》

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把吃人和礼教这两者直接画了等号。在此后的近百年当中,“礼”不断被人泼脏水，“积毁销骨，众口铄金”,于是,礼教变成了上自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无人不晓的贬义词。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乐文化——每每简称为礼。如果吴虞的说法得以成立，则中华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如此野蛮的国家，岂能加以“文明古国”的桂冠?因此，对于礼的认识事关对于中华文明的基本评价，不可等闲视之，我们不可不明辨之。

什么是礼教?

为礼乐文化正名，就必须从“礼教”这个词开始。古人将“礼教”与“乐教”并提，它们的本义，不过是以礼为教、以乐为教。清代学者凌廷堪说过：“上古圣王所以治民者,后世圣贤之所以教民者,一礼字而已。”意思是说,上古圣王治理民众的方针,以及后世圣贤教育民众的孔子像方法,都可以最终归纳为“礼”这一个字。圣王治世的目标是建立大同世界,这是见诸于《礼记》的。圣贤教民,是要让百姓懂得礼、遵守礼。凌氏的见解,非常精到。太古时代,人与禽兽为伍,《礼记?曲礼》说，为了让人们懂得“自别于禽兽”，有圣人起来“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为礼以教人”，就是制定了礼来教人。礼使人自觉地区别于禽兽，走向了文明。而圣人的历史功绩正是在于“为礼”和“教人”。那么，礼又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找出关于礼的解释的源头,这就需要从孔子及其弟子的相关论述中去寻求答案。

在《论语》里，孔子谈礼的地方在在多有，由于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所以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对礼的所指，有不同的侧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主题：

第一是指周礼，就是周公所制定的西周礼制。孔子特别推崇周公，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他感叹自己的年衰，居然许久没有梦见周公了！程子说，由这句话可以知道，孔子盛年的时候，“寤寐长存周公之道”。孔子之所以崇拜周

公，是因为周公手创的那套制度的文明和完美。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意思是说，周礼是在借鉴了夏、商两代为政得失的基础上制定的，典制粲然大备，足以为万世龟鉴,所以他表示了“从周”的立场。

第14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3)

众所周知，西周开国之初，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这套制度之所以为后世所称道，因为它是以道德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由此确立了道德在治国理念中的主导地位,这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这套制度瓦解了，世道大乱，史称“礼崩乐坏”。贵族们为了权和利，彼此征战不息，所以自古有“春秋无义战”的说法。孔子向往周公之礼，既是他对春秋乱世的不满，也是他对西周道德礼制的向往，这是非常正常的,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如果孔子持了相反的态度，赞美春秋乱世，那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第二，礼是体现德治、仁政的途径。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又提出了“仁”的思想,这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德和仁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无形、无色、无声、无嗅,对于知识程度较低的人来说,甚至会觉得虚无缥缈。而礼就是把德和仁具体化的制度或者行为方式。先秦历史上有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实行礼治还是法治。法家认为，政令的推行要依靠法，凡是不从令者,就用刑罚加以惩处，这样，老百姓就不敢作乱了。而儒家则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主，通过礼来规范和整齐民众的行为。孔子评价这两种治国之道时,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老百姓不去触犯法律，是因为畏惧刑罚，他并没有羞耻之心。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礼来保证道德目标的实现，结果就不同了，老百姓因为有了羞耻之心，不仅不会去做坏事，而且还会“格”，就是有上进心。

礼是体现德和仁的具体形式，离开了德和仁，礼就不成其为礼。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一个内心没有仁爱之心的人，怎么会去推行礼和乐呢？就是说,

推行礼的人首先应该是一名仁者,一名富于爱心的人。可见,礼与仁是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

第三，礼是修身的手段。在人类社会中,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放纵自己的行为，那么，人就和禽兽没有了区别，社会也就没有了起码的秩序,也就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所以，儒家和法家，尽管政见不同,但都认为人的行为是需要约束的,双方的分歧在于,究竟用什么来约束人。孔子主张用内在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他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作为一名君子，一方面要"博学于文"，广博地学习文献,积累深厚的知识，同时要"约之以礼"，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因为礼是根据道德原则制定出来的。只要在这两方面都做好了,就一定可以做到"弗畔"，也就是不悖离道了。

人性都有天然的缺陷，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弱点。因此,无论是哪种性格的人，如果不借助于礼，都达不到理想的境界。孔子举例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xǐ)，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意思是说，恭敬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空自劳碌。谨慎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显得胆小。勇敢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作乱。直率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说出伤人的话。平心而论,恭、慎、勇、直这四种性格都不是什么坏毛病，但只要离开了礼的指引，都不会结出"正果"。

类似的意思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如，《论语?宪问》记载，子路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是"成人"（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时，提到了臧武仲、公绰、卞庄子等三位鲁国的大夫以及自己的学生冉求。臧武仲的智慧，公绰的没有私欲，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学问，都是最为出色的。孔子说，要成为完美的人，仅仅把这四个人的优点集于一身是不够的，还要"文之以礼乐"，将礼乐与上述四种优点完美结合。可见，礼乐是最重要的修身课目。

第15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4)

我们不可能把孔子谈礼的文字全部提到，但是主要的部分已经都谈到了。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论语》中的礼，没有一处是号召大家去杀人或者吃人的。孔子所说的礼,是指以道德为内涵的国家典制，是德与仁的具体表现,也是修身的法则，这些与凌廷堪关于圣王以礼为治,圣贤以礼为教的说法是完全吻合的。孔子关于礼的见解,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健康的，代表了社会的理性思潮,而且在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对我们还有重要的启示，值得我们借鉴。

礼教杀人吗?

吴虞说礼教杀人,半个多世纪之后,江青大张其说,声称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奴隶制。将礼直接等同于奴隶制,这是江青为了打倒孔子而编造的谎言,不可不辩论清楚。

“克己复礼”一词，出自《论语》的《颜渊》篇。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说，克制自己的行为，让它回复到礼，这就是仁。只要有一天大家都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都归于仁了。所以说，做一个仁者，是要靠自己的，与别人有什么相干呢？颜渊听后，希望孔子再说一说克己复礼的细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是说，不符合礼的事情，不要去看、去听、去说、去做。孔子的这些话，我们今天平心静气地读一读，就会明白当年的批判是何等的不讲道理。人人懂得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不出格,难道不好吗？这里哪有复辟奴隶制的意思？难道是“瘌痢头打伞，无法无天”才好吗?

按照当时通行的说法，奴隶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用活人殉葬。这种现象在商代很盛行，但西周以后，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出现，并且日益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所以殉葬的现象已经不多见了，即使出现了，也会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于是，有些贵族就改用木俑殉葬。

相比于用活人殉葬，这种做法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即便如此，孔子也不能容忍，他愤愤批评那些“始作俑者”，也就是发明木俑的人，说：“其无后乎！”意思是说这家伙应该断子绝孙吧！孔子反对人殉，是“仁者爱人”的表现，代表了时代的进步和人类的良知，如此宽厚的仁者，怎么会喜欢奴隶制?

可以证明孔子的仁爱之心的，还有《礼记?檀弓下》里的“苛政猛于虎”的典故。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路路过泰山，一位妇人在墓旁哭泣，孔子在车上听到了，便让子路上前询问。子路说：“听到你的哭声，好像是有特别伤心的事吧？”妇人回答说：“这里有老虎出没，先是我的公公被老虎吃了，后来丈夫也被老虎吃了。如今，儿子又被老虎吃了。”孔子感到奇怪，说：“你为什么不搬走呢？”妇人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一家人为了躲避苛政，宁可死于猛虎。孔子听后，感慨地对子路说：“年轻人要记住啊，苛政猛于虎啊。”孔子对苛政都如此深恶痛绝，怎么会去号召大家杀人呢?

有学生对我说：“西周是奴隶制，孔子希望恢复西周的典制，这不就是复辟奴隶制吗？”这位学生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原因有两个，一是不了解古史分期的情况。西周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西周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因此，不能把西周制度等同于奴隶制度。二是没有读过儒家的文献。所以，我回答他说：“建议你回去读读《礼记》，这是了解儒家礼学思想最重要的文献，如果你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儒家试图复辟奴隶制的证据，请你告诉我。”《礼记》不仅不能为他找出一条证据，相反可以找出许许多多的反证。下面我们仅就《礼记?檀弓》所见举一些例子。

齐国的大夫陈子车客死于卫国，他的妻子和家宰商量后，准备用活人来殉葬。陈子车的弟弟陈子亢到卫国奔丧，闻讯后，坚决反对，认为：“以殉葬，非礼也！”为制止他的嫂子和家宰的计划，陈子亢对他俩说：“如果必须要用活人为我兄殉葬的话，那么，你们二位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子车之妻和家宰不得不罢休。

第16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5)

此外，陈乾昔在临终之前，要求他的儿子为他做一口大棺材，要求将来让他的两个婢子一左一右地在他身边殉葬。陈乾昔死后，他的儿子没有照他的要求办，说："以殉葬，非礼也！"

上面两个例子都是反对殉葬的，反对的理由完全一样："以殉葬，非礼也！"认为殉葬是不符合礼的，绝对不可以去做。礼学家反对殉葬的立场是如此的鲜明。吴虞这些人都是从旧学出来的，不会没读过《礼记》。因此，他们对礼的抨击，让人非常惊讶。

不仅如此，凡是残害无辜的不人道行为，也都在儒家的反对之列，《礼记》中相关的记载也相当之多。

某年，鲁国发生大旱，鲁穆公准备将国中的尪（wāng）者抓来暴晒。所谓"尪者"，是指某些骨骼有毛病，面孔朝天的人。古代有人认为，天大旱的原因，是上天怕雨水会灌到他们的鼻子里面，所以不忍心下雨。县子听说后坚决反对，说："因天旱不雨而惩罚残疾人，未免太过残忍，断然不能这样做。"于是，鲁穆公说："那就不晒尪者了，改晒巫婆吧！"县子认为这同样是迂阔之举，依然不可。鲁穆公无奈，最后提出迁徙大的集市，县子这才表示同意。

某年，吴王夫差率领军队入侵陈国，他们砍伐神社的树木，杀死患有传染病的百姓，所到之处，表现非常恶劣。吴军回国时，陈国的太宰嚭奉命前往送行。夫差自以为得胜而归，声名显赫，要太宰嚭评价吴军的"军声"。太宰嚭说："自古以来，攻伐有罪之国的仁义之师，都不会去砍伐该国神社的树木，不杀害病人，也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者，为的是体现人道。如今贵军连病人都杀，所以，可以称你们为'杀害病人之师'。"夫差说："如果我们归还你们土地，释放俘虏，你又将如何称呼我的军队？"太宰嚭说："君王讨伐敝国犯下的罪行，但又怜悯我们而赦免之，还愁没有好的军声吗？"

《礼记?檀弓》里的这两个例子，让我们走进了仁者的视野，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古代礼家是把仁爱作为判断是非的重要标准的。我们无法想象,这些人怎么会去吃人,怎么会去复辟奴隶制?

古人把合于理的制度称为“礼制”。《左传》上有许多“君子曰”，都是一些思想家或者政治家品评历史的话语。他们总是用“礼也”或者“非礼也”来做评定。所谓“礼也”，就是符合天理或者道德的做法；“非礼也”就是不符合天理或者道德的做法。以前，我们常常有一种成见，认为礼不过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但是，我们一条一条去查看这些评语前面的史事，就会发现恰恰相反，其中大量的评语是批评执政者的。例如，鲁隐公五年，作为国君的隐公，居然要到棠这个地方去看人打鱼，臧僖伯劝阻说，根据先祖相传的制度，国君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怎么可以放下该做的事情不做，而去看打鱼呢？隐公不听，还是去了。结果史官就用“公矢鱼于棠”这五个字记录在案，作为警示。《左传》用“非礼也”作为对这件事的评语。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根据春秋时期的礼制，诸侯宫庙的楹柱不施油漆，椽子不加雕刻。可是鲁庄公为了迎娶夫人哀姜，先是“丹桓宫之楹”，就是把桓公之庙的楹柱都刷成了红色。接着又“刻桓宫桷”，就是要雕镂桓公之庙的椽子。大夫御孙劝谏说：我听说这样一句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鲁国的先君都有“共德”，而您居然做这种大恶之事，这恐怕不妥吧？御孙这句话里面的“共”，是“洪”的假借字，洪是大的意思。“德之共”，就是德之洪，是德里面的大者。而庄公的奢侈之举，正是“恶之大”者。所以，鲁国的史官把这两件事都记了下来。《左传》评论说，庄公做的这两件事“皆非礼也”。

当时的政治家谈到“礼”的时候，都是把道德作为它的注脚的，下面我们再来举几个例子。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赵衰说：“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把礼乐看作是“德之则”。《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叔向说：“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

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把礼看作是推行政令的车子，而政令则是以身相守的道德原则，丢了就会出乱子。《左传》昭公二年，叔向说：“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则礼与忠信、谦让又是互为表里的东西。

第17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6)

礼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从某种意义来说，礼就是为了情感而制作的，所以《礼记》说“礼者，因人之人情为之节文”。例如，父母双亲去世，人虽然不在了，但是彼此的感情还在，所以子女每逢季节转换，或者岁末的时候，应该通过祭祀的方式来追思自己的亲人。祭祀的时候要诚敬，应该“事死如事生”，要像侍奉生者那样侍奉死去的亲人。所以《论语》上说，对待父母至亲，要做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是为了培养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

君臣之间虽无血缘关系，但长期共事，彼此的情谊非同一般，所以当一方死亡时，另一方在情感上有所表现，才是符合于礼的。晋国大夫智悼子（荀盈）死，尚未埋葬，晋平公即开怀饮酒，并命乐师师旷、近臣李调陪饮，又鼓钟助兴。杜蒉听说后，直接进入寝门、上堂，斟酒命师旷喝下，又斟酒命李调喝下，然后自饮一杯，下堂欲走。晋平公怪而问其故。杜蒉说：纣王死于甲子日，夏桀流放于乙卯日，后来的君王无不把甲子、乙卯作为忌日，不敢奏乐。此时，晋国大臣智悼子的灵柩尚停在堂上，悲痛远比甲子、乙卯之日为大。师旷身为晋国乐师，居然没有提醒国君，所以，我让他喝罚酒。而李调是国君的近臣，竟然贪此酒食而忘记国君的过错，所以也要喝罚酒。晋平公问：可你自己也喝了罚酒，这又为何？杜蒉说：我不过是执掌膳食的宰夫，却超越职权，过问起国君的过失，所以也要受罚。于是，杜蒉洗过酒爵，斟上酒，高高举起。晋平公惭愧极了，对左右侍者说：“将来我死后，一定不要废去这个酒爵，要永远记住杜蒉的劝戒。”后来，人们把宴会结束前的最后一次献酒称为“杜举”，即缘于此。

儒家主张，父子之情为人间最为真挚的情感，应该超越政权、金钱等等。晋献公死时，重耳（即晋文公）正在国外流亡。秦穆公派人

前往吊唁，同时建议他利用献公新亡，国中举丧的机会，回国夺取政权。重耳听从舅犯（即重耳的舅舅狐偃）的意见，拒绝了秦穆公的建议，对使者说："我长久逃亡在外，父亲去世而不能回国哭泣尽哀，哀恸无比，哪有心思去夺权？"说罢磕头触地，不敢拜客受吊，哭着起身，也不与使者说私话。使者回国向秦穆公报告出使经过。秦穆公称赞重耳仁义，说："重耳只磕头触地而不拜，说明他不敢以献公的继承人自居，所以也不敢拜客受吊。哭着起身，表明他对父亲的真挚情感。不与使者说私话，说明他没有趁丧夺权的念头。"

以上史事哪里有半点拥护奴隶制的影子？

"以理杀人"与"以礼杀人"

从上面列举的材料不难看出，自古以来，人们都把礼作正确的行为准则，人性化的国家制度，检验为政得失的标尺，这是先秦人本主义思潮确立以后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那么,这么先进的理念怎么会与"吃人"扯到一起去呢?其中的原因，除了吴虞等人的激进之外，还与另一场学术争论有关，这中间的过程，大家很少去深究。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必须予以说明。

宋明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这是一个至今为人诟病的口号。但它并不是宋人凭空独创的东西，而是有其来源的。天理、人欲这一对概念，最早见于《礼记》的《乐记》篇："人化物也者，存天理而灭人欲者也。"儒家认为，天理是公理，人欲是私念,两者是对立的。程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则与禽兽何异矣。"意思是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的内心有天理，所以人懂得礼义廉耻，能够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如果人心中没有了天理，人和禽兽就没有区别了。然而，只要不是圣人，任何人的内心都是天理与私欲并存的，只是何者占据主导地位罢了。程子认为，造成天理不明的主要原因是人欲的存在，因而主张彰显天道，用道德规范来节制私欲。但是，程子的态度比较偏激，认为天理与人欲形同水火、无法调和，"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他的本意是希

望“损人欲以复天理”，警示人们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排弃私欲,弘扬天理。遗憾的是，他把天理与人欲的对立推向了极端，并且把男女尊卑之序比作天理，把害怕饥饿寒冷比作人欲，要求人们禁绝私欲，尤其反对寡妇再嫁。按照这一理论,连人的生理欲求都成了私欲,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种过于极端的理论，居然得到了包括朱熹在内的众多理学家的认同。

第18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7)

清初,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反理学的思潮,一些学者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根为宋明学者成天空谈心性理气。清代学者戴震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对宋明理学家的天理、人欲的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天理就是自然，人欲是人的自然本性，天理和人欲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天理就在人欲之中。“存天理，灭人欲”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成了“忍而残杀之具”。所以戴震认为宋明理学家是“以理杀人”。

平心而论，宋明理学盛行于当时，主要是在学术界，在实际生活的层面上，它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反对寡妇再嫁也没有成为法律，只要读一读明清的小说和史料就可以知道，明代社会生活中的妇女并没有因为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而受到特殊的压抑，实际生活的现状与宋明理学之间的距离是非常明显的。

与理学的境遇相反,礼学并没有受到清代学者的责难。由于满族在入关南下之初,曾经采用非常野蛮的手段强迫汉人剃发,在文化上认同他们。清人的这些举措,使得汉族知识分子痛心疾首,顾炎武一方面从事反清复明的斗争,一方面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来唤醒大众。还有一些学者用学习和研究礼学,甚至在生活中按照汉人的礼仪行事的方式,暗中对抗清朝的文化。例如,山东济阳学者张尔岐,其父为清军所杀,所以终身不仕,而且抱定《仪礼》一书研究,母亲去世后,葬礼完全按照《仪礼》中的丧礼仪轨来进行。所以,清代学者中,不仅没有指责汉族传统礼学的,而且传统礼学的地位远比宋明时代高,研究礼学成为热潮,研究《周礼》《仪礼》《礼记》的学者,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从清初的张尔岐开始,一直到清末的孙诒让、黄以周,大家辈出,名著迭现。乾隆年间,清政府甚至出面罗致学者修《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和《礼记义疏》,即所谓的“三礼义疏”。学术界对传统礼学的评价都非常之高,从来没有人说过“以礼杀人”的话。

吴虞等人把“以理杀人”偷偷改成了“以礼杀人”,轻轻一字的改动,似乎漫不经心,却把整个中华文明历史颠覆了!当年戴震批评理学家“以理杀人”,问题的边界是非常清楚的,主要集中在“存天理,灭人欲”的议题上,如果再扩大一点,也不过是宋明理学。戴震从来就没有颠覆中国文化的企图,他对宋明理学的批评是学术性的。吴虞等人把矛头指向了礼，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礼的概念要比理大得多。我们曾经多次谈到过,它几乎包含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国家典制到行为方式，都在它的范围之内。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把礼否定了，就把儒家思想的体系彻底否定了,也就把整个中国文化否定了。我们读吴虞的文章,没有多少学术性,而是谩骂式的。在吴虞的笔下,几千年来,中国不仅杀人如麻，而且手段卑劣,越是讲仁义道德的人,就越是杀人狂。我们实在不知道,吴虞在放出如此重话的时候,是否认真地掂过它的分量,它的后果。

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学生在街头演讲

金耀基先生指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批判传统，只看到传统中坏的或极坏的因素，认为非打倒传统不足以开启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批判精神是应该肯定的，在当代少有勇猛创新的气象。但它对中国文化的评估是片面性，以此并未能提供一条现代化的路向，盖在五四主流的思维架构下，导出‘全盘西化’的结论是有必然性的。”（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第250页，台北时报出版社，1988）吴虞等人的言论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思想界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信心已经崩溃。

不管怎么说,“五四”以来，知识界批判封建文化，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如果说吴虞等人把封建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骂倒,全部搞臭,他们的偏激,是矫枉过正，那还有可以让人原谅的地方。在经历一个世纪之后，他们抛弃传统礼仪文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已经充分显露出来。如果今天有人还是停留在吴虞的那些话上，继续谩骂，全盘否定中华礼乐文化,那我们就没有一丝可以原谅他们的理由了。

第19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8)

（2004年9月20日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的讲演）礼乐人生：

君子风范与礼乐之道人的成长离不开学习。

我们从小学开始，要读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的书。时下，家长把孩子送进小学，企盼他考入重点中学，再考上名牌大学。把多少学生送进重点高中或者大学，成了社会评价这所学校的惟一标准。在许多家长、孩子的心目中，上大学就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过上好日子。难道这就是我们办学的目的？能够升入大学的学生是少数，没考上的怎么办？对于千千万万学生来说，读书与人生究竟是什么关系？作为他们立足于社会的人格教育，究竟由谁来培养？中国自古就崇尚教育，我想来回顾一下儒家的教育理念，看其中是否还有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地方。

读书与修身

儒家认为，儿童教育首先是人格教育，学习做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然后才谈得上其他。我们看古代的童蒙类书籍，几乎都是从修身开始讲起的。因此，人之所以要读书，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精神需求，是为了闻道明理，求得正确的人生坐标。孔子把学习的目的区分成两种：为人之学和为己之学。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意思是说，古人是为了自己修身的需要才读书的，而今天的人是为了他人才读书的。对孔子的这两句话，朱熹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书好比是食物，因为肚子会饿，有内在的需要，所以才需要食物，这是"为己之学"。而有些人不然，他们的食物似乎不是为了自己食用的，而是放在门口给别人看的，炫耀自己家里有多少食品，这就是"为人之学"。

"为人之学"，不是为了修身，而是为了利禄，就是找份好工作，过个好日子。孔子非常鄙视这种"为人之学"，他对子夏说："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君子儒"和"小人儒"同是读书人，但读书的

起点和终极目标却是判然有别的。君子儒努力修身进德，有兼济天下的胸怀。小人儒则成天盘算一己之私，没有对于大众、社会的人文关怀。两者可谓水火不容。

那么，“为己之学”应该如何措手呢？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从十五岁就有志于学，经过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等阶段，最后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不管是颠沛流离，还是艰难困厄，始终不放弃学习和对真理的探求，他说自己的一生，都处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状态，为了做有道之人，无时无刻不是据德依仁，而游文于六艺之中。孔子读书是为了淑世救民，所以他才会有常人所不及的坚毅。

乐与人生

如果说礼的作用是从外表来规范你的行为举止的话，那么乐的作用就是从内心来扶正你的性情，使得修身的功夫由外入内，进入更深的层次和更高的境界。

人是性情的动物，也是最容易被情绪左右的动物。喜怒哀乐伴随人的一生，可以带来福，也可以带来难。人之所以需要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根本的原因是在自己的情绪上，对某一事情好恶过甚，在行为上就容易偏颇，甚至失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礼只解决“标”的问题，而没有解决“本”的问题。俗话说“心病还要心药医”，所以，一方面要解决行为失范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解决导致行为失范的心性问题。

战国楚?铜编钟

大家都有一个体会，就是音乐对于人的情绪的影响最为直接、最为强烈。你要是听了《黄河大合唱》，马上就会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上前线；你听了《高山流水》，立刻会心静如镜，意存高远。如此之类，不胜枚举。儒家非常看重音乐的这种妙用，孟子曾经感慨地

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心上》）《礼记?乐记》也注意到乐可以打动人心，使人心向善的作用："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孝经》更是看到了好的音乐对于转换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可谓深得其旨。

第20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9)

礼的几个原则

中华是礼仪之邦，礼之丰富，举世罕见。古人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说法，极言它的繁复。经礼就是重要的礼，人们常说“大经大法”，这里的经和法，就是指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曲，是弯曲，一个东西把它弄弯曲了，它就变小了，所以把细小的礼节称为曲礼。礼的内容那么丰富，它的条目如此繁多，对于并不从事礼学研究的人来说，要记住它们，岂不是太过困难？又怎么去践行呢？

其实，礼的形式虽然繁复，但它是有体系、有纲领的，只要会提纲挈领，就不难把握。比方说，一张渔网，上面有上万个“目”，就是网眼，数目不可谓不多，可是它们都系联在“纲”上，就是收网用的大绳子，只要把纲举起来，万目就自然张开了；一件裘衣，上面有数十万根狐毛，看似错综复杂，但只要提起衣领，它们就自然地理顺了。那么，礼的纲领是什么呢？是德。所有的礼，都是围绕着德展开的，都是为了弘扬和表彰德而设计的。违背了德的任何仪式，都不能称为礼。因此，抓住了德，就抓住了礼的根本。

德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确实存在的。为了要把它显现出来，就需要有具体的德目，比如忠孝、仁爱、诚信等等。而这些德目也是抽象的，还需要进一步显现，于是就需要诸多的礼仪，而礼仪却是可以触摸和感知的。礼仪的制定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只有这样，它才是有道德内涵的。贯穿于各种礼仪的原则很多，前人并没有进行集中的归纳。因此，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常常感到困难。为了方便读者和听众，我本着简明、便于记忆的愿望，把礼仪的原则归纳为敬、净、静、雅四个字，不一定准确，但在目前尚没学者来归纳的情况下，不妨先来试一下。

敬 所有的礼仪，都包含“敬”的原则，以致可以说，没有敬就没有礼。许多前贤甚至用它来概括礼的精神。比如《孝经》用一言以蔽之

的口气说道："礼者，敬而已矣。"《礼记》开卷的第一句话就是"毋不敬"，这是从反面来要求。东汉著名学者解释"毋不敬"时说："礼主敬。"我们古代所有的礼，都是试图培养你内心的"敬"，对父母、对兄弟、对配偶、对长上、对事业，都不能有不敬之心。

静 一个修养很好的人，身上必有"静气"，神定气闲，沉静从容。《大学》开卷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段话的意思大家都很明白，就是人生追求的目标，是止于至善。《大学》紧接着又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思是说，知道止于至善的人，志就有定向，心就会宁静，随处而安，思虑精详，就能得其所止。立大志者，懂得"宁静而致远"的道理。俗话说："宽阔的大海平静，浅窄的小溪喧嚣。"所以说，静是君子的气象之一。

净 越是文明的民族，对居址、食品、衣服等等的卫生程度要求越高。中国人自古就讲究卫生，甲骨文中的"若"字，是一个人洗完头之后在梳理头发的样子。头发梳理整齐后，还要挽成发髻，插上用骨或者玉做的笄，把它固定住，发髻外面要用一块称为"（ｓｈǐ）"的帛包好，然后再戴上冠，非常讲究。至迟在唐代，政府工作人员有每旬沐浴一次的规定。

中国人在传统礼仪中，往往通过"净"来体现尊敬之意。例如，北京的天坛是明清两代天子祭天的地方，旁边有一座斋宫，天子祭祀之前要在这里沐浴斋戒，以表示对神的敬意。祭祀用的牲，宰杀前都要处理得很洁净。祭器也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擦洗，有些食品上面有专用的布覆盖，以免沾上灰尘。祭祖也是如此，卫生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古人尊奉"事死如事生"的原则，祭祀父祖的程序，要与他们生前受到的奉侍完全一样。因此，我们从祭祀仪式可以推知，生者的生活是非常讲究卫生的。

雅 生活文明而又有教养的人，言谈举止必然都很文雅。有人觉得西方人吃东西很文明，他们那套规矩，中国人都没有。其实这是一种

误解。我们读《礼记》就可以知道，古人就餐非常文雅：吃东西不能发出声响；汤要小口喝，不要弄得满嘴都是；不要当众剔牙；吃肉骨头时，不要啃出声音来；不要把筷子当叉子去抄食物吃等等。此外，关于坐姿、站姿、服饰等都有严格的要求。

第21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20)

这里，我们尤其要提到古人丰富而典雅的礼仪辞令。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之一，它的表现力非常丰富。比如对方赠给自己礼物，要回答说："敬谢厚赐！"对方宴请自己了，要说"承蒙赐席！"称对方的家，要用"尊府"、"潭府"、"府上"等词。向对方赠送礼物，东西再好，也要说是"薄礼"，不过是"聊表寸心"、"聊为芹献"、"区区微物，不成敬意"等等。这些优雅的语言，今天的年轻人听了都觉得耳目一新，非常喜欢。

可是，"文革"十年，以粗俗为美的习气，至今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随地吐痰、衣冠不整、行为懒散、满嘴脏话之类的失礼行为，低头不见抬头就见。有人认为，言谈举止不雅，无碍大局。殊不知，一个民族的形象会就此受损。"文革"已经过去了三四十年，现在该是彻底清除它的粗俗文化的影响的时候了。

有人认为，对别人介绍自己的妻子说"这是我老婆"和说"这是我内人"，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干嘛非要说那种文绉绉的话？确实，这两种语言要表达的内容是相同的，但却有雅和俗的区别，反映出你受教育的程度。一个中学生给父母写信，说"爸爸妈妈身体好吗"这样的遣词用句，与他的受教育程度是一致。但是，当这个孩子上了大学之后，还是用这样的字句写信，就有些奇怪了，因为你的文字表达方式没有任何提高，它与你受教育的程度不相称。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难道你就写不出更有文采的信来吗？我们去读读曾国藩的家书，去读读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的书信集，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学养深厚"。把他们的书信和自己写的书信放在一起，你就会明白什么是高雅，什么是低俗，你会汗颜的。

以上，我简略地谈了礼的四条原则，如果大家时时用它来提示自己、衡量自己，那么，你的德行就会与日俱增。

曾经有学生问我："古书上有没有不许随地吐痰的规定？"我告诉："没有。"难道古人允许这种现象？当然不是。古人以立德为本，只要心中有德，则言行自然会考虑是否妥当，随地吐痰属于非常低级的错误，古人自然不屑来讨论它的合法性问题。

还有同学问我："时代在发展，新事物不断出现，有些时候应该怎样讲礼，书上都没有提到，那怎么办？"其实，类似的问题，古人也会碰到，从古到今，社会生活的变化每天都在出现，人当然不可以过分泥古，而要与时俱变。《礼记》上有"礼，时为大"的话，意思是说礼一定要跟上时代，所以，隋唐的礼与秦汉不完全相同，明清的礼与宋元不完全相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过，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形式上，而礼的内核，也就是道德理念，则没有太多的变化。如果连内核也变了，礼也就消亡了。那么，礼变化或者创新的依据是什么呢？《荀子?大略》说："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意思是说，礼一定是顺应人心的。"亡"通"无"，就是没有，"亡于礼经"，就是在礼的经书上找不到的，只要你的做法顺乎人心，那就是礼。《礼记?礼运》也说："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意思是说，礼是以"义"作为内涵的。用义来考量自己的做法，如果两者是一致的，那么即使先王从来没有提到过，那也是符合礼的。"可以义起也"是一条制定新礼的原则。因此，我们不必处处泥古，而应该有"法古开新"的气魄。

（2004年6月17日在民进中央机关的讲演）

第22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

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

礼乐人生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人文奥运与首善之区：

理与礼的探究“人文奥运的理和礼”的题目，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什么是“人文奥运”的目标？第二，为什么举办北京奥运要提出礼仪教育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想谈谈我国古代的体育精神。

什么是“人文奥运”？

从1992年起，我国政府和人民就开始申办北京奥运，期间曲曲折折，艰辛得很，居然用了八年的时间才获得批准，为此耗费了庞大的资源。为了办好北京奥运，我们还要建设许多比赛场馆，今后的投入还会更多。时下有一个时髦的说法，叫“投入产出比”。这是一个商业运作的术语。投资做一个工程或者项目，要做到投资尽可能少、产出尽可能多，反之就会认为是失败了。北京奥运的投入如此的巨大，我们期望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换句话说，北京奥运，我们究竟要什么？这个问题现在必须把它想得很透彻，想得很清楚，否则，将来就没有办法来评估这届奥运是否成功。

为什么北京奥运前要进行普遍的礼仪教育？

刚才我们谈了人文奥运的“理”，“道理”的理；下面我们来谈人文奥运的“礼”，“礼貌”的“礼”。从我们前面的介绍中大家已经知道，“人文”与“礼”是密切联系的，要谈“人文”，就一定要讲到“礼”。如果说“人文”一词还是属于理论上、认识上的问题，那么“礼”就是属于实践上的问题，并且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而我们只有不到四年的时间了。

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照道理来说，要办人文奥运，正是我们的强项。可是，遗憾得很，近代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极端偏激的态度，把它当作沉重的历史包袱，总是想丢

掉它，甚至不惜对它进行扫荡和摧残。一百多年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更是屡屡受到抨击，被指责为“吃人的礼教”，是“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甚至将礼与奴隶制画等号。人们曾经用非常幼稚甚至是非常无知的眼光来看待礼。比如说，人和人见面，为什么要行礼？为什么要鞠躬？鞠躬不就是卑躬屈膝吗？“文革”中，“大老粗”是褒义词，是光荣的。举止粗鲁，说粗话，成了无产阶级的“本色”，是引以自豪的表现。久而久之，礼就日益远离了我们，我们由此生活在了一个没有礼的社会。殊不知，大凡文明一点的国家都是有礼仪规范的，没有礼的社会是失范的社会，是有问题的社会。很多同学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所以也不觉得什么。其实，问题已经严重到令人焦虑的程度了。

我们先来看国内。礼的作用之一是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而要和谐，就必须处理好人与人的各种关系。比如一件涉及到对方的事情，就有一个谁先谁后的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纠纷。知书达礼的人，懂得尊重他人，懂得谦让，先人后己，处处把对方放在优先的位置。我们平时经常说的“礼让”，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许多人恰恰不懂这一点，处处与人争抢。不守秩序已经成为最普遍的社会现象。等候汽车，即使只有两个人，也不肯排队。公共汽车一来便往上挤，一步也不肯让。现在北京的马路越修越宽，可是堵车也越来越严重，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驾车者不懂得礼让，超车、加塞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有一次，我坐朋友的车外出，车快到西苑附近的一个三岔路口时，突然走不动了。下车一看，原来是许多车挤成一团了，彼此犬牙交错，谁也不肯让，结果谁也走不了。这种人为的混乱，我想大家都见过。

外国朋友到中国，最反感的现象恐怕是随地吐痰。咱们学校新闻传播学院有一位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的老师，她说回国以后，最看不惯的是随地吐痰。她住在清华北门，每天骑车到办公室去，距离不远，几分钟就到了，可是就这么短的路程，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至少

十个人随地吐痰。她的话一点也不夸张。我们甚至在公共汽车里，都可以看到有人往车箱里吐痰。有外国人称中国是吐痰的王国，称北京是吐痰的国都，真是令我们汗颜！一个“非典”，我们民族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可是居然连一个随地吐痰的毛病都没改掉，真是悲哀。在社区，许多居民不重视他人的感受，乱丢垃圾，践踏草坪，蹲踩公共座椅，大声喧闹，不尊重他人的休息权利。

礼是要讲尊重的，如今孩子不懂得尊重父母，学生不懂得尊重老师。尊重是通过礼仪来表达的，在大学校园里，有师生礼仪吗？没有。学生给老师起绰号，恐怕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有些学生上课迟到了，旁若无人地、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有的穿着皮鞋，也不知道放轻脚步，咯噔咯噔地走着，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有的听课时打手机、嚼口香糖。回答老师提问时，有些人都不愿起立。一个普遍缺乏尊重的社会，能说是和谐社会吗？

一些公众人物的素养也比较差。比方电视台的播音员，面对广大听众不行礼，只是直挺挺地端坐着，说一句“晚上好”。节目刚播完，他们就当着听众的面收耳机线，或者互相闲聊，这种对观众的不尊重，已经到何等的程度！只是，大家已经习惯，不觉得这是很失礼的行为。但是你到日本和韩国看一看，他们的播音员一定首先是向观众深深地鞠躬，然后才说问候语。

第23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2)

礼仪交往是要有敬语、敬称的，日本、朝鲜教孩子学礼仪，都是从敬语开始的。他们的敬语，都是受古代中国的影响才出现的，可是我们自己的语言中却几乎没有了。彼此的称谓，除了喊了几十年的老张、小李、师傅，再就是这些年兴起来的先生、小姐，而这些称谓的含义非常混乱，比如“小姐”，有时是贬义词，你叫她小姐，她会非常生气，可是又没有可以替代的称谓，没有了成系统的敬称。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国际形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钱多了，到美国、法国等国家或地区去旅游的越来越多了，这原本是一件好事，可是由于行为粗俗，举止不文雅，国外民众和媒体的反应让我们非常失望。最近《环球时报》有一篇深度报道谈到，欧盟整体对华开放仅仅一个多月，法国媒体就有报道称：“如何解决蜂拥而至的中国游客带来的新问题，如不遵守公共秩序、不讲卫生、损害公物等，将是法国社会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些人在国外的表现如此，在国内的行为如何就可想而知了。那么我们要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从小没有，或者说从来没有受过礼仪教育。

改革开放以后，旅游业已经上升为我们国家的一个支柱产业。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旅游行业的硬件，无论与世界上哪个国家或地区相比都不差。我们大陆的饭店设施，普遍要比香港、台湾等地区和韩国、日本等国家好，而且价格便宜。可是，我们的旅游业投诉是最多的。我们的导游、宾馆里的工作人员素质普遍较差，对人没有礼貌，不知道怎样尊重客人。北京市的各大饭店、商店，墙上都贴着十个字的礼貌用语“对不起、谢谢、没关系、您请”。我看了之后，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们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啊！这十个字是礼仪用语的ABC，如果把这十个字说好了就是礼仪之邦了，那世界上礼仪之邦可就太多

了！问题是我们连这十个字都说不好，这能叫五千年礼仪之邦的“首善之区”吗？

还有更令人生气的，比方说中国民航。我以前有个韩国留学生，我问她，寒暑假回国坐哪个航空公司的飞机？因为北京到汉城有三家航空公司：大韩航空，亚细亚航空，还有中国民航。她说都是坐大韩航空，或者亚细亚。我说，你为什么不坐中国民航？我们国航是全世界安全系数最高的公司，为什么？因为稍微有点问题就不飞了，所以很少出事。不料她回答说：中国民航的乘务员没有礼貌。我感觉很惊讶，情况有这么严重吗？后来我把三家航空公司都乘坐了一遍，我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第一次去汉城，坐的是亚细亚航空的班机，一进舱门，乘务员个个都是毕恭毕敬地向乘客鞠躬行礼，那真是客气！等乘客坐好后，乘务员又递上小毛巾给你擦擦脸，这种方式当时内地是很罕见的。这一方小小的毛巾，乘务员都是用双手递给乘客的，而且微微有点鞠躬。给乘客送东西也都是这样。回顾我们民航的乘务员，都是笔直地站在机舱门口，嘴里说着“你好”、“欢迎”，但是都没有形体语言，显得没有热情和诚意，大概不愿意对客人“卑躬屈膝”吧。给客人递东西，有时简直就是扔给你的。送客饭的时候，也非常失礼，我有时坐在靠走道的位置，乘务员会让我帮着给坐在窗口的乘客递盒饭，我就遵命递过去了。她说，对不起，还有一盒呢，于是我又帮她递给我旁边的乘客。当然，我没有什么，我在“文化大革命”下过乡、当过工人，什么苦没吃过？递几个盒饭算什么！可是人家外国人就不这样想了，人家花了那么多钱买了这张飞机票，人家是来享受服务的，人家可没有义务来帮你工作。国航的这份工资是发给乘务员的，你怎么能让人家来帮着递饭呢？现在国际航空业的竞争非常激烈，一些著名的航空公司都是靠服务质量吸引乘客。而我们的民航似乎浑然不知，服务质量上不去，怎么能指望有好的发展呢？

行为失范和道德水准下降，已经成为新的社会病。了解一个民族，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了解他的精神世界。大家想想，如果这些现象得不到纠正，到2008年，金牌拿得再多，钱赚得再多，只要我们国家的形象被毁掉了，那么，这个损失比什么都严重。你不是要走向世界吗？就这样走向世界？你不是要别人了解你吗？就去了解这样的东西？如果不幸的情况出现了，这场奥运就算是办得不理想了。

第24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3)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了礼，就谈不上“人文”二字。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在全社会做重建“礼”的工作。怎样重建“礼”？可以有两种不同层次的做法：一种做法是立足于应付北京奥运，为了这个目的而推行礼仪，只求外表好看，顾全面子，而没有道德内涵。这样的礼仪教育，实际上是一场“全民秀”，礼仪不过是面具，奥运会开完了就可以丢掉，一切都回到原样。另一种做法是立足于国家的长远发展，立足于切实提升全民族的道德素质，而把奥运会当作一个契机，在这一目标下推行的礼仪教育，注重培植人的内在德性，奥运之后，它依然在推动社会的进步。我想，大家都会和我一样，主张采取后一种方法来推行全民族的礼仪教育。

人文奥运有一个可以凝聚全国民心的目标，围绕着这一目标，我们可以解决许多以前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是一个百年不遇的极好机会。抓住这一机会，赶快把礼仪教育推行开来。四年时间，最低的限度，我们也可以学会谦让，学会在公共场合保持安静，懂得什么是优雅。剩下的事情，在奥运会之后还可以接着做。只要接着做，就有希望。

推行礼仪教育的工作是如此的重要，作为清华的学生，我们应该怎样投身其中呢？这是需要各位很好地思考，并且要见诸行动的事情。

改革开放之初，北大和清华各提出过一个口号，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北大提出的口号是“振兴中华”，清华提出的口号是“从我做起”。这两个加起来就非常好。所以我想借助于我们这个“时代论坛”，借助于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来呼吁一下，如果大家赞同我以上所讲的东西的话，我们能不能“人文奥运从清华做起”？诸位是社会精英，要有“为天下先”的理念。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些行为规范？比如说，在校内骑车速度不能太快，到十字路口要礼让。一辆汽车开进校内，到处有限速

的提示牌，可是不少同学骑车，速度比汽车还快，这样不安全，也不尊重他人。我在主干道上骑车，常常感到提心吊胆，生怕被冲过来的车撞倒。我们人文学院有好几个老师被学生撞过。不光在校内，我们清华的学生走出去，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不仅有知识，而且有文化自觉。我们中文系的老系主任徐葆耕老师，快七十岁了。有一次我要去北大做讲演，途中遇到他，他问我讲些什么，我说礼仪文化。他说："这太重要了，应该讲！我经常在清华门口坐公共汽车，车上有不少清华、北大的学生，可是很少有人给我让过座！"我们的老教授出门，自己的学生连让个座的都很少，这就很糟糕了。所以，我希望推行礼仪教育要从自己做起，从我们学校做起！通过每一位同学的行动，来改变学校和社会的面貌，一起来实现人文奥运的目标。

当前礼仪教育存在的问题

为了办好北京奥运，现在有关部门正在下大力气开展文明礼仪的教育。这种活动不能说没有一点成效，但是在我看来，至少存在以下三个问题，如果不引起注意，就有走入歧路的可能。

首先，我们向民众普及哪个民族的礼仪？大家知道，礼仪是任何一个文明民族的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与某个民族打交道，最先接触到的，就是服饰和礼仪。服饰和礼仪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我们一提起阿拉伯人、非洲人、东南亚人、欧洲人，除了肤色之外，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的服饰和待人接物的礼节。礼节是民族成员互相认同的重要标志，什么民族行什么礼仪，这是不能错乱的，因为礼仪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只有那些没有自己礼仪的民族，或者试图改变自己的民族属性的人，才会去奉行别的民族的礼仪。

我们刚才谈到，现在社会上已经没有礼仪规范可以遵循了，那怎么办呢？于是有些从事或者热衷西方礼仪的先生，就到处推介西方的商务礼仪，不少宾馆、公司、机关正苦于职工礼仪素质低下，所以非常欢迎这类礼仪，并且积极地加以推动。我看了一些礼仪教材，包括一些地方政府编的、教育部门编的，甚至是礼仪学校编的，大同小

异，几乎都是西方商务礼仪的翻版，比如怎么穿西装，怎么打领带，怎么化妆，哪只手拿刀，哪只手拿叉等等，几乎没有中国人的东西在里面。诸位，不知你们意识到没有，如果把迎接北京奥运变成一个在中国普及西方商务礼仪的运动，中华礼仪从此与西方礼仪画上了等号，从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西方礼仪国度，那可是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也非常搞笑的问题啊！

第25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4)

我们中国没有自己的礼仪吗？怎么可能？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我们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中华礼仪是全世界最为系统、最为成熟的，看看今天的韩国和日本的礼仪，就可以了解中华礼仪的大致面貌，因为他们的礼仪几乎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在最近的一百多年中，中华礼仪才出现了不断衰落的局面。其原因，一是与近代中国的这段特殊历史有关，因为国家当时处于不正常状态；二是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有关。这两种因素交杂在一起，传统文化就很难有容身之地了。现在的形势已经变了，我们理应正本清源，借着北京奥运的机会，重建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礼仪，这才是正确的举措。如果借此机会用西方礼仪来替代中华礼仪，那么不管这些人自己是否意识到，他们都是在消灭我们的民族礼仪。

有人说，北京奥运有四方宾客来北京，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所以我们必须学习西方礼仪。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误逻辑。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交往时用怎样的礼节，是有一个原则的，那就是客人一方必须尊重主人一方的礼仪。我国古代就有“入境问俗”的规定，进入对方的辖地，首先要询问对方的礼俗，这是为客之道。今天，我们出国之前要了解到达国的习俗，也是这个道理。“入境问俗”的原则，是当今世界遵循的原则。世界上又有哪个民族是没有自己的礼仪的呢？外国友人来中国之前，同样要学习和了解中国人的礼俗，并且要尊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避免做出伤害主人感情的事来。2008年北京奥运时，我们是东道主，我们理应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方式，而不是用外国人的礼节，来热情接待四海宾朋。

现在有些人不厌其烦地在教大众怎么吃西餐，怎么拿西式餐具，并且美其名曰：学会款待外宾。这种理由是似是而非的。这等于是向全世界宣示，我们中华民族不需要别人尊重，我们出国用外国礼仪，外国人来中国也用外国礼仪！外国人到中国来就应该入乡随俗，使用

筷子。大家想想，我们到外国人家里去做客，他们不都是让我们用刀叉的吗？周恩来生前出访的国家非常之多，但从来不会要求对方为自己改变生活方式。如果对方吃饭是用手抓的，那么他也一定和主人一样用手抓饭吃。记得“文革”前，我看过一个电影剧本叫《白求恩大夫》，里面有这样一个场面：过年了，白求恩在百姓家里吃饺子，他笨拙地用筷子夹饺子，可是怎么也夹不到嘴里。他看到主人家的小姑娘灵巧地夹起了饺子，惊讶地竖起大拇指，连声说：“天才的外科医生！”白求恩是外国人，但他并没有要求主人为他准备刀叉，这是他尊重中国人的地方；主人也没有因为他是外国人，而为他准备刀叉，因为客随主便，这是尽人皆知的待客之道。

我有一位朋友，是台湾高雄中山大学的教授，她跟我讲了自己做过的一件“蠢事”。有一次，一位美国朋友去高雄，为了盛情款待他，就请他在当地一家最好的西餐店吃饭。结果是钱也花了不少，可是人家不领情，说：“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这种东西我在美国天天吃。你应该请我吃台湾民间的小吃。”外国人来中国，是体验中国文化的绝好机会，无论是进餐还是娱乐，他们都会希望用纯粹的中国方式的。其实，我们出国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我们前往的国家，风土人情都和我们一样，那谁还有兴趣去？

非常有趣的是，北京有一家媒体宣传人文奥运，在一段时间内，每天用一个版面的篇幅来介绍外国礼仪，今天是西班牙，明天是比利时，后天是瑞典，没完没了。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是北京市民要组团到这些国家去旅游吗？显然不是。是为政府部门做迎宾准备吗？也不像，因为政府外事部门有礼宾司，这些事情不用外人操心的。是为了帮助老百姓迎接外宾吗？那就更奇怪了，老百姓不可能系统学习列国礼仪之后才能“持照上岗”吧？此外，假定有五个不同国别的游客访问一位北京老百姓的家，那主人该如何招待他们？以我之见，不管来自哪一国，统统请他们吃饺子，而且一律使用筷子就是了，根本用不着准备刀叉，但是外宾一定会高兴。

第26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5)

最近，媒体上关于国民礼仪教育的报道越来越多，热点之一是外国人教中国人礼仪，有一则消息说，有德国人教某地的中国人如何文明如厕。听起来真是惭愧，我们的国民怎么连这种知识都要外国人来教！难道我们自己没有进行这种教育的能力？还有一则消息说，有一位从英国归来的中国人，开了一个礼仪培训班，教中国人学习英国礼仪，目标是要达到能与英国女王一起进餐的水准，收费标准是每人九百美元。如果办班人是出于商业目的而这样做，那无可厚非；但如果是出于改变中国人的文明程度而这样做，那就有点匪夷所思了。礼仪教育，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取法于某个西方国家？

照我们目前的礼仪教育的势头，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可能向世人展示中华民族的礼仪，那么，北京人文奥运，我们国家的文化主体究竟何在？如果在北京奥运期间，以文明古国自居的中国到处流行欧美礼仪，那将是非常丢人的一幕！那将成为旷世笑料、千古奇谈！我们不禁要问：到时谁来负这个责？

其次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推行礼仪教育？大家都会说：是为了迎接北京奥运。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不能算是全对。因为，如果这样回答算全对，那么，我们要反问一个问题：如果2008年北京不举办奥运会，那么我们还要不要推行礼仪教育？

在我们看来，礼仪教育是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2008年我们办不办奥运会，这项教育是一定要排到议事日程中去的。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达程度，并非只是看科学技术和物质生活的水准，看GDP的高低。那只是一个方面的指标，还有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层面的状况，包括受教育的程度、道德文明水准、人文关怀的有无等等，其中不可或缺的具体指标之一，是礼仪文化。物质文明发达，而精神文明低下的社会，是残缺的社会，文明发展不完整的社会。礼仪是进入文明阶段的人才有的行为准则，它展示

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和深层理念。没有礼仪文化的社会，不可能是和谐社会；不懂得礼仪文明的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明人。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刻薄地咒骂我们千年积淀而成的礼仪文化，认为它是虚伪的形式主义，无补于我们的社会进步，因而几乎将它抛弃殆尽。现在我们终于尝到了失去了它的苦头，道德文明的滑坡和社会生活的无序，严重损害了国民的形象，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甚至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迎接北京奥运，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提升全民族礼仪文明水准的契机，使我们看到了礼仪文明的重要性，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因此，如果看不到礼仪教育对于国民素质的重要性，而把目光仅仅盯住2008年的北京奥运，那么，就会把礼仪教育看作是应付这场盛会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为了民族的长远发展。那样做，无异于把迎接人文奥运变成一场“全民秀”，北京奥运结束之后，一切依旧，行为粗俗、随地吐痰、不守秩序，一切故态复萌。我们不仅欺骗了四海的宾朋，也欺骗了我们自己。更加严重的是，由于这场“全民秀”嘲弄了全民学习礼仪的热情，在可以看见的时期内，人们将很难把它再次点燃起来。

第三个问题是治标不治本。中华礼仪最显著的特点是，讲究内外兼修，不仅要求言谈举止上温文尔雅，循规蹈矩，而且内心要有鲜明的德性。用先秦儒家经典《礼记》里面的一句话来表述，就是“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辉动于内的德，是言谈举止处处合于礼的原动力，也是礼之所以合于理的根本原因。

而时下的礼仪教育太过注重形式，而比较忽视行为主体的内在道德问题。最近我们看到一些礼仪教科书，有把礼表面化、工具化的现象，比如教握手，要求手伸出来的距离要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比方说三十五度，否则就是不合格；双方的手相握，只能停留三秒钟，否则也是不合格。如此等等。有趣的是，对于微笑也有规定，有一本礼仪书上说是不能露出牙齿。还有一位先生到我们学校做讲演，对微笑所下的尺度却是露出六颗牙齿。有一天北京某主流媒体在头版刊登了

一条类似于喜讯的消息，说是今后考核公务员的微笑是否合格，已经有了可以检验的标准了。不知这家报纸是把不露牙作为标准，还是把露出六颗牙作为标准？不过，我对着镜子照了照，发现自己如果闭着嘴不露牙，根本就笑不出来，或者只能是皮笑肉不笑。而一旦张开嘴笑，就不能保证只露出六颗牙。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的标准，我居然不会微笑！

第27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6)

这种礼仪教育，用来培养宾馆服务员可以，用来培养青少年学生和广大民众就肯定行不通，那样的话，人都要被训练成机器人了。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进行国民礼仪教育的。这类商务礼仪，注重外表和形式，很少或者根本不关注学习者的内在素质。我们在许多宾馆门口见到过许多女服务员，他们衣着华美、举止得体，可是谁见了都没有亲切感。

中国古代的体育精神

假如我是一名外国记者，2008年我来北京采访，我一定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不是五千年文明古国吗？那么，在古希腊开创奥运会的时代，你们古代有体育运动吗？如果有体育运动，那么有体育精神吗？如果有体育精神，那么与古希腊的体育精神相比，你们的特点何在？谁能把这些问题回答出来？如果谁都回答不出来，那人家就会说我们的五千年文明就是吹牛了。

我们古代有没有体育运动？当然有，比如汉唐的时候就盛行打马球。那个时候一到中秋节或者端午节，人山人海地打马球，很有群众性。但是，古希腊的第一届奥运会是在公元前776年，我们晚了好几个世纪。我们再看文献记载，战国时期临淄的“蹴（cù）鞠（jū）”，就是最原始的足球运动，非常流行。国际足联经过调查、论证之后，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是足球运动的故乡。战国时代是在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它比马球的年代要早得多，但还是比古希腊首届奥运会晚。奥林匹克起源时期相当于我们的春秋时期。那么，春秋时期有没有体育比赛呢？回答是肯定的：有！在春秋时代，每年的春、秋，中原地区各乡、各州都要举办一种称为“乡射礼”的体育比赛。

至迟在新石器时代，弓箭作为打猎和战争的重要武器，就为人们所掌握了。中国射箭技术之高，在世界上也是闻名的。在汉字古文字里，“侯”字是一个会意字，画着一块布，也就是靶子；还有一个“矢”

字，也就是箭。最早选军事领袖，是根据射艺高强与否来决定的，射中者为“侯”。这就是“诸侯”的“侯”字的本义。夏朝有羿射九日的传说，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春秋时期楚国神射手养由基，能在百步之外射中柳叶，而且百发百中。养由基的射技，不仅体现在准确性上，他的臂力也非常惊人，能一箭将绑在一起的七副盔甲射穿。这种以比赛武力为主的运动，在儒家的影响下，逐渐演变成为射礼，将礼乐教化与体育比赛完美地糅为一体。

乡射礼的地点在乡校，射手们按照实际水平分成两队，每次各出一人比射。乡校的正北，有一座堂屋式的建筑，选手在堂上并排而射。箭靶与堂上的射位南北正对，间距是一把弓长的八十倍。报靶、计算成绩，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体育比赛，它的年代与第一届奥运会相当，甚至更早。

我们先来扼要地了解一下乡射礼的主要过程。乡射礼的射箭比赛一共进行三轮，称为“三番射”。第一轮是教练，由一名担任司射的人做示范，并宣布比赛规则。这一轮是试射，所以不管射中没射中，一律不计成绩。第二轮起，属于正式比赛，凡是射中者，工作人员要用算筹记录成绩。第三轮比赛时，乐队演奏规定的乐曲。这些乐曲都选自《诗经》，内容纯正高雅，节奏中正平和。射手要按照乐曲的节奏跟着鼓点发射，这是检验你的身心是不是和谐。这样子射中了才是最难的。如果没有按照这一要求去做，即使射中了也不计成绩。最后，工作人员宣布比赛结果，负方饮罚酒。

下面我们来看看，乡射礼提倡的体育精神与古希腊奥运会相比，有哪些不同。大家知道，古希腊的奥运精神是“更高、更快、更强”。所谓更高、更快、更强，这三个东西都是就人的体能而言的。为什么古希腊人要这样强调体能呢？我想有两个原因，首先，古希腊处在城邦时代，城邦与城邦之间彼此征战不息，为了提高战士的战斗力，不得不强调人的体能。第一届奥运会的几项运动，摔交、射箭、丢标枪、扔铁饼等，实际上都是军事体育。其次是宗教原因，古希腊处在

神话时期，人的思想、精神、灵魂是由神来管的，所以奥林匹克竞技场设在奥林匹亚山的神庙下。奥运会的目的之一是媚神，在神面前展示自己的健美。我们中国不然，我们早在西周就脱离了神话时代进入了人本主义时代。中国人的灵魂是要自己来管的，人要道德自律，没有神看着你，自己要把握好。这和古希腊是大不一样的。怎样把握自己？要通过礼。礼是道德的具象，是道德在人身上的体现。没有礼，道德就是一句空话。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第28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7)

乡射礼所蕴涵的人文精神非常丰富。比方说，要取得比赛的胜利，首先要外体直、内志正，儒家的礼仪教育，特别强调形体和心志的正直，在这里儒家巧妙地把比赛时候的形体要求与道德要求融会在一起。其次，既是比赛，就会有竞争。乡射礼提醒射手，要尊重竞争对手，彼此在人格上要互相尊重，当双方拿了箭上堂，要互相谦让，请对方先走。上堂的台阶比较狭窄，只能走一个人，那么先上去的人要等后来的人。射完了下堂，两个人还是要彼此谦让，请对方先走。下堂之后，遇到下面一对正要上堂的选手，彼此要作揖致意。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意思是说，君子是不会与人作无谓的争斗的，如果一定要与人争高下的话，那就是射箭比赛吧！不过这种竞争，是与对手揖让着上堂，比完了下来一起饮酒，这种竞争是君子之争。我们古代这种君子之争的风气影响了整个东亚，不管是蒙古、朝鲜还是日本，都受到了这种体育精神的影响，摔交、相扑、跆拳道，选手上场都会互相行礼，这是西方人所没有的。第三，既然是比赛，就一定会有赢和输，乡射礼要求选手正确对待失败，要做到"发而不中，反求诸己"，多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而不要怨天尤人。第四，单纯的射箭比赛，只是比力气和技巧，那样容易导致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乡射礼要求射手按照音乐的节奏发射，这就要求身心有高度的和谐。第五，射箭时，要把靶子当作你的道德标准来瞄准。《礼记》上说，你是一个为君的吗？你是一个为父的吗？那么，你在瞄准靶心时，就要想想自己的德行是否像一个君王、是否像一个父亲？把我的精气神等所有的东西都体验到。这是一种存问和反思的功夫，不可以缺少的。发而不中，也要从自己的修为上找找原因。

可见，我们的乡射礼已经从普通的射箭比赛，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乡射礼传到朝鲜、日本之后，被称为"弓道"，就是因为它不仅仅

是射箭，还有一种道德体验在里面。韩国人的“弓道”

乡射礼要求人们注重体魄和心性的统一与和谐，这种体育教化已经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所以我们古代讲人的身心和体魄要和谐，体魄与人格并重。其实你仅是练箭也可以射中，但你这个人脑子是空的，这就不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你是水利系的、他是机械系的、我是工程物理系的，我们在学习专业知识之外，还要学人文，还要学体育。人要全面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古代不仅有体育精神，而且要比古希腊“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来得深刻，不知大家是否同意我的看法?

在中国古代，经过儒家的改造，乡射礼被注入了诸多的人文内涵，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不能不了解的。

孔子用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来教学生，其中的“射”，往往有人解释成军事教育的，甚至有人用它来讨论孔子的军事思想的。从上面的介绍大家可以知道，那是一种对孔子的误读。为了证明我的看法，我们还可举出一个例子。《礼记》上说，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学生在矍相之圃射箭，前往观看的人很多，像墙一样在外面团团围住。孔子的学生“引而不发”，做出非常优雅的姿势。许多人看了很羡慕，都想进去试试身手。于是，孔子就叫他的学生到门口宣布：“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得入内！”贲军之将，就是打败仗的将军；亡国之大夫，是对国家灭亡负有责任的官员；为人后者，是指为了蝇头小利，去做人家干儿子的人。除了这三种人，其他的人都可以进去射箭。比赛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孔子就让学生提出新的道德要求，只有符合条件的人才能进入下一轮。所以到最后一轮的时候，人几乎都跑光了。所以说，射礼不是教人学习打仗的。

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乡射礼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第29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8)

清朝乾嘉时期有位大学者叫阮元，成就很高，学者奉为“山斗”。晚年，他出了一本文集，叫《揅经室集》。他在文集中回忆到幼时母亲给他讲的道理，他母亲说：为学如同为射。若要想射中，气一定要下沉，不能心浮气躁，要气沉丹田；目标要专注，始终如一；用力要精猛，全身心投入。如果没有射中，要“反求诸己”。可见，乡射礼的基本精神，已经成为一种人生态度和人生哲学，它可以指导你去正确处理一切事情。

另一个例子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北京有座辅仁大学，因为是德国人办的，所以没有像清华、北大、南开等校那样南迁。校长是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陈校长身在沦陷区，内心的痛楚尤甚。有一天，辅仁大学全校集会，陈校长神色凝重地讲话，他引用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的典故说：古代有三种人，是连运动场都不允许进入的：败军之将、亡国之辈与为人后者。陈校长用“为人后者”来警示大家不要认贼作父当汉奸，全校师生听了无不肃然，场下鸦雀无声。这个故事说明了乡射礼有它非比寻常的人文内涵，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2004年10月22日在清华大学“时代论坛”的讲演）呼唤礼仪与继承传统：

文化之魂与人文传承20世纪60年代，我们史学界的泰斗钱穆先生在台湾接见美国学者邓尔麟时，向他谈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大家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可是，它的“核心”在哪里？在这样一个博大的体系中，起着最深层的影响的东西是什么？钱先生说只有一个字，就是“礼”。他说，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一个家庭到整个国家，我们所有的行为准则都是由“礼”来笼罩的。我们中国幅员如此辽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地的风俗差别非常之大。西方人是以风俗来划分国家的，如果按照西方人的观点，这么大的差别，就是不同的国家了。可是在中国，不管你的风俗有多么不同、方

言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在“礼”这个层面上都是认同的。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行为准则。所以，钱先生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就非要了解“礼”不可。

礼乐文明诞生是伟大的历史进步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近代以来，每当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抨击的时候，“礼”总是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对“礼”的冲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四人帮”说，“礼”就是奴隶制。《论语》上有句话叫作“克己复礼”，江青说“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奴隶制。江青把礼与奴隶制直接画了等号，它的恶劣影响，直到今天还远远没有肃清，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这个“礼”来正名。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谈对礼的认识，那么，我要说“礼”不仅不是反动、落后的东西，恰恰相反，它在中国的诞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一谈到礼，就不能不去找它的源头，就一定会从“周公制礼作乐”谈起。

周公辅成王（壁画）

殷周之际，武王伐纣，把商朝推翻了。那时候武王身体不好，几年之后，武王就死了。他的儿子成王年龄幼小，不能亲政，于是就由成王的叔叔周公来摄政。这个周公非常了不得，原本是一次寻常意义上的改朝换代，经过他的手，就变成了天翻地覆的一场体制和思想领域的革命。著名学者王国维（静安）先生在他的《殷周制度论》里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中国古代二千多年文明，政权发生过很多次转移，但大多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只是天子换了；这中间只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就是武王克商。拿今天通俗的话来说，殷周革命就是奴隶制变成了封建制。殷商是奴隶制，我们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可以看到，一个商王死了以后，要杀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奴隶或者战俘来殉葬。殷墟的王陵区有上千个祭祀坑，一个坑往往埋有十个被杀死的人。处于社会

底层的战俘和奴隶，没有尊严可言，他们的价值与牛、羊、猪一样，不过是奉献给神的牺牲。

第30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9)

殷商时代的青铜文化非常灿烂，物质文明相当发达，但它的精神文明却与之不相称。殷墟出土十几万片甲骨告诉我们，商王无论什么事情，包括明天下不下雨、打猎能否有收获，乃至有没有病等，都要占卜，这是一个神权的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完全失衡，只能依靠暴政来统治人民。所以，牧野之战，七十万士兵前途倒戈。一个物质文明那么强大的王朝，在顷刻之间就覆亡了。如此迅速的变化，令人感到惊讶不已。

怎样才能长治久安？这是摆在周人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历史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和思考。他发现商朝前期的一些王还是很好的，特别是像祖丁、武丁等，有的在位五十多年，有的在位七十多年，当时国力非常强盛。到后期的那些王，在位时间都不很长，或五六年，或三四年，都是短命的王。周公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失德。周公认为商朝的灭亡不是由于天命，而是由于他们失德。失德就失人心，失人心就必然灭亡。所以我们今天在《尚书》还可以读到很多篇周公对当年臣下的训诰，他反反复复提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商朝亡国的教训并不远，就在夏朝之后。那么怎么办？他提出一个口号，叫"明德"。周公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要把"明德"作为执政纲领的政治家。为了保证这样一个纲领的实施，周公制定了一系列人性化的礼乐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

德政要怎么样体现？德政要有制度来加以保证。周公设计的这套制度跟商朝截然不同，王静安先生在他的《殷周制度论》里面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故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

梦见也。”周公那样一种深思熟虑，制定的体制那样完备，后面有多少个朝代都在跟着往下走，但他们根本不能想象也无法明白周公的用心和胸襟。王静安先生在概括了周公制定的一些礼制之后说，周公用来纲纪天下的宗旨是什么呢？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执政，不是靠行政权力或者暴力，而是靠道德。这是我们首先要谈到的，只有理解了道德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我们才能往下谈。

我们现在读《尚书》，感到非常亲切，因为它里面很注重民意。它里面有一篇非常著名的《酒诰》。商朝人很喜欢饮酒，为长夜之饮，有时喝得连日子都弄不清了，最后亡国了。周公就告诫自己的官员不要酗酒，谁要是酗酒就把他杀了，要汲取历史的教训。他欣赏这样一句话：无于水鉴，当于民鉴。意思是说，要把老百姓对执政者的反应当作一面镜子，而不要仅仅把水当作镜子。《尚书》里还说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威）自我民明威。”以前人们讲到周的时候，总是说周朝人爱讲“天命”。其实周人的“天命”是个幌子，他讲的是天，实际上是在说人民。《尚书》里还有那样一句话可以作为我们这么说的证据，叫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之所见，是通过人民的眼睛，老百姓看到的，就是上天所看到的；天之所听，是借用人民的耳朵，老百姓听到的，就是上天所听到的。这是一种何等进步的思想！江青说周公代表的是奴隶制，简直连起码的事实也不顾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天下哪有这样的奴隶制？周人的这种思想，把民众看作是社会之本，我们把它叫做“民本主义”。

史学界多数学者认为，从商到周是从奴隶制迈向了封建制，当然这是有争议的，比如郭沫若就说到战国时才进入封建社会。“文革”之前，学术界里多数学者认为西周时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殷周之间差异实在太大了。台湾著名学者方东美先生说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可以和王静安先生的话相互印证。方先生说，殷周之际是历史上变革最为

巨大的时代，殷是一个神权主义的时代，而西周则是进入到了人本主义时代。他说，殷商是神话时代，当时的古希腊也处在神话时代。中国的神话时代比较短，因为中国从西周起就进入了人本主义时代，而古希腊直到我们的战国时期才转入人本主义时代，所以古希腊的神话特别发达，我们的人本主义思想特别早熟，这是东西方不同的地方。我个人非常认同方先生的论断。

第31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0)

周公的理念及其所规定的一系列制度，奠定了我们两千年文明的基调，为后世所尊奉。在他之后，尽管改朝换代的事情不断发生，但总体而言，只有量变，没有什么质变。中华礼乐文化的底蕴在这时就确立了。孔子非常推崇周公，他说过“我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这样的话。他认为周公推行的制度最好，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赞成周公的德政，但是德在内心，外边看不到。他把德理解为一个“仁”字，指出“仁”就是“爱人”，孟子则概括为“仁者爱人”。有德的人必然是最懂得爱人的，懂得珍视人的价值，懂得尊重别人。后来，孔子的学生把孔子仁的理念理论化，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周公所制的礼，主要体现在一些典制上，到了孔子，又加进了一套修身养性的东西和一套教学方法。到了荀子，他把法家的东西吸收了过来，把礼和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礼学的体系，影响非常之大。礼学体系内容非常庞大，包括理论形态、典章制度、行为规范以及修身养性的东西等等。

礼乐文化所体现的人文精神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文化大讨论，大学里面尤其热烈，我当时正在读研究生。有一次我参加学校研究生会组织的研讨会，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教育系的一位同学提出了“怎样界定人”的问题，就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引起了与会同学的热烈讨论。实际上，在儒家的典籍《礼记》里面，对这个问题早就有过讨论。

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呢？《礼记》说：“人之所以为人，礼义也。”这个结论，是所有与会的同学都没有提到的。儒家认为，人懂得礼而动物不懂得礼，是两者的根本区别。《礼记?曲礼上》还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人如果不懂礼，就是衣冠禽兽、会说话的禽兽。所以《礼记》又说：“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

兽。”儒家认为，人是通过礼来“自别于禽兽”的。《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就是符合道理的行为规范。礼的精神所要体现的是一种不能移易的道理，只有固守住礼的人，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文明时代的人。

在儒家的眼中，礼又是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标准。唐代学者韩愈在他的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原道》中曾经非常深刻地谈到这一点。孔夫子用“六艺”教学生，其中有一部叫《春秋》，原本是鲁国的史书，写得非常简略，有点类似于大事记。猛一看，似乎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那么，为什么孔夫子会把它作为教育学生的教材呢？我们看《史记?太史公自序》就可以知道，司马迁曾经与上大夫壶遂讨论过这个问题。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的本义，是要人们懂得“防微杜渐”的道理，因为乱臣贼子的出现都是有一个过程的，而《春秋》这本书，正是把事情发生的苗头和演变的轨迹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后人读了之后，就会从中吸取教训，懂得防范。

这是司马迁的理解，而唐朝的韩愈不太同意司马迁的说法。

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因为春秋是一个战争非常频繁的时代，原因之一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原地区很早就进入了农业文明时代，而周边的许多民族还处在游牧时代。农业文明的居民凭借比较成熟的耕作技术向大自然索取食物，所以生活比较稳定和富裕。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至迟在五千多年前，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就已经相当成熟了。游牧民族不然，他们逐水草而生，食物来源不太稳定，迫于生计，所以不时要到中原来抢掠。有些周边民族到了中原之后就不走了，或者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才走，这样，他们与中原民族的交往就非常密切。所以说，伴随军事冲突而来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和转换。有些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接触后发现，中原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发髻上插着笄，还戴着冠冕，说话很文雅，彼此谦让，觉得中原的礼仪很先进，就处处模仿和学习。与此相反，中原

的某些诸侯看到周边民族的文化后觉得很新鲜：他们都披头散发，这样不是每天可以省去梳洗的麻烦吗？说话很粗鲁，这不是很豪放吗？于是也处处来模仿和学习。这两种模仿和学习，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要害在于，是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靠拢，还是相反？韩愈认为，孔子修《春秋》的深意是要严夷夏之别。夷夏之别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礼”。韩愈说，中原的诸侯转而用夷狄之礼，那么，我们就要把你“夷狄之”，就是把你当作夷狄来看待，不再认为你是中原大家庭的一员。当时的人对周边民族有专门的称呼，东方的叫“夷”，南方的叫“蛮”，西方的叫“戎”，北方的叫“狄”。简称“夷狄”，或者“夷”，“二十四史”中的《四夷志》，就是周边民族的专志。好了，如果你原本是夷狄之邦，但转而学习了我们中原的礼法，认同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就要“诸侯之”，把你看作是中原大家庭中的一员。韩愈的说法没有种族歧视，惟一的标准是文化，这是非常高明的见解。在他看来，春秋时期中原与周边四夷的冲突，就是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较量，是让历史走向进步，还是走向倒退的大问题。这才是孔子修《春秋》的用心之所在。中原文化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化，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人民有非常好的文化修养，这就是礼乐文明。韩愈在《原道》中讲的道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

第32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1)

最近，有些学校为学生开设了礼仪课程，原因是有些学生去求职面试的时候，由于不懂起码的礼仪，给考官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以被人家刷掉了。为了让学生在求职时顺利过关，所以要教给学生一些对付考官的“招”。为了这样的目的来开礼仪课，貌似有理，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很有问题的。

中国古代的礼仪是以修身作为基础的，《礼记》说，只有“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只有你内心树立了“德”的地位，并且让它在你内心“辉动”，就是放着光辉，那么合于理的礼就会自然地散发出来。因此，我们的古人总是强调礼要和修身结合起来，如果离开修身，行为即使中规中矩，也不能叫礼，而只能叫“仪”，就是徒具形式的虚礼。

这几年，我在清华开一门名为“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的课，主要是介绍中国古代礼学的沿革、学理、文献、典礼等等。经常有同学问我，怎样树立起新时代的行为规范？我总是回答说：“建议你去读读《礼记》。”

《礼记》是礼学的经典之一，主旨是发挥礼的义理，其中的主题之一就是讲如何修身，这里不妨略微举几个例子。比如《礼记》说：“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意思是说，所谓礼，就是通过自我谦卑的方式来尊敬他人，即使是一个肩挑背负、沿街叫卖的商贩，也一定有值得他人尊敬的地方。这段话告诉我们，即使是弱势群体，他们也有人格，它不应该受到贫富和地位这些因素的影响。有同学说，我们为什么要尊敬那些小商小贩？为了回答你的这个问题，我先讲一件真实的事情。有一天早晨，我在学校里面跑步，有两位年长的清洁工穿着橘红色的工作服正在扫街，一男一女，看得出是夫妻。两个人都汗流浃背，看来已经扫了很长的时间。半个多小时后我跑回来，他们又在扫另一条长长的马路。于是我停下来跟他们聊天，问他们怎么要扫这么多的地方，他们回答说：“两个孩子都在念

书，家里钱不够用，没有办法，只好多扫一点。”我听了之后，真是肃然起敬！他们虽然生活困难，但是一不偷、二不抢、三不贪，完全靠自己辛勤的劳动来生存，来为社会减轻压力，比起那些贪官污吏，比起那些铤而走险的人，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实在是高尚得很啊！

在座的各位同学，是我们国家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学子，谁不羡慕！但是一定要有平等待人之心，对学校的门卫、扫楼道的工作人员都要尊重。他们尽管文化程度低，但人格与我们是一样的。他们拿着微薄的薪水，做着大家都不愿意做的又脏又累的工作，我们为什么要轻视他们？如何对待弱势群体，是我们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我想，如果大家都记住了《礼记》的这段话，问题就一定可以得到解决。

《礼记》又说：“敖（傲）不可长，欲不可从（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是说凡事要把握好度，要懂得谦虚自守；“临财勿苟得，临难毋苟免”，是说看到钱财，不要总是变着法子去占有；遇到危难，不要总是想办法逃脱。

又如“公庭不言妇女”、“公事不私议”、“朝言不及犬马”，是要求政府工作人员要有敬业精神，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要能自律。

《礼记》的第一篇是《曲礼》，《曲礼》开头就说“毋不敬”，这句话很要紧。东汉经学家郑玄在为“毋不敬”三字作注的时候说：“礼主于敬。”唐朝学者孔颖达在《礼记疏》申述郑玄的话说，古人把礼分成吉、凶、军、宾、嘉五大类，五礼的实质，无一不是通过“礼”的形式来表达“敬”的。夫妇相敬，君臣相敬，士与士相敬，对自己的亲人就不用说了，哪怕已经逝去，依然要保持敬意。由这个“敬”字，可以衍生出很多东西，就会有礼让。所以朱熹说“毋不敬”是一部《礼记》的纲领。因此，我们人人心里都应该有一个大写的“敬”字，时时想到要尊重自己，尊重同学，尊重老师，尊重学业。有了这个大写的“敬”字，凡事他就会用这个“敬”字去衡量。我对同学说，为什么有人见到老人能主动让座，而有些人就做不到呢？因为主动让座的人心中有个“敬”字，不肯让座的人心中没有这个“敬”字。问题就是这样的简单。

我们现在总是要求学生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总是在行为上作硬性规定，而没有想到怎样让学生在内心把“德”树立起来，所以效果很差。

第33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2)

现在学校里尊师的风气非常的淡漠，“文革”的时候，老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对象，学生怎么会尊敬你？不反你就是好的。现在“文革”虽然结束了，可是尊师的风气也没有了。我看过一个报道，贵校的一位校长到韩国某大学访问，由对方校长陪着参观校容，走到某处，有几个学生正在路上闲聊，看到校长陪着客人过来了，他们马上自动站到路边，向校长和客人恭恭敬敬地鞠躬。贵校这位校长很惊讶，说我在自己的学校可没享受过这种待遇！不仅中国的学生不会这么尊敬师长，而且在公交车上，给六七十岁的老教授也不让座。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到惭愧。问题出在学生身上，但责任是在老师身上。作为老师，我们没有跟学生讲做人的道理，没有讲“毋不敬”的道理。无论什么事情，你首先应该为对方着想才对。比如你在家里看电视或者生日聚会，应该想到，电视机的音量是否太高？大家唱歌的声音是否太大？会不会影响邻居休息？人家还能不能看书？我们做事很少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是修养不足的表现。时间不多了，就说这么一些，点到为止。

人文奥运离我们还有多远

经过八年的努力，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终于花落北京。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谈论北京奥运。在许多人的眼睛里，北京奥运的三大目标里面，“绿色奥运”和“科技奥运”是硬指标，一点虚假也别想往里掺，“人文奥运”就不一样了，这是个软东西，说它有就有，说它大就大，好糊弄。近一二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状态下生活。用硬的一手抓经济，所以生活越来越好；用软的一手抓精神文明，所以出现了道德水平滑坡、社会风气不正的隐患，这是大家都亲身感受到了的。

“人文奥运”这篇文章怎么做呢？我觉得要比绿色奥运、科技奥运难得多。有些人认为，故宫、长城、颐和园，这不都是人文景观吗？

到时候让外国的观光客看看这些老古董，既把钱赚够了，又把人文奥运的目标完成了，有什么难的！其实，人文人文，主要是人，而不是那些古迹。人文是指人的精神面貌，是要不断进步和提升的。我们清华的大礼堂里高悬着一块匾，上面就是“人文日新”四个字。这块匾是解放前就挂着的，与当时的三座学生宿舍的命名，在意思上是贯通的。老清华的三座学生宿舍分别是明斋、新斋、善斋，它们的命名是取自《大学》开头的三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三句话的意思大家都一定很清楚，人不仅要每天光明自己的“明德”，而且要去“新民”，去影响周围的人，让他们的面貌日日新，要努力使“明明德”和“新民”的工作做到“至善”的境界。所以说，人要通过学习使自己的面貌日日新，要使周围人的面貌也日日新，这就是“人文日新”。

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人文精神的积淀非常深厚，应该说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自有特别的气象。可是，遗憾得很，一百多年来，我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下生活，以至我们不能用客观的眼光看待我们的五千年文明。这是多么宝贵的文化遗产！可是，许多人却把它当作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当有外患内乱的时候，大家就要鞭笞我们的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更是难逃厄运。批判来批判去，批了一百多年了，它已经体无完肤。如今我们对于自己的民族传统已经非常隔膜了，尤其是年轻一代，准确地说，已经不止一代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意识到“文革”对于人的思想的破坏，所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口号，可惜与经济建设的成绩相比，情况很不理想，不仅传统道德没有得到恢复，反而把外国某些消极的东西学到手了。人与人之间缺乏诚信，甚至没有起码的礼节。前几天，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有位朋友说：你们想一想，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是可以称为礼的东西？大家想了半天，都想不出来。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的文明状态是肯定不合格的。北京奥运即将来临，如今的状况又这样的糟糕，所以，如何向全世界展示我们中国人

的人文精神，如何把北京奥运办成“人文奥运”，就成了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

第34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3)

前些日子，北京在巴黎街头举办了中国文化年的大型活动，我在电视上看到后很兴奋，于是给一位正在巴黎访问的朋友发了封电子邮件，说巴黎人对中国文化如此迷恋，让我觉得特别高兴。不料，这位朋友回信说，近年西欧某些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可是不少，说中国人没有文化，没有教养，为了钱可以不顾一切等等。这位朋友的回信让我感到非常意外，心里凉了半截。可是转念一想，觉得一个国家的形象是要靠每个公民的言行来展示的，光靠文化代表团去展示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有些欧洲记者喜欢做贬低中国人的文章，可是，“谣言止于智者”，只要我们身上没有了这些毛病，谣言自然就会平息。到2008年，到中国来旅游和考察的外国人会比任何时候都多，亲身感受中国，感受中国人，那时，每个中国人都是形象大使，一个真正的中国将会近距离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不过，那时候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由我们自己来选择的，外人谁想扭曲或者美化，都是徒劳的。

我们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礼仪文明是我们的强项，只要我们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存有温情和敬意，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实行“文化自戕”，就会真正认识到我们传统礼仪的精妙。这就是我今天用了这么多时间来给大家谈中华礼仪的原因。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人文奥运”，脚踏实地走向“人文奥运”。

附：彭林答问提问：我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是北大团委下属的文明礼仪学校的秘书长。听了讲演，我想我们学校以后的发展可能要换一个言辞：风吹草动。以前的发展更注意形象的培训，但是我想，今后更该注意深层化文明的培养，这对我们大学生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我在这里冒昧而真诚地表示欢迎。

这次活动的主办方应该把礼仪的培训或者礼仪文化的培养引入到北京大学的校园里。

另外，我们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外交学有一门专业叫“外交礼仪”的课程，学习在国际交往中的外交礼仪，例如要注意阿拉伯国家的礼仪是什么样的，美国的礼仪是什么样的，但是，我想什么才是中国的礼仪？我现在不明白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礼仪。我们要尊重对方的礼仪，却不知道哪天别人可以尊重中国的礼仪，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

彭林：这位同学问得非常好，它使我想起几个星期以前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跟侯耀华先生等做的一个节目。侯先生一开始说，世界各国的礼仪非常丰富，有的摇头不算点头算，有的点头不算摇头算；有的见了面彼此要用鼻子碰一下，表示亲近。他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随后他说，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再用老礼，而应该和国际接轨。我反问他：您说的跟国际接轨，是跟国际上哪种礼仪接轨？是跟点头不算摇头算的礼仪接轨？还是跟见了面互相碰鼻子的礼仪接轨？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民族，它的文化最表层、最直观的东西就是礼仪。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礼仪。现在最糟糕的问题，正如这位同学所说，是我们学了许许多多的外国礼仪，却不知道自己国家的礼仪是什么。2008年奥运会，外国朋友来中国之前想“入境问俗”，了解一下中国的礼仪，我们却是“无可奉告”，真是不可思议。

我曾经看过一些中国人写的礼仪手册，包括北京某礼仪学校的教材，往往先是在前言部分大讲一通我国是礼仪之邦、礼仪文化源远流长等等，但是，正文部分却都是西方的礼仪，怎么画眉，怎么涂口红，怎么打领带，怎么吃西餐等等。可悲的是，有些手册的书名还冠以“中华礼仪”的字样。我想，这样的礼仪教科书出版得越多，礼仪学校办得越红火，中华的礼仪文化就完蛋得越快。正如刚才张教授所说的，咱们应该一起把五千年文化礼仪中的精华传承下来，中华礼仪文化不可能都是糟粕，总有好的部分，现在我们要把里边合理的部分找回来，结合当今的时代特点，制定出一套中华礼仪。

提问：这次讲座的主题是“呼唤礼仪，继承传统文化之魂”，我想问一下，怎样才能传承传统文化之魂？怎样才能把礼建立在文化基础

之上？怎样提高大家的文化修养？

第35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4)

彭林：我谈谈我的看法。我多年在大学从事教学。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育是应试教育，一个中学的所有的工作，就是为了让学生考上大学。大学阶段是为了学技术，毕业后好找工作、好出国，至于人格怎样，似乎并不重要，这是很糟糕的。即使是西方的大学，也会把培养完善的人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一个人如果离开了德，离开了民族文化，我们可以说他有知识，但不能说他有文化。我们怎样才能对民族文化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我觉得只有读书。我刚才讲的内容，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放在以前，是文人的常识，像《礼记》这样的书，是大家都读的，里面有许多非常深刻的故事，你如果能读一读，你的文化素养就一定会与日俱增。

清华是以理工科学生为主体的学校，但学生非常喜欢传统文化，他们成立了一个“钟铎社”，每周有一个早晨，大家齐集在校内的“荒岛”（就是朱自清先生写《荷塘月色》的地方），高声诵读古代经典。他们意识到，只有那点专业知识，不能成为完善的人。要想成为完善的人，途径之一就是多读经典。

说到这里，我想起十年前跟韩国朋友一起吃饭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由于我们经济比较落后，很多中国人非常自卑，见到韩国人很羡慕，说韩国经济多发达，我们要多少年才能赶上你们等等。没想到，这位韩国朋友说了一句让我永远忘不掉的话，他说，其实我们韩国经济起飞只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说明发展经济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他每年都要来中国，中国的变化之大，让他惊讶不已，中国经济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达到韩国的水平。

这位韩国朋友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不是看经济，而是看有没有经典。不是任何国家都能出现经典的，韩国就没有自己的经典，他们读的《论语》《孟子》《孙子兵法》《红楼梦》等等，都是

中国经典。经典不是二十年就能创造出来的，可能一千年也创造不出来。这位韩国朋友说得很精彩。

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体现在经典里面。为了做一个有完善人格的、高尚的、新时代的人，我希望和大家一起用毕生的努力来学习经典。

（2004年4月5日在北京大学学生会的讲演）中华传统与当代中国：

礼乐文化与和平崛起“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和平崛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近一百多年来，每逢社会的转折时期，或者大的政治风暴来临，总是会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对于要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来说，传统文化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千年积淀的中华传统文化究竟是宝贵的历史遗产，还是沉重的历史包袱？

在一个民族的内部，总有一部分人想要割弃自己的历史。近年来，社会上有人在少年儿童中推行诵读本民族经典的活动，居然也遭到一些人的激烈反对。这种现象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讨论清楚，我们民族的发展就不能步入健康的轨道。

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衰微的三个原因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原生文明之一。大家知道，就文明的形成方式而言，人类文明可以分为原生文明和次生文明两大类。原生文明是独立形成的文明，在形成过程中没有或者基本没有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因而有独特、鲜明的文化个性，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度和中国都属于原生文明。次生文明不然，它们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受到过其他文明的强烈影响，例如我们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文明，都是在中华文明的影响下形成的，尽管这些文明也有自己的特色，但其中中华文明的因子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中国人理应为自己的文明感到自豪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与此相反的现象呢？这主要是近代的特殊历史所造成的。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国势殆危所造成的文化自戕

1840年以前，中国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文明。鸦片战争是转折点，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大清帝国的门户，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举国震惊。其后的数十年，列强为瓜分中国不断挑起战火。直到1917年的巴黎和会，中国的国运可谓奄奄一息。激于时变，救亡图存成为有识之士的一致呼声。

第36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5)

一方面，大家感到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建设民族工业，富国强兵。各位来清华大学学习，不知是否了解清华的背景？清华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它原本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在当时是全国惟一一所不属于教育部而属于外交部的学校。另一方面，许多知识分子激于时变，愤慨于政府的腐败无能，怨恨线装书不能抵挡洋枪洋炮，于是把国运的厄难归咎于传统文化。

一个知书达礼的书生，无故地挨了八个强盗的打，打得遍体鳞伤。这里的罪魁祸首是八个强盗，可是书生却大声责怪自己，先是觉得自己本来就不应该读书的，要是成天练习刀枪就好了；接着又痛骂写那些书的人，声称要把这些书都丢掉；再后来呢，觉得自己的家当也没有一件是好东西，件件都不堪入目。这种逻辑似乎有些混乱，但这就是当时中国人的情绪。其中有些知识分子，例如胡适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不仅态度激烈，而且语言刻薄。下面的这段话，是胡适先生写在《信心与反省》里面的，我们来读一读，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些人的态度是何等的极端：

胡适像

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近代的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在那些方面，我们的贫乏未免太丢人了。我们且谈老远的过去时代罢。我们的周秦时代当然可以和希腊、罗马相提媲美，然而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单是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觉我们的文化的贫乏了。尤其是造型美术与算学的两个方面，我们真不能不低头愧汗，我们试想想，《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正和孟子先后同时；在那么早的时代，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太落后了！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一千年的大学，有

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也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辉究竟照耀到哪里去了？

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段非常典型的文化自戕的言论。在胡适先生看来，中国古代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都不如希腊、罗马。我们今天读他这段文字，觉得有点离谱。

中国古代的文学有那么差吗？真会让我们这些子孙汗颜吗？不会的。我们先秦的文学，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是光彩夺目的。南方的楚辞，北方的《诗经》，是世界文学的瑰宝。《论语》的睿智，《左传》的叙事，《国语》的说理，《战国策》的雄辩，哪个不能成为典范？《史记》被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是炉火纯青的作品。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的四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至今没有人可以望其项背。以胡适先生的广博的学识，不会不了解这些冠绝于世的伟大作品的，我们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感到“汗颜”？

中国古代的雕刻和政治，也并不像胡适先生说的那么惨。希腊、罗马多石材，所以雕刻作品大多是大型的石雕。中国多平原、湖泊，石雕作品不多，雕刻的技艺主要体现在玉器、象牙器等等的上面。玉器制作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中国和墨西哥、新西兰，是全世界三大古玉制作中心，其中中国的水准最高。玉器质地晶莹剔透，硬度很高，脆性很大，加工起来，相当之困难，而中国玉工的制作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相当成熟的技艺，阴刻、阳刻、浅浮雕、半圆雕、圆雕、微雕、镂空、俏色等技术之讲究，没有一样是不可骄人于世

的。这种雕刻技术，希腊、罗马人是不曾梦见的。胡适先生不会没见过故宫里的那些稀世的玉器珍宝，不知何故，胡适先生要以人家之长来比我们之短，而不是相反？

第37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6)

至于中国的科学，也并非没有可圈可点之处。至少在15世纪之前，中国的天文、数学还是水平不低的，我们完全不必像胡适先生那样丧气。清代乾嘉时期，西方的自然科学已经大举东来，著名学者阮元曾经写过一部《畴人传》，历数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在天算领域的著述与学者。胡适先生理应知道这部书的，不知为什么不置一词。

胡适把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等，都挖苦为“我们所独有的宝贝”。其实，骈文、律诗、八股，确实是我们的宝贝。直到今天，谁要是精通这些体裁的东西，就可以到大学教书。以前把八股文说得一钱不值，近年启功等先生写文章谈八股文，我们才知道情况完全不是那样。由于胡适把“贞节牌坊”也列入我们“独有的宝贝”里面，给人的印象是，压制妇女的性自由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胡适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有人发表反驳的文章，有一位作者指出，在中世纪的西方，妇女的遭遇并不比中国好，为了防止她们红杏出墙，而野蛮地强迫她们穿铁裤衩。当时西方的监狱、法庭也是非常黑暗的，这方面的事实太多了，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列举了。至于胡适把中国古代的礼学说成是“吃人的礼教”，我们后面再谈。

“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这就是胡适的中西文化观。胡适甚至说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圆”这种贻笑万年的话来。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激进派，对中国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没有消除。

总之，“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批判传统文化，他们只看到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认为不打倒传统文化就不足以开启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有它积极的一面，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它对中国文化的评估是片面的、偏激的，它反映了中国知识

分子在西方思想的巨大冲击之下，对传统文化固有信心的崩溃。走西方的道路，“全盘西化”，成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终生追求的目标。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西化”是“现代化”的同义词。政治运动造成的文化无知

如果说“五四”前后，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第一波冲击，那么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又对传统文化造成了第二波冲击。

50年代以后的政治运动很多，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每以文化批判作为切入点。比方50年代初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60年代对于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的批判，都是如此。当然，这些运动的高峰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的时候，提出了“破四旧”的口号。所谓“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凡是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国民党时代的东西，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属于“旧”的范畴。许许多多的文物古迹，就是在这个口号下被破坏的；许许多多线装书，就是在这个口号下被烧毁的；民间的许多民俗节庆，也是被指责为旧风俗，开始走向衰微的。

在“破四旧”运动背后起指导作用的，是“与传统作彻底决裂”的理念。当时有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决裂》，就是发挥这种理念的作品之一。当时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无产者的任务，就是要砸烂旧世界，开创新世界。结果，砸烂了不少不该砸烂的东西，而新的东西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出现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文化浩劫。它的破坏性并不仅仅体现在传统文化的毁灭上，更重要的是在一代人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反传统的印痕。

20世纪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从全国每一个角落展开了对孔子、儒家思想的扫荡。从后来发表的材料，我们才知道，江青等推动“批林批孔”，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表面上是通过批孔来批林彪，实际上是通过“批林批孔”来打压周恩来，所以这场运动又叫“批林批孔批周公”。他们用“周公”来隐喻周恩来。这段时期，“影射史学”非常发

达，他们做得非常之巧妙。孔子最推崇周公，希望社会能恢复周公“制礼作乐”时所建立的那一套制度。

第38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7)

周公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周公制礼作乐，使得中国社会从崇尚鬼神的时代解放出来，进入了民本主义时代，这是古代中国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变革，这原本是史学界多数学者的一个共识。可是，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史的分期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理论，人类历史先后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形态。古代中国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是在什么时候？学术界是有争论的，有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乃至南宋封建说等形形色色的说法。大多数史学家，包括翦伯赞先生、范文澜先生等在内，都是主张西周封建说的。这原本是学术问题，是允许争鸣的。实际上，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还在讨论之中。

但是，按照当时的人物评价标准，战国封建说对于孔子来说是致命的。因为按照这种分期，西周和春秋都属于奴隶制时代，孔子是春秋末期人，正当社会向封建制转换的关键时刻，孔子却希望回到周公那里去，这不就是开历史倒车吗？孔子不就是要复辟奴隶制吗？孔子最推崇的周公不就是奴隶制的总头目吗？历史就是这样被某些政治人物玩弄于股掌之间，成了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批林批孔”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被策划起来的，但是，受害最深的却是儒家思想。举国上下，不管念过没念过《论语》，也不管有文化没文化，人人都要“拿起笔做刀枪”，写批判“孔老二”的文章。直到今天，民间还有不少人保留着“孔老二”的口头禅。只要你一提孔子，有人马上就会说：“喔！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所以今天要提倡儒学的阻力，有一部分就是那个时代形成的。

百年以来，对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不断摧残，使文化承传陷于困境，随之而起的，是两代、甚至是三代对于民族文化相当隔膜、相当无知的青年。我们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由于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无

知而造成的种种笑话。这种无知，表明年轻的一代对于传统的冷漠，它的严重性在于，民族文化的承传将会出现障碍。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的失落，是由于外敌的入侵所造成的，而我们今天并不存在这种危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于缺乏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而实行文化自戕，长此以往，将会变成毁灭性的文化自杀。

文化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是民族凝聚的核心，一旦失去了它，国民就没有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民族的离心力就会增大。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经济落差造成的文化自卑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经济建设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当时人们所接受的教育是，中国人民是世界上生活得最幸福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肩负的任务，是要解放全人类。

可是，改革开放之后，国人开眼看世界，才发现自己的经济有多落后，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记得那时，我们单位有一位同事的孩子到香港定居，不久，我们看到他从香港寄来的彩色照片，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这样好看的照片，我们在挂历和画册上才看到过。那个时候，谁要是提着一个四喇叭的三洋牌收录机在街上走，机器里面放着流行音乐，那他就是大家最羡慕的人。这种巨大的经济反差，是国人从来没有想到的。错愕之余，很多人再次归咎于传统文化，并加以激烈的抨击。80年代，社会上出现过两次文化大讨论，核心的问题是：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传统文化还要不要？大学里的争论尤其激烈，许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保守的、落后的、腐朽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那时我正在读研究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位风头很足的人在演讲时说："近代中国最大的悲哀，是没有成为美国或者日本的殖民地！现在穷成这样，想要给别人做殖民地，人家都不会要！"这种渴望去做人家奴才的无耻言论，竟然还博得了一些学生的喝彩！当时一些民众盼望富裕的心态，由此可以想象。

第39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8)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经济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人们每每把经济水平的落差与文化差异混为一谈，把经济不发达的原因归结为文化品质的低劣，从而产生出文化自卑的心态，因而迁怒于自己的固有文化，甚至做出文化自戕的蠢事。文化自戕的结果是本位文化的流失或者变异。这并不是中国才有的现象，至少日本人就曾经是这样的。韩国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这种现象的显露：不少人认为，国运如此，都是读线装书读的。但是，他们在经济成功起飞以后，传统文化热也随之高涨起来了。不过我们的开放在日本人之后一百多年，理应可以避免他们已经犯过的错误，可是，我们还是重复了一遍他们的错误，这似乎是不太应该的。

中华传统文化不可能消亡的三个理由

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可能有人会说，照你这么一讲，岂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希望了？不是的，因为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是非常复杂的。文化的强弱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的消长，是与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发展、竞争交杂在一起的，并且不断地发生转换，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不可能消亡，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从社会现实来看：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衰微的原因正在消失

鸦片战争以来，作为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居然沦落到了任凭列强宰割的地步，中国人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是相当巨大的。诸位到清华来，不知去看过学校西区的近春园没有？那里有一方荷塘，就是朱自清先生写《荷塘月色》的那个地方，是清华园的名胜之一。荷塘的中间有圆明园海晏堂遗址现状

一个小岛，原本上面有许多的屋舍，非常漂亮的地方。可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岛上的房子全部被烧了。圆明园是万园之

园，近春园是其中之一，与今天的圆明园遗址公园原本是毗连紧邻着的，所以被殃及。清华学校的办学经费，是“庚子赔款”赔给美国人的款项的一部分，校园是侵略军劫后的废墟，学习的课程多数是欧美的，清华的师生每天面对这一切，心情一定是非常郁闷的。所以，那时的清华留美学生，学成之后几乎都是回国的，因为要报效祖国，要让国家富强，不再受列强的欺负。

我想，钱伟长先生的经历，很可以体现老清华的人文精神。钱伟长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在学术界和民间都享有盛誉。钱伟长是著名史学家钱穆的侄子，所以自小就喜欢文史，而且根底扎实。他报考清华大学，作文和历史都得了一百分，一时传为美谈。作文的题目是“梦游清华园”，你不是没到过清华园吗？那么，你就梦游吧，去发挥你的想象力吧。考试时间是四十五分钟。结果，钱先生写了一篇四百五十字的赋，文采飞扬，写得非常之好。由于有作文成绩不能给满分的老规矩，判卷的老师千方百计地想挑他的毛病，但就是挑不出来，无奈之余，只好给他一百分。历史考试的试题是写出“二十四史”的书名、作者、卷数以及注家，许多人只得到二三十分，而钱先生又得了满分。如果他在历史系或者中文系深造，理应成为很有成就的学者。但是，他到清华报到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国难当头，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救国。再三考虑之后，他决定去学物理学。于是，他找到了物理系的系主任叶企孙先生。叶企孙先生问他物理的入学考试成绩，他说是不及格。叶先生当时就拒绝了，因为他的基础实在太差。可是，钱先生非常坚决，为了达到转系的目的，他每天在叶先生上班之前就等候在办公室门口，叶先生一来，他就上去“缠住”他。最后，叶先生被“纠缠”不过，便同意他到物理系试读一个学期，如果期末考试及格，方才可以转过来，否则还是回去读你的历史系去。于是，钱先生每天早晨不到六点就起身到物理系去看书，使他感到非常敬佩的是，每当他踏进物理系的大门时，华罗庚先生已经学习完毕出门了。华先生原本是上海一家杂货铺的小伙计，因

为发表了一篇论文，被清华数学系的熊庆来先生看中，破格招入清华。后来，华先生凭着自己的努力，跻身于中国杰出数学家的行列。学期结束时，钱伟长先生的物理考试得了七十多分，于是，叶企孙先生终于同意他转到物理系学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钱先生他们这一代人心目中最看重的是国家的命运，而不是个人的得失或者所谓的前途。

第40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19)

不久，学校决定派遣包括钱伟长先生在内的一二十位学生出国深造，带队的是一位英国人。同学们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上海黄浦江边集合。带队者给每位同学发了护照，并且告诉大家，轮船的第一站是日本的横滨，要停留三天，大家可以在横滨玩玩，横滨的签证已经办好。可是，同学们一听都很愤怒："中日正在交战，我们怎么可以到敌国的领土上去玩！"于是，大家把护照撕得粉碎，扔进了黄浦江。那位带队的英国人被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深深地震撼了！

几年之后，钱先生再次被派遣出国。去办签证的时候，美国大使馆负责签证的官员，依照惯例向他问了许多问题，要求他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中美交战，你能否站在美国一边？钱先生明白，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让签证官满意，那么出国肯定没有希望，但是，他还是坚决地回答说："No!"说完站起来，头也不回地出去了。钱先生的这种高尚的气节，我们今天听来，依然觉得回肠荡气、激动不已，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

有一次，我遇到我们清华中文系的老系主任徐葆耕教授，我向他谈起钱伟长先生的那些往事。徐教授说，这些事迹他也听说过的。他觉得老清华的学生与今天的年轻学生相比，最大的差别是老清华的学生有"血气"。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不太在意个人的得失，而能毅然决然地把国家的命运摆在第一位。我觉得，徐教授用"血气"二字来概括老清华的精神风貌，实在是非常的传神。

经过几代有血气的中国人的艰辛奋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影响日益扩大，正在逐渐成为世界大国。在当今的世界上，不管是谁，都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中国人任人宰割、忍穷挨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尊严和文化自尊的意识日益苏醒。

这些年，大陆民众的生活有了非常快的提高。这里我用大学教师的住房来做比较。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正教授的月薪是一百八十元人民币，只相当于几十美元。而今天大学教授的月薪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北京的一些重点大学的教授，月薪有一千美元左右。生活水准提高的另一个指标是住房。过去，大学教授的住房相当之差，青年教师只能住“筒子楼”。这种楼原本是集体宿舍，中间是一条走廊，两边是十几平方米一间的房间，每家一间。没有单独的厨房，炉子只能放在自己的房间门口。厕所和盥洗室，是一层楼的人公用的那种。教授的房子，一般也只有七十多平方米。但是最近几年，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我现在的住房面积有一百二十八平方米，有一位经常出国的朋友到我家里来叙谈，看了我的房子后，非常感慨地说：“外国教授的房子也不过如此！”而且，现在住房的设计越来越人性化，适合于人居。比如，我现在住的小区，绿地的面积超过45%。如果说，我们过去的住房是“生存”，一个起码的生存条件的话，那么现在就是“生活”，是享受生活了。生活一旦安定了，不会再为基本生活问题操心了，就有可能去思考一些更深的问题了。我这些年，每年都到台湾去参加学术活动。有台湾学者说：“这些年大陆经济增长以后，大陆学者给人的印象也不同了，他们开始有自信了。”

另外，“文革”结束以后，中央已经正式宣布不再发动政治运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政治环境越来越宽松，学术禁区越来越少，学者不再惧怕被扣上政治帽子。以前许多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都可以研究。孔子的名誉也得到了恢复。1989年秋，中国孔子基金会举办了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有三百多人。从此以后，每隔五年举办一次同等规模和级别的纪念孔子诞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每次会议期间，都有国家领导人到会讲话，或者接见与会代表。最近，国家又决定在世界各地建一百所孔子学院。2004年秋，由政府部门出面，在山东曲阜举

行了祭孔大典。这一切，表明政府正在以实际行动消除“批孔”运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41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20)

在民间，有不少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士，热心在少年儿童中推广“诵读经典”运动，提倡诵读儒家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经典，以及《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据了解，这项活动开展十年来，大陆地区参与读经的人数已经有五百万之多。在儒家文化传播中断了一百多年之后，社会各界再次出现儒学热，证明儒家文化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同时也证明了它依然是造福于社会的优秀人文资源。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就像我们血管里流淌的血，是不能改变的。“文革”已经过去了三四十年，许多人已经痛定思痛地来反思那场浩劫对中国文化造成的摧残。许多有识之士在呼唤回归传统文化，希望大家都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从世界格局来看：需要捍卫多元文化

当前的世界局势错综复杂，某西方强国图谋独霸世界，因而奉行单边主义。各国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单极政治格局的严重后果，因而纷纷起来加以抵制，世界政治正在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多元的世界格局，才是最安全的。

世界经济的格局也在走向多元化。目前，区域性的经济组织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架构下，各国不仅可以与周边国家互利合作，加强自身的经济发展，还可以整合成某种程度的经济同盟，用一个声音与外界说话，避免变成某些大国的经济附庸。

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更是如此。文化的多样性，是民族多样性的必然结果。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本位文化都是它赖以存在的理由。失去了本位文化，就意味着该民族消亡的开始。某西方大国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奉行单边主义，而且依仗他们的科技和经济优势推行强势文化。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第三世界，也针对发达国家，试图实现文化霸权主义。他们的图谋，已经引起法国等国家的警觉和抵

制，法国率先提出了捍卫多元文化的口号。抵抗强势文化，捍卫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非常深层的意义。

儒家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范之一，儒家文化注重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注重群体的和谐，注重精神家园的建设，相对于重视个人能力，重视物质的西方文化，有着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当前，西方文明居于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文明的弱点日益显露。因此，儒家文化正可以弥补西方文明的缺陷。

这些年，大陆最流行的一句话叫："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民族文化建设得越好，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就越大。对于历史文化无比悠久的中华民族尤其是如此。这些年，国际上流行汉语热，全世界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之下，如果我们还是实行文化自戕，甚至用自己的力量把它消灭了，那就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的悲剧。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回顾历史就可以知道，中华文明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恰恰相反，它历经劫难，不断受到各种形式的挑战。例如，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中华文明腹地的中原地区，早已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时代了，生活富足。而周边的许多部族，文化相对滞后，甚至还处在游牧文化的阶段，生活没有保障，所以不时地要进攻中原，掳掠劫夺，情况相当的混乱。可是，这种动荡不仅没有消灭中原文明，反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华夏民族由此形成，并且为秦汉大一统的出现铺平了道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政权林立，战乱频仍，史称"五胡乱华"，中国再一次处于分裂的时期。可是，这也没有能够动摇中华民族的根基，相反，促成了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大大增加，隋唐大一统王朝也随之出现。再往后，经过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时期的动荡和民族融合，出现了明清两朝的大一统。晚清以来的百年沧桑，外患内乱，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惨痛的记忆。可是，尽管有时令人有山穷水尽的感觉，但最终还是走向了繁荣。在

中国历史的治乱兴衰过程中，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四海一家的理想、包容万物的心态，成为了全民族走向统一而不是走向分裂的精神支柱。因此，任何一次社会震荡，都没有能够动摇中华文明的根基。恰恰相反，它好比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并且始终屹立不倒，表明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正是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前途充满信心的理由之一。

第42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21)

尽管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前途充满信心，但丝毫也不意味着即使我们放任无为，它也能自然强盛起来。恰恰相反，我们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某些西方大国非常精明，他们很有战略眼光，善于做文化的文章。他们利用高科技和巨额的资金，打造所谓的“大片”，并且用手段先进的媒体来炒作，不仅有效地冲击了我们的影视市场，赚取了有如天文数字的商业利润，而且悄悄地改造着受众的价值观。自我为中心、暴力、色情、奢侈，正在国民中潜移默化地滋长。这些年出现的仇杀等恶性案件大量增加，与此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一些青年人的处世方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我有一天在理发室理发，旁边有一位专门负责洗头的女孩正在给别人打手机，她说：“你要记住，吃好、玩好，比什么都好！”我们平时在香港电影里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语言，比如：“最要紧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点啦！”这种生活理念的形成，往往就是在诸如看电影这样的过程当中，非常自然、非常愉悦地接受的。而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是非常注重群体利益、国家利益，非常注重人文关怀的。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人生理念的最生动的描述。所以，我们历朝历代都有许多志士仁人为民请命、为国捐躯。当年，东林党人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叫做“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何等的胸怀！据说现在有的年轻人把它改成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轻轻改动了几个字，但已经面目全非，君子与小人，天壤之别！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我们传承千年的价值观正在受到颠覆，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颠覆。一旦这种颠覆全面实现了，我们的文化也就消灭了。

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古老的农业时代的文明，而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快节奏的工业时代。两者之间，既有可以承接的东西，也

有不相适应的部分。如何做到既能保留民族文化的因子，又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有人总是批评中国人保守、泥古，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古人的理念是与时俱进的。比如说礼，魏晋时代的礼仪，就与先秦有很多不同。为什么？因为生活方式变了，先秦时代的人是席地而坐的，很多礼节是与此相适应的。到了魏晋，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人们开始坐椅子了，所以礼节也就随之变化。到了宋代，生活方式又起了变化，礼也就跟着变化。这是很自然的。所以《礼记》说："礼，时为大。"礼把跟上时代作为一个最大的原则，否则你就难以存在。不过，它所不断变化的主要是礼的形式。礼的合理内核，如孝悌、礼让、诚信等等，则始终没有被抛弃。所以不管它怎么变化，它还是中华礼仪。

在当前这种过度强调物质享受的大背景之下，如何因应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固守住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兹事体大，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和严峻挑战。我们只有把上述这些问题很好地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景，才确确实实是光明的。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

在许多人心目中，所谓"崛起"，就是经济力量的飞速发展，文化只是供人娱乐的手段，不过是生活的调剂品而已。其实，文化是一种软实力，非常之重要。不少国家利用文化提升国民素质，树立国家形象，包装本国产品，甚至用它开拓新的市场，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有关这一问题，可谈的内容相当之多。限于时间，我只能结合我今年在清华为本科生开的两门课（一门叫"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另一门是"中国古代礼仪文明"），来谈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建立民族自尊和自信

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固然要靠科学技术，这一点大家都没有什么分歧。但是，科技的发展是要靠人去实现的。科技人员的精神状态如何，至关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许多在国外的科学家毅然放弃优厚的待遇，返回祖国，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事业献身。老一代知

识分子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立祖国的核工业，在许多局外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我想，他们的这种选择，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民族自尊。人的民族自尊不是自发产生的，是经过后天教育才会有的，他们从小受到过民族文化的熏陶，所以才会如此。当前，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世纪腾飞，民族自信和自尊的教育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第43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22)

前些年，有些人千方百计贬低中华文明，鼓吹西方文明，影响很坏。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主题是要证明中华文明如何不行，如何不被西方人认可。如果这些人都是洋人也就罢了，可惜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完全不顾事实，极力要把中国人说成劣等民族。我们真不明白他们这样做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这些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言论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市场。作为一名中国古史研究者，我觉得有必要用事实来作些回应，使我们的学生能够“兼听则明”，所以我就开了“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这门课。

中国是文物大国，近百年来，由于田野考古的飞速发展，文博领域成为成绩最为骄人的领域。许许多多出土文物，不仅一再刷新了古代中国的面貌，而且震惊了海内外。五千年文明为这门课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我选择了十件（组）精品文物作为切入点，导出十个方面的专题，内容涉及到古代农业、丝绸、天文、音乐、玉器、冶金、建筑、区域文化等诸多的领域，试图由此展开来介绍古代中国的文化成就。下面，我扼要地介绍其中的几个专题。

我们先来谈农业专题。农业是人类文明之母，人类社会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就是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过去，西方人认为，人类农业的起源地是在两河流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农业，都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出现的。后来，各国的植物学家、考古学家经过大量的工作发现，这个结论是完全错误的，世界上至少有三个独立的农业文明的起源中心，即两河流域、中国、中美洲。三个中心最重要的成功栽培作物分别是：两河流域的大麦和小麦，中国的稻和粟，中美洲的玉米。

稻谷化石（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

大米是人类最重要的主食之一。大米有非洲稻系和亚洲稻系之分。非洲稻系发源于尼日利亚，学术界没有争议。亚洲稻系的发源

地，过去一直以为是印度的阿萨姆邦，在这里的一些距今七千年的陶片上发现了已经炭化的稻谷。因此，学术界认为，亚洲稻谷是由印度传入越南含炭化稻谷的陶片（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地的。可是，“文革”期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一座七千年以前的古村落遗址，其中有大面积的稻谷堆积的遗存，最厚的地方有一米厚。这个发现，动摇了阿萨姆邦说的地位。之后，我们又在湖南澧县发现了距今九千年的水稻田，在湖南道县发现了一万年前最早的栽培稻实物，说明中国才是世界栽培稻的起源地。

此外，考古学家在我国北方的磁山—裴李岗遗址中发现了距今七千年的粟（小米）的遗存，据测算，它们埋入窖穴时的实际数量有数万斤之多。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粟的遗存，证明中国是栽培粟的起源地。

中国南方的稻和北方的粟，造就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经过数千年的经营和发展，终于结出了灿烂夺目的中国青铜文明之果。

玉龙

下面来谈玉器专题。早在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就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中国新石器时期手工业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了普通的陶器、工具制作之外，还有技术含量非常高的玉器制作。玉器的玉，就其晶体结构而言，有软玉和硬玉之分。我们通常说的玉，主要是指软玉，是指透闪石—阳起石矿物组成的玉石，包括白玉、青玉、碧玉、黄玉等。世界的玉器制作，以中国玉器、中美洲墨西哥的玛雅人玉器以及新西兰的毛利人玉器，并称世界三大古玉。其中，中国的古玉不仅出现的年代早、种类多、制作精良，而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系列化的倾向。中国最早的玉器，出现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形成了北起辽河流域，南至珠江流域濒东南沿海广大地区的半月形玉器分布带，其中以良渚文化最为发达。

良渚文化分布在我国江南地区太湖流域，距今约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就目前发掘的为数众多的良渚文化墓葬而言，几乎达到无墓不出玉的程度。良渚玉器种类繁多，主要有璧、琮、璜、镯、管、珠、坠、锥形饰、柱形饰、柄形饰以及龟、鸟、鱼等动物形玉器。

第44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23)

玉琮（良渚文化出土，左为原件，右为兽面纹放大）

请大家看这张图片。这是一件良渚玉器上的兽面纹的放大图，原大只有二三厘米见方。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出，它的构图非常繁缛细腻，已经接近于微雕了。图中表现的是一位头戴羽冠者骑伏在怪兽的身上，怪兽有大目、獠牙、利爪。可能表现的是一种超自然的神力。兽面的头部，通常用单（双）阴刻线的圆圈象征眼睛，再用浅浮雕勾勒出略呈长方形的鼻，鼻梁饰有拱形隆起，间有在鼻下阴刻出吻部的，或以弧线勾勒出脸庞。吻部有獠牙者，鼻呈圆角长方形，有眼睑、鼻梁和额；无獠牙者，鼻呈蒜头形，无眼睑和鼻梁或额。

玉料的硬度很高，硬度在摩氏5?6—6度，只有用金属工具才能刻画。而良渚文化尚处于新石器时代，工具只有石器和角骨器，用这样的工具加工玉器，犹如要用指甲在玻璃上刻画一样，是无法想象的。如此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他们究竟是用什么工具加工的，已经成为世界工艺之谜。

最后我们来看中国古代的乐器。传统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宫、商、角、徵、羽五音，七声音阶是明代从国外传入的。相当一部分音乐史学家认为，中国先秦时期的音乐，主要是西周以来的礼乐所用的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相当于简谱中的1、2、3、5、6）来构成曲调，是没有4和7的。所以有人说中国人是五音不全的。

可是，据《战国策?燕策三》的记载，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去刺杀秦王，送行到易水河边的时候，高渐离击筑，荆轲唱歌，先用“变徵之声”，再用“慷慨羽声”。所谓“变徵”，是古代的音阶名称，相当于今天的升高半音的4，这个音不在五声音阶的范围之内，这表明当时并不只有五声音阶。但是，不少人觉得难以置信，有学者认为，荆轲所用的变徵之声，有可能是从两河流域即西南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带传入中国的。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舞阳的贾湖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在此后的六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一共发现了十六件两头洞通、开有一系列侧孔的骨管，出土时大多置于墓主人股骨两侧，呈土黄色，为鹤类肢骨截去两端骨关节后形成的中间稍细、两端稍粗的骨管，再钻孔而成，形制固定，制作规范。

新石器时代的骨笛（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

1987年11月上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响实验室和武汉音乐学院组成测音小组，用stroboconn闪光频谱测音仪对保存最为完整的20号七孔骨笛进行了测试。实际的演奏试验和测音结果表明，骨笛音质较好，可以吹奏以C为宫的七声古音阶（123#45671?），或以G为宫的七声新音阶（12345671?）。此外还存在着多宫演奏的可能性，可以吹奏较复杂的旋律。此后，专家对同时出土的其余十五支骨笛也进行了系统的鉴定。综合结果表明，舞阳骨笛已经具备七声音阶结构，发音准确，音质也较好，至今仍可吹奏旋律。专家在测音现场吹奏了河北民歌《小白菜》，音高准确，音色坚实而嘹亮，令在场者震惊。

舞阳骨笛是贾湖先民有意识、有目的、有规范地制作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它在制作技术和使用技术方面的成熟性，对于中国音乐发展史的认识和估价，有重大意义。在迄今为止全世界所发现的史前音乐文化的物证之中，无论是器物的年代、可靠性，还是制作的精确程度，它都堪称无与伦比，表明了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在史前时期已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列举以上三个例子。学生听完这门课之后，反响非常热烈，认为我们的祖先真是优秀得很。如果我们这一代做得不好，就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千万不能诿过于我们的祖先。有的同学感慨地说，我们从上小学起，老师就教育我们要爱国，可是闭上眼一想：爱什么？脑子里是空的。听了这门课之后，才真切地感觉到，我们的中华文明确实是令人自豪。

第45节：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24)

目前这门课限选人数为二百七十人，但选修的人数远远超出这个数字，每次都只能采用电脑抽签的方式来确定选修者的名单。有的学生连选两年都没有选上，就旁听了两年。介绍这些情况，并不是要证明我的课讲得有多好，而是要证明中国文化好，谁来讲这门课都会是这样。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

中国政府这些年提出的建国目标，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谐社会、和平崛起等，在我看来，都是互相关联的，而不是彼此脱节的。其中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中华传统文化。

没有中国的文化特色，就不能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和谐社会、和平崛起，就更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了。其实，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最有资格讲和谐社会的。我们今天讲建设和谐社会，决不是因为有人担心我们争霸而说给别人听的，而是我们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延续。

营造和谐社会，就必须把每一个人都教育成为身心和谐的人。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礼。严格来说，儒家说的礼，是包括乐在内的，因此我们经常礼乐并提，说是礼乐文化。但在习惯上往往简称为礼。礼乐文化的宗旨，就是要使得人实现自身的“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大家都一定听说过《论语》里面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的一段话：“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里的“和”不是指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没有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指人的精神的一种境界。人最大的特点是上天赋予了他们喜怒哀乐的性情。可是，人的这种性情不会自发地处在无过无不及的境地，往往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它的表现就是暴怒、狂喜、忧郁、麻木等等。这种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到人自身的健康，也会引发社会问题。所以，儒家就用“礼”来调节人性，使他能够把握好“度”，事事处处都能“中节”。这

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一个核心。所以《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所以有子说"和为贵"，并且认为它是先王之道中最美的东西。如果人们都能自觉地用礼来约束自己，管好自己的喜怒哀乐，那么他的行为就一定是和谐的。

儒家为了推行自己的道德理念，把它们分解成许多具体的德目，比如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然后又把它们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让大家照着做。这样，儒家的理想就一步一步地在实现。下面我们以"孝"为例，来做一个说明。

孝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非常核心的理念。可是，孝道不是挂在嘴上就会变成现实的，所以儒家又把它具体化为许多不同层次的行为要求，比如《礼记?曲礼》说的"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关心老人的起居。再比如《弟子规》里说的"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要恭敬地听从父亲母亲的教诲，这就高了一个层次。再比如《孟子》里说到有五种不孝的行为："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

"二十四孝"之"鹿乳奉亲"（清顺治满文译本）

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主要还是就生活上供养父母来说的。而《礼记》里面曾子说的"五不孝"，就把孝行提高到居处、事君、为官、交友、作战等方面，认为只要是让父母蒙羞的行为都是不孝："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这就使孝行从单纯的奉养父母引导到道德的层面了，真是非常的高明。其他的礼仪无不是如此。

儒家不仅追求人的行为上的和，更重要是追求内心的和。礼只能解决人的行为规范的问题，是一种外在的规范，并不能解决人的内心世界的问题。如果内心世界进入一种至上的境界，言行举止就必然中规中矩，合乎天道。解决人心问题的途径，是施行乐教。《乐记》

说：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用乐教化民众，可以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所以《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儒家认为，能够打动人心、变化气质的是乐，不是指所有的音乐，而是特指德音雅乐，就是那些节奏和谐、内容健康的乐曲。所以《乐记》说乐能够和人心，这里的“和”还是恰到好处，处处中于节的意思。儒家主张“乐教”，就是用民众喜闻乐见的乐曲作为教化的工具，来化解民性。比如《诗经》，原本都是有乐谱的，可以诵，也可以唱，所以古代一些高士喜欢操琴抚弦，不是为了驱赶无聊，而是为了化性，用乐来自化。我们如果听一曲《文王操》或者《高山流水》那样的雅乐，马上就会觉得心境平和中正了，就是这个道理。

以上都是从人性上去说的。这方面的学理相当深奥，体系也非常博大，无法在这里展开来向大家介绍，只能点到为止。

此外，古人经过长时期的研究，制定了非常详备的礼仪制度。比方说，从孩子成年开始，每逢人生的关键时刻，都有相应的礼仪来指示人生，所以称为“人生礼仪”，包括冠、婚、丧、祭等等。比如孩子到了二十岁举行的成年仪式，称为冠礼，意在教育孩子从此要以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家庭和社会负起应有的责任。婚礼的主旨，是教育新郎、新娘合二姓之好，共同营造新家庭。丧礼是子女处理亲人遗体的仪式。祭礼是子孙追思先祖的仪式。此外还有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觐礼、聘礼等等，它们的核心都是要让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诚信相待。这一套制度特别系统、特别成熟，成为我们国家的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飞速成长，国力大为增强，但是唯利是图的坏习气也在蔓延孳生，道德滑坡，失礼失信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正是我们多年抛弃礼仪之邦优良传统的必然后果。有感于此，我这些年为清华的本科生开设了“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这门课，目前已经讲了四轮，学生经过学习，都觉得非常受用。因为从小学到大学，从来没有人给他们讲过这方面的知识。而在实际上，作为一名大学生又非

常需要这方面的修养。不少同学学完这门课之后，不管是对老师，还是对他人，都显得彬彬有礼了，说话、写信的遣词用句也能使用雅语，格式也更具传统文化的特色。有些学生甚至认为，如果将这门课在所有学校推广，那么全社会的风气一定会有明显的改观。

实践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好好研究，这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2005年3月6日为香港公务员清华大学研修班所作的讲演）

第46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1)

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

礼乐人生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儒家的礼仪教育：

以太子教育与朱熹的儿童教育为例儒家提倡礼仪教育坦白地说，我不是学教育学的，我是历史系的教师。可能有朋友要说，你既然不是研究教育的，那有什么资格来谈教育问题呢？现在大学的学科体制是从西方引进的，西方没有儒学，它们的学科体制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不对应的。儒学是文史哲贯通的，把西方的体制加到中国文化的头上，儒学就不好安置了。我是研究儒家礼学思想的，今天来和大家谈教育问题，不是我敢于“越位”，而是要回归到儒学的根本上。

儒家是礼治主义者，无论是管理国家，还是教育民众，都不是靠大而无当的理论来运作的，那样只会使国家机器空转，无补于事。儒家的理想，是实现大同世界，这在《礼记》的《礼运》篇里有论述，大家都很熟悉的。大同世界是和谐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四海之内，亲如一家。

这个目标非常伟大，但也非常艰巨，不是成天挂在嘴上喊着就可以实现的。现在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叫《让世界充满爱》。让世界充满爱，愿望很好，可就是没有具体的措施，照这么唱下去，恐怕再过一百年也做不到。

儒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能够提出一个理想世界的目标，而且把这个大目标分解成许多具体的目标，一步一步地来推动。儒家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对人的教育和人性的转化，这些都要通过“礼”来运作。

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要把它们称为礼呢？”我们今天一讲到礼，马上就会想到握手、问候之类的人际交往的礼节，而古人所说的礼，范围很广，包括政治理念、国家制度、生活方式等等。我们看《左传》，古人给礼下的定义是：“礼者，理也。”“礼者，理之不可易

者也。”就是说，礼就是合于道理、天理的行为或者制度。这里的“易”，是变换、移易的意思。“不可易”，就是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或者执政者的更换而改变，因为它是永恒的理念，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提出来的。比如说，儒家提出的“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无论怎么改朝换代，这五种关系总是存在的。有人说今天已经没有国君了，哪里还会有君臣关系呢？这种理解太拘泥于字面意思。古代的“君”，并非都是指国君，只要有下属，就可以称为“君”，我们去读读《仪礼》就可以明白的。古人所说的君臣，实际上是说上级与下级，这种关系恐怕还要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反正我是看不到它被消灭的那一天了。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这五种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关系到整个社会能不能安定、和谐的问题。儒家把处理五伦关系的原则归纳为五句话，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下面我们简单地来谈一下。

第47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2)

父子有亲。父子是骨肉至亲：对于子女来说，父母是自己生命的来源，也是自己生命的最精心的呵护者。对于父母来说，子女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也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子女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如果说要让世界充满爱，那么首先要让父子之间充满爱，然后才谈得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虽然说父子之间的亲情是最自然、最合理的，但是它也是要不断地培育才能走向持久。古人强调“百善孝为先”，是要把孝作为人性向善的起点来加以提倡。要把这种亲情变成普遍的社会风气，一是要靠提倡，二是要有严格的反制措施，有人偏不这么做，你怎么办？所以魏晋以后，以礼入法，把礼的要求转化为法律条例，这是从法律的角度来保证礼的实施。这是中国法系不同于西方法系的地方。在此后历朝历代的法律体系中，亲情被提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例如，殴打或者遗弃父母，属于“十恶不赦”的罪行，是要被处以极刑的。因为这种人已经失去人性，与禽兽没有什么两样了。

今天的中国，由于家家是独生子女，由于缺乏引导，家庭里的爱几乎都是单向的，只有父母爱孩子，孩子不知道如何爱父母。有人开玩笑说，现在的父母都成了“孝子”：孝敬儿子的人！如果从小不培养他对父母的爱心，并且落实到他的行为上，养成习惯，那么只怕到你将来老了，到了需要他尽孝心的时候了，他完全做不到，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从小就没有教过他。

君臣有义。近代以来，人们总是把儒家提倡的君臣关系说成是“愚忠”，所以这一条总是遭到非议。我想，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解，原因之一是某些政治人物的故意曲解；原因之二是缺乏对儒家文献的全面了解。“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要求人人口诛笔伐，写批判孔子的文章。其实，当时写批判文章的人当中，绝大多数的人并没有读过《论语》。你连《论语》都没有读过，你怎么有资

格去批判孔子呢？回想起来，当时人们对于孔子的了解，都是从一些报刊的社论或者红头文件里得到的。而这些社论和文件里提到的孔子，都是被歪曲了的，怎么可以相信呢？其实，孔子曾经周游列国，无道昏君，谁也不肯接受他那套治国方案，他怎么可能号召大家去愚忠呢？孔子说到君臣关系，历来都是双向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你对我以礼相待，我才可以效忠于你的。所谓的"君臣有义"，这个"义"，不是讲义气，在上古语汇里面，义是"宜"的意思。君臣有义，就是彼此相得相宜。

夫妇有别。夫妇一体，至亲至爱。在古代农业社会里，男耕女织，彼此在家庭内和社会里担任的角色判然有别。《管子?五辅》也谈到夫妇之别的问题，一般来说，男主外，女主内。在性格上，丈夫要谨慎朴实，有主见，妻子要忠贞柔顺，识大体。夫妇懂得各自的责职之所在，把各自的事情做好，家庭和社会就会和谐。

兄弟有序。在社会里，无论什么事情，都应该有一个先后秩序，否则就会发生争抢、争斗，那样，社会就会出现无序的状态。儒家认为，建立秩序的方法之一，是依照自然的顺序，也就是年齿的顺序。在不同辈分之间，晚辈要让长辈；在相同辈分之间，则是年轻的让年长的。古人彼此相见，彼此要"序齿"，就是相互要问年龄，年龄长者为尊。彼此的席位，也不能乱坐，而必须遵照"长幼有序"的原则，长者坐在尊位。《三字经》里说"融四岁，能让梨"，孔融才四岁，就懂得谦让。这种美德首先需要在家庭里面培育。

朋友有信。朋友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彼此的交往靠什么来维系？要靠诚信。《论语》里面说，子张向孔子问"行"，就是在社会上处处走得通。孔子回答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意思是说，只要说话能恪守忠信，行为保持诚敬，即使是到了落后的蛮貊之邦，你也一定行得通；反之，即使是在本乡本土，你也别想行得通。可见，孔子把"信"看作是为人的根本。此外，大家非常熟悉的，曾子每天要"三省吾身"，用三件事

来反躬自问，其中的一件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问题多多，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太缺乏诚信。而诚信的问题，是要靠儿童时代就培养的。

第48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3)

我们以上所讲的“五常”，归纳得相当好，但是儒家没有就此为止，而是在每一条之下都给出了具体的措施，这些具体的措施就是礼仪。因此，在儒家教育思想中，礼既是核心，也是体系，又是具体的仪式，它们是一致的。我们翻开《论语》《荀子》《朱子语类》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他们谈教育的时候，都是围绕着礼来展开的。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讨论教育原理的文献《学记》，就是《礼记》里面的一篇。可以说儒家的礼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几乎就是一回事。离开了礼，儒家的教育思想就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古代的大儒，像孔子、孟子、荀子、韩愈、朱熹等等，都是杰出的教育家。

儒家教育思想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注重儿童的教育，舍得在这上面下大功夫，所以中国的童蒙教育特别发达，童蒙教育的书籍也特别多。童蒙类著作中最著名的是“《三》《百》《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文献，内容丰富，文字简明，通篇押韵，朗朗上口，不仅容易记忆，而且切于日用，是儿童教育典范。儒家的童蒙教育，也都是通过礼来展开的，下面我想谈谈周代和宋代的有关情况。

周代太子的教育

在孔子以前，只有贵族子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是由政府垄断的，这叫作“学在官府”。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贵族子弟与富家子弟一样，都是吃喝玩乐、行为不羁的。其实并非都是如此，至少在周代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文献里面看到，地位越高的贵族子弟，会受到越严格的教育。“天下之命，县（悬）于天子”，所以对太子的教育最严格。这里，我们以周文王为例，从文献记载的角度来看看周代太子的教育情况。

大家知道，我们古人历数上古时代的圣贤之君的时候，总是要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尧是唐的君王，舜是虞的君王，禹

是夏朝的开国君王，汤是商朝的开国君王，而周文王并不是西周的开国君王。西周的开国君王是周武王，牧野之战，武王克商，西周才正式立国。可是周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周文王有很高的德性，使得天下归心，《史记》说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人接受天命，是从文王开始的。所以，周文王被后世视为圣人。那么他的高尚的德性是哪里来的呢？是天生就有的呢，还是教而有之的呢？他在做太子的时候要遵守哪些礼节呢？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儒家认为，即使像文王这样的圣人，他的德性也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在《大戴礼记》的《保傅》篇和《礼记》的《文王世子》篇里，记载了西周的太子和王者受教育的情况，以及他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礼节，对我们有借鉴的作用。儒家的儿童教育思想，非常强调两点，一是人性，二是环境。

先谈人性。人是有着丰富情感的动物，懂得喜怒哀乐。感情可以左右人的行为，甚至可以让人不惜为之牺牲性命，可见感情对于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儒家认为，政策的制定要人性化，要充分考虑民众的情感。但是，人性只有在不偏不倚、处于“中”的状态的时候才是理想的。人的偏激、怯弱、暴躁、消沉的性格，不利于人的健康和发展。一般认为，这些性格是先天的。儒家认为，它与孩子在母体孕育期间的生活有关。如果孕妇心情不好，郁悒寡欢；饮食的口味不合适，例如过辣、过咸；或者喜欢听刺激性的、荡心骇气的音乐等等，都会影响到胎儿品性的形成。天性温和敦厚，是孩子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的基础。怎样得到一个天性纯正的孩子？于是，胎教的理论就应运而生了。

《保傅》这篇文章引用了《青史氏之记》中关于胎教的内容。《青史氏之记》今天已经失传，作者是谁，什么时候写成的，今天都已经无法考证，我们只要知道它是一本上古时代的书就行了。《青史氏之记》说，王后怀孕后七个月，就要到宴室去住，有专门的人负责她的起居。在这里，她要遵守“礼乐之教”。三个月之内，如果她想听

的音乐不是先王遗传下来的德音雅乐，那么太师就可以把琴瑟收起来，说这种乐曲我没有练习过，拒绝为她演奏；如果她想要吃的东西不是正味，那么太宰就可以放下炊具，说我不敢用这样的食物来奉侍王太子，拒绝为她烹调。北周学者卢辩在为《保傅》这段文字做的注释中说：文王的母亲大任怀着文王的时候，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起恶言，为的就是保持心性的中正平和。她是真正懂得胎教之道的人，所以受到很多有识之士的称赞。古人认为，孕妇要特别注意所接触的事物，因为“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成天接触真善美的东西，胎儿就有真善美的天性；成天接触假恶丑的东西，胎儿就有假恶丑的天性。所以呢，怀孕期间，要做到“声音滋味，以礼节之”。我个人觉得，中国古代胎教的理论是很有道理的。今天的孕妇都知道要保持愉悦的心情，要多听优美的音乐，也是这个意思。

第49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4)

孟母墓

下面来谈环境。中国古代的教育特别重视环境的影响。人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儒家认为，人的观念得自后天的影响。人是社会的人，无论是谁，都必须在一定的环境中才能生存。我们常说的“存在决定意识”，说的就是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对于辨别是非的能力很差、自制能力很低的儿童，环境的影响就更是不可忽视了。周围的人关注的问题、他们处理事务的方式、民间风俗与习气等，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你。

大家非常熟悉孟母三迁的典故。孟子的天资非常之好，可惜幼年丧父，家里没有了主心骨，没有人能够指导他的人生道路，在这种情况之下，周围的生活环境如何，就显得十分重要。孟子的家原本靠近坟地，所以他小时候经常与其他孩子模仿人家出殡、下葬的事情，这使得孟子的母亲非常不安，觉得这不适合孩子居住。于是，孟母就把家搬到市区去。不料，孟子在闹市区耳濡目染，又模仿起商人做买卖来了。孟母发现市区也不适合孩子居住。于是，又把家搬到了学宫附近，这一下孟子所见所闻都是学校传习的礼仪，所以成天摆弄笾豆簠簋之类的礼器，学习进退揖让之类的礼节，人也变得比以前文雅。孟母高兴地说：这才是适合我孩子居住的地方！所以就定居于此。孟母三迁的典故说明：再聪明的孩子，他的成长也离不开环境。

其实，最早注意到环境对于儿童教育影响的，还不是三次搬迁的孟母，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保傅》等文献。《保傅》篇谈到，武王的儿子成王生下来之后，王室对于他的教育非常之周全。成王是太子，将来要登上王位管理国家的。他的好坏直接影响国家的兴与亡，不能不慎重对待。负责太子教育的是三位德高望重的卿：太保、太傅、太师，合称为三公。三公的分工是，太保负责他的身体健康，太傅负责培养他的德义，太师负责训导。此外，还有“三少”，就是少

保、少傅、少师，级别很高，都是上大夫。三少的职责是“与太子宴者也”，就是与太子在一起生活。

三公、三少对太子的教育分为几个阶段，各有侧重。在太子的孩提时代，三公、三少要教导他懂得孝、仁、礼、义，并且反复去做。太子年龄幼小，为了避免他受到外界的不良影响，要将他周围的邪人赶走，使他的视野之内没有丑恶的行为。这样还不够，还要从各地挑选那些言行端方、懂得孝悌之道的人，让他们来和太子为伴。这样一来，太子每天看到的都是正事，听到的都是正言，走的都是正道，接触到的都是正人。每天与这些品行端正的人在一起，受到的影响都是正面的，太子的品行也就自然而然地端正了。

几年之后，随着太子的成长，生理开始发生变化，有了朦胧的性的意识，开始注意女色了。这个时候，要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学习上去，送他到学宫里去接受系统的教育。上古时代的学宫有东学、南学、西学、北学和太学等五处，传授的知识各有侧重。东学的教育，主题是“上亲而贵仁”，“上”是崇尚的意思。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最亲爱的人都是父母双亲，其次是同一血缘关系的亲属。要教育太子懂得与亲人相处，最重要的是要有仁爱之心。亲族之间的伦理关系，要亲疏有序，恩爱相及。南学的教育，主题是“上齿而贵信”，在血缘亲族之外的社会关系里，要按照年齿的顺序来确定尊卑关系。要教育太子懂得长幼有序，诚信相待的道理。西学的教育，主题是“上贤而贵德”，要教育太子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道理，把圣智者选拔到重要的位置上发挥作用。北学的教育，主题是“上贵而尊爵”，国家的勋贵老臣以及有爵位者，理应得到尊重。教育太子要懂得贵贱有等的道理，这样，上下的秩序才会被遵守。太学是太子承师问道的地方，然后要在行为举止上请太傅指正。如果太子没有按照要求去做，太傅就要用责打的方法加以惩戒。如果太子按照要求做了，但是做得不到位，太傅就要指导他去做到。五学教育的目的是要不断增进太子的道德和知识，使他明白事理。太子是天下人的榜样，只要他能够成就自

己的德性，天下的百姓黎民就都会跟着学习，天下大化的目标就可以实现。

第50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5)

太子到了二十岁，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已经成熟了，有能力独立生活和处理各种事务，已经是成年人了。这一年要为他举行成年仪式，当时称为冠礼。从此以后，太保、太傅、太师不能再像过去对待孩子那样处处严苛地要求他了。尽管如此，太子也难免有说错话、做错事的时候。太子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得失，丝毫马虎不得。为了及时发现和纠正太子可能犯下的错误，专门设立了“司过之史”和“亏膳之宰”这两种特殊的职司。一旦太子有了过错，史官就一定要如实地记载下来，这是他的职责。如果史官胆敢为太子隐瞒，那么就要把他处死。除了史官要记载太子的过失之外，负责太子伙食的宰官还要撤走太子的膳食以示惩戒。如果宰官不这么做，也会被处死。

这样做还不够，为了能有更多的人来参与监督，又专门设置了“进善之旌”、“诽谤之木”和“敢谏之鼓”这三样东西。旌是一种旗子，谁有好的建议，都可以站到它前面，太子必须去听取。“诽谤之木”的“诽谤”，与今天所说的诽谤不同。今天所说的诽谤是造谣、诬蔑，古时候的诽谤是批评，这是要分清楚的。无论是谁，但凡是对太子有所批评的，可以站到诽谤之木前面，太子必须前往倾听。“敢谏之鼓”是为有所劝谏的民众设立的。太子的身份非常特殊，万民天天仰望。好比是太阳和月亮，出现了日食、月食，天下的人没有看不见的。同样，太子把错误改正了，天下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这三件东西的设立，可以使太子所犯错误的损失减少到最小。

除此之外，太子还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境界，不能只是让大家来纠正自己。方法是每天晚上瞽者为太子诵读《诗》，工官要诵读正谏，士则要向太子转达民谣。

大家知道，《诗》的内容都是非常纯正的，所以《论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里面有不少篇章都

是表达情感的，既有对恋人的爱情，对祖宗的崇敬，也有对游子的思念，对贵族的不满，等等，可是，每一篇都能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情感的把握非常有理性。经常诵读默念这些诗篇，性情就会潜移默化，归于雅正。

我国自古就有许多很好的官箴官谏，大多是格言，经常温习，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大戴礼记》里面有一篇《武王践阼》，里面说武王目光所及之处，到处都是警示他的格言，比如他的坐席的四面、楹柱上、手杖上、腰带上、器皿上、门上、窗户上、宝剑上、弓上、矛上，到处都是戒书。比如坐席的前左端写着：“安乐必敬。”意思是居安思危。前右端写着：“无行可悔。”意思是不要去做将来会后悔的事情。洗手的铜盘上写着：“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意思是说，与其覆没于人，宁可覆没于深渊。覆没于深渊还可以游出来，覆没于人就无法可救了。

民谚民谣是人民的心声。我们读《国语》《左传》，就可以看到许多语言生动、文句押韵，甚至带有预言色彩的民谚民谣，它们是民众对为政者褒贬和愿望的集中表述。及时知道民谚民谣，可以了解民心，警示自己。

《文王世子》有不少关于文王幼年表现的记载。还提到了古代的《世子法》。相传文王、武王各有一套《世子法》，世子每一项美德的培养，都有礼法规范可循。例如，为了树立孝敬父母之心，文王每天要三次问候父亲王季。鸡叫头遍的时候，文王就要起身，穿戴整齐之后，来到父亲的寝门前，询问内侍父亲晚上是不是睡得安稳。如果内侍回答说睡得很好，文王的心情就会很好。到了中午和晚上，文王还会到父亲那里询问起居的情况，过程和早晨一样。只要内侍说王季的起居有所不安，文王就会面露忧虑的神色，走路的时候连步子都会不稳。一直要到王季的身体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文王也才会回到常态。每到侍者向王季进膳的时候，文王一定要亲自过问膳食的情况，绝对不允许把变质的食品端上去。

第51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6)

言教不如身教，文王服侍父亲，可以说是竭尽敬爱之心，人人都看在眼里。这就为他的儿子武王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武王成年以后，对待文王也是相当的孝敬。每当文王生病的时候，武王总是守候在他身边，晚上连冠带都不解，以便父亲有所召唤的时候，能够立即去做。武王的生活，一切以文王为中心。如果文王身体不舒服，一天只吃一餐，那么武王也只吃一餐。如果第二天文王身体略有好转，可以吃两餐了，武王才吃两餐。直到文王的病完全好了，武王的起居才恢复常态。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知道，古代培养一个接班人的措施是多么的慎重和周密，古代做一名太子是多么的不容易。从小除了要受到系统的知识教育和礼仪教育之外，一言一行还要受到严格的监督，要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内外身心都能合于天道的境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少年时代养成了好习惯，就会像天生如此一样，中规中矩的言行就会自然地流露出来。

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

周代以后，我国最重视儿童教育的朝代，大概宋朝要算一个。《三字经》和《百家姓》都诞生在宋代。但是，宋代也是古代史上相当特殊的朝代。大家知道，宋朝建立于公元960年，有过它的繁荣时期，可是隐藏的问题也很多，公元1126年，也就是靖康元年，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占了宋的都城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并且大肆掳掠之后才扬长而去。这就是岳飞在他的《满江红》里说的“靖康耻”。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全部丢了。不久，宋高宗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从此偏安于一隅，既不思收复失地，也不思进取，错把临安当汴京，继续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结果，蒙古人兴起了，他们不仅打败了金，而且跨过长江，直捣南宋朝廷。南宋统治者节节败退，一直退到崖山，也就是今天的广东新会的海边上，元

军紧追不舍，皇帝无处可逃，大臣陆秀夫背驮着皇帝从船上跳入海中，最后被海水淹没。如果要对宋朝的灭亡做一个描述，那就是先被金军推到了长江南岸，接着又被元军往南推，一直推进了南海。所以，宋朝是由北而南地被推进海里的。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朝代，这种触目惊心的历史非常值得后人去总结。

朱熹生在南宋，朝廷的腐败和黑暗令他感到非常的痛心。他思考其中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教育的问题。朱熹在《小学题词》中说，宋朝之所以成为衰乱之世，根本的原因，是童蒙教育没有“养其正”，“蒙养弗端，长益浮靡，乡无善俗，世乏良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由于童蒙时期的教育没有能够扶正孩童的心性，所以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就越来越浮华不实。又由于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而是普遍白鹿洞书院中的朱子神像的浮华不实，所以乡间就没有好的风俗，社会上也就缺乏济世的良才。他认为古代圣人“建学立师”的目的，正是要“以培其根，以达其枝”。

朱熹曾经在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讲学，还创办寒泉、竹林等精舍，弟子数以百计，因此有着非常丰富的教育实践。他十分注重用儒家的礼来规范学生的行为和思想。他认为古代圣贤教人为学的目的，“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他不满于当时许多书院学规的浅陋，不能得古人深意。所以，他“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诸楣间”，要求学生“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这就是朱熹亲手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接物之要）

第52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7)

朱熹在他的《大学章句序》里说，上古时候的学制，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从王公以下一直到庶人的子弟，八岁开始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等等比较简单的礼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方面的基础知识。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从天子到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庶民子弟中的学业优秀者，要入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朱熹认为，小学和大学是古人为学的两个阶段，两者的分工是“小学是学其事，大学是穷其理”。

朱熹在《题小学》里说，古代小学所教给孩子的洒扫、应对、进退一类的礼节，以及爱亲、敬长、隆师、亲友的道理，看起来都很简单、细小，但是，这一切都是孩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基，千万不能小看。小小年纪就懂得洒扫应对、入孝出悌的礼节，无论何时何地都谨记不忘。一有时间，就知道要诵诗读书，练习咏歌舞蹈。将来长大了，再行深造，穷理修身，哪里会有不成材的道理？而且，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必须在童稚时期讲习，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比较单纯，身上坏习气比较少，只要教导得法，就能根植在他们的心田。如此一步一步引导，好的习惯就会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而不会有教育不好的问题。

朱熹不仅提出了一系列教学的宗旨，而且还把礼作为为学、修身、处事、接物的依据，他的影响可谓是超越古今，意义深远。

为了使童蒙教育能够与西周的文武之道接轨，朱熹亲自编写了两本非常著名的童蒙教育的教材，一本是朱熹与刘清之合编的《小学》，另一本是《童蒙须知》。《小学》一书，分内外篇，共六卷。内篇有《主教》《明伦》《敬身》《稽古》等四卷，外篇有《嘉言》和《善行》两卷。全书以儒家的道德理念作为准绳，采撷儒家经典中尤其是礼书中的文句编连而成，主要是介绍一些最基本、最浅显的道

理。《小学》面世之后，被列入学官，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在士大夫和民间广为流传。这本书在明朝传入朝鲜，经过著名学者金宏弼等的提倡，备受儒林的推崇，认为这是淑世教民最切要的著作。后来，《小学》又被政府指定为朝鲜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屡屡翻刻印行，广颁于国中。

朱熹认为，对儿童的教育，大道理一定不能多，那些东西孩子理解不了，要紧的是要求他怎么做。所以，他的《童蒙须知》重在规范儿童的行为。全书分为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杂细事宜等五部分。朱熹在这本书的开头对各章的内在逻辑做了说明："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可见五章的顺序是刻意安排的，有一个先后秩序和轻重缓急的考虑在里面。

《童蒙须知》里的许多材料都是从《礼记》里面选取来的。朱熹认为，《礼记》里的《曲礼》《少仪》《内则》，以及《弟子职》等篇，就是上古时代小学教育残留下来的教材，所以，他特别重视这些材料，认为要弘扬儒家的圣贤之道，就一定要把这些材料作为基础。但是，古今异制，古礼难以简单移用，必须"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因此，朱熹又在其中增加了适宜于时势的内容，再条分缕析，分类编排。务求每一条的要求都非常具体、明确，便于孩子理解和操作。下面我们来举些例子。例如《衣服冠履第一》提到孩子的仪容时，就有许多具体的要求：

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

《礼记》说："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要进入礼仪场合，首先要端正容体，就是要端正身体，把衣冠穿戴整齐。朱熹把这一点放在"为人之先"的地位来要求，是深得古礼的大旨的。与先秦的衣服相比，宋人的服饰有了很大的变化，朱熹并没有要求孩子们都换上古装，那种服装已经过时了，应该与时俱进，认同大家的服装。但是，

古礼对于衣冠要整洁的要求并没有过时，所以他要求“先要身体端整”，冠巾、衣服、鞋袜，要“常令洁净整齐”。

第53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8)

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衿领。结两衽纽带，不可令有阙落。

这一条是对穿衣服的具体规定，衣领要提整起来，这样才显得精神。此外，腰间的纽带一定要系好，不可以松松垮垮。

我先人常训子弟云，男子有三紧：谓头紧，腰紧，脚紧。头谓头巾，未冠者总髻（束发），腰谓以条或带束腰，脚谓鞋袜。此三者要紧束，不可宽慢。宽慢则身体放肆不端严，为人所轻贱矣。

这是朱熹自述家门内对于衣冠服饰的严格要求。头、腰、脚是人的服饰的三个最关键的部位，头巾、腰带和袜都束紧了，人就显得精神、利落，做事也方便。如果不这样做，处处宽慢，那么一点好处也不会有，只会给人以“放肆不端严”的印象而“为人所轻贱”。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应邀在媒体上做嘉宾的演员，衣衫不整，甚至故意把鸭舌帽反过来戴，或者歪戴，这不是角色的需要，而是自我展示。他们这种打扮，只能给人以玩世不恭的印象。这些演员属于公众人物，在公众场合露面，要考虑会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要考虑会给少年儿童留下怎样的印象，上镜前应该仔细检点自己的形象。

例如《杂细事宜第五》有以下的种种要求：

凡相揖必折腰。

作揖，是古人见面时最常用的一个形体语言。要领是双手成合抱状相接，今天我们看到太极拳表演时还用这种动作。但是，彼此相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平辈之间的，还有一种是长幼之间的。平辈之间作揖，双手合抱就可以了，晚辈与长辈作揖就不可以这样了，必须再加上“折腰”的动作，就是弯下腰，相当于鞠躬。一边弯下腰，一边双手合抱，这是一种非常恭敬的表示。如果见到长辈，行礼时挺直了身子作揖，是非常失礼的。《弟子规》把这句话改编成“揖深圆，拜恭敬”六个字，鞠躬要深，抱手要圆，意思是一样的，但是便于记忆。

凡道路，遇长者，必正立拱手，疾趋而揖。

这句话是说路上遇到长者的礼节。首先是“正立”，要停下来，站端正，然后拱手打招呼，但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不能打一个招呼扭头就走了，还要“疾趋而揖”。“趋”是小步快走，“疾趋”是比“趋”再快一点。为什么要用“疾趋”的方式去到长者的面前，而不能慢吞吞地走过去呢？因为，到长者面前去是唯恐长者有什么事情需要自己帮助，或者是对自己有什么指教，无论是那种情况，都必须尽快过去。如果慢吞吞地过去，就让人觉得是不愿意去帮助他、听他的指教，那是内心不恭敬的表现。

凡对父母长上朋友必称名。

凡称呼长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

这两句话是教孩子怎么样与长辈打招呼。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两句话的意思，今天的人已经听不懂了，所以我在这里先要介绍一下古代的名和字的知识。古代每个人除了有姓、有名之外，还有字。比如，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孔子是尊称。刘备，姓刘，名备，字玄德。诸葛亮，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按照规矩，字是男子在成年礼上请人取的。为什么有名有姓了，还要再取一个字呢？古人认为，名是父亲给取的，非常宝贵，只有他的父母、祖辈以及国君可以直呼其名，其他人如果直呼其名那是非常失礼的。那么，怎么办呢？于是就给他取一个字，其他人与之交往，可以喊他的字。称对方的字是对对方表示尊敬。但是反过来，自己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就不可以称自己的字，那样是自大的表现。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来解释上面的两句话了。晚辈见到父母和长上朋友，一定要称自己的名，而不能称字，因为自己是晚辈。称呼长上的时候，不可以称呼他们的字，因为那是平辈之间的礼节。晚辈称呼长上，一定要称“丈”。丈是对老者的尊称。

凡侍长者之侧，必正言拱手。有所问，则必诚实对言，不可妄。

这段话是教孩子怎样与长者说话。“侍长者之侧”，是在长者身边陪坐，或者是站立。一般来说，长者坐着的时候，晚辈应该在旁边站

着，这一方面是表示不敢与长者平起平坐，另一方面是表示随时准备为长者所使唤。如果得到长者的特许，也可以坐着，但要坐在长者的对面或者下方，决不可以并排而坐。在这种情况下与长者说话，要“正言拱手”。“拱手”，我们已经说过了，是表示敬意；“正言”是身体和神色都要端正，不可以歪着、倚着身子，也不可以有怠惰、轻浮的神色。回答长者的问话，一定要诚实，实事求是，不可虚妄，这一点非常重要。儒家非常强调真诚，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最后一个“知”字要读作“智”，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智”，是聪明的行为。诚实是靠教育来培养的，而教育是要靠平时点点滴滴地渗透的。

第54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9)

上面的几段话是要告诉孩子，尊敬老人是要通过这样的礼节来体现的，而不是挂在嘴上说说就可以的。现在我们提倡尊老很多年，效果很差，原因在哪里？我觉得是没有落实到每个晚辈的行为上。许多单位的尊老只有几件事，比如重阳节带退休的老人去爬一次山，再就是过年之前给他们送一个红包，或者是一些礼物。除此之外，就很少有人想到他们了。而单位的大部分人不参与这些事情，所以没有影响。照这样子提倡尊老，大概一百年也形成不了风气的。

凡众坐，必敛身，勿广占坐席。

这一条是说与人聚饮时候的注意事项。由于是“众坐”，人比较多，就一定会显得拥挤，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光想着自己舒坦，张开两腿，撑开双臂，或者一个人占几个人的位置，这是很不道德的。今天，我们在火车站候车室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尽管候车的人很多，但总有人会躺在长条椅子上，或者用行李占着几个座位，别的乘客没有地方坐，他们装着没看到。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恶习？是因为儿童时代没有人教他们。将来要彻底扫除这些有失体统的现象，必须从小时候抓起。

凡饮食，举匙必置箸，举箸必置匙。食已，则置匙箸于案。

这一条和下面一条是讲餐饮礼节的。我们常说：“吃要有吃相。”也经常听到有人批评说：“你的吃相怎么这么难看？”我们看看《礼记》就可以知道，古人餐饮的时候是非常文雅的，一点也不比今天的西方人差。上面的这一条，就是其中之一。

凡饮食于长上之前，必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在长上之前饮食，属于正式场合，不比一个人私下吃饭，一定要注意“吃相”。这一条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轻嚼缓咽，二是吃饭时，双唇和舌头不要发出响声。这两点既是要求孩子注意文雅，又有饮食卫生方面的考虑。轻嚼缓咽的反面是狼吞虎咽，有贪吃之嫌。贪吃就

会给人以只顾自己多吃，不管他人吃没吃饱的印象。而且由于吃得快，唇和舌就容易发出令旁人不愉快的怪声，这也是有伤大雅的。所以，《礼记》上有不少劝人从容、优雅地进餐的文字。此外，孩子的肠胃比较弱，食物如果不经充分咀嚼就吞下去，就难以消化吸收。所以《论语》里有“食不语，寝不言”的话，古汉语里面的“语”字，有彼此讨论的意思，“食不语”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谈话，以免影响消化。你看，这一条对于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多么的贴切！

凡饮酒，不可令至醉。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度，由于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很高，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发明了酒。少量饮酒，有益于健康，但如果不知道节制，以酗酒为乐，不仅会伤身体，而且会乱性，引发其他种种问题。大家知道，商朝的纣之所以成为亡国之君，原因之一就是酗酒。所以周公摄政期间，专门发表了一个严禁周人酗酒的文诰，叫做《酒诰》。周公说，商人酗酒，喝得酒腥气都冲到天上去了，连上天都闻到了，怎么会不灭亡他们呢？所以，周公规定，担任领导职务的周人，平时不许喝酒，只有祭祀的时候，才可以喝醉。凡是喝酒误事的都要处死，以儆效尤。朱熹很在意周公的这个规定，把它写在《童蒙须知》里面，是很有深意的。因为一旦在青少年时代养成了酗酒的习惯，将来要纠正就不太容易了。所以，必须从小就要把它作为一条戒律定下来，让孩子谨记在心。其实大家都知道，从古到今，酒在官场里面扮演的角色，总体上是不那么好的，有时简直就是腐败的催化剂。这些年，有些人出于商业炒作的目的，过度地宣扬“酒文化”，是很有问题的。

总而言之，朱熹的教育思想里渗透着用礼仪来变化孩子气质的理念，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他的举措，不得不为他的高明和卓识而叹服。

关于当代青少年教育的思考

望子成龙，这是人之常情。任何一位家长，都会对自己的孩子寄予殷切的期盼，希望他成为出色的人才，成为自己的骄傲，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目前在家长和学校里有一大误区，就是迷信天才教育。许多家长希望孩子成为天才、超天才。为此目的，让孩子不满一岁就学认字，刚会走路就学体操，希望孩子将来成为国际明星，出人头地。这些想法非常不切实际，因为天才总是极少数，只有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否则就不叫天才了。绝大多数人还是要做普通人的。天才教育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具有很大的商业炒作的成分。

第55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10)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教育孩子呢？我想结合我在前面讲过的内容，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首先，对于古人来说，青少年的教育，第一位的事情不是读书、学知识，而是学做人，学习做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而且，在儒家的知识体系里，读书与做人是一致的，我们读《论语》，讲的几乎全是做人的道理。一个有着良好品格的孩子，将来不管从事什么职业，终究都能胜任愉快的。这一点，无论是对孩子本人，还是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事。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身心，正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本意之所在。

而在天才教育之下，人格教育几乎没有位置。许多家长认为，只有考试成绩才是真东西，品德好管什么用？只要不犯法就行。还有家长认为，老实本分的孩子会受人欺负，是没有用的表现。我们看到许多孩子手上有一大堆证书，有各种各样的技艺或者外语能力，可就是没有做人的合格证书。考上了大学后，必须独自处理各种关系，由于从小没有受到这方面的教育，以及父母的溺爱，不懂得尊重老师，不懂得平等对待他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结果既成不了才，也成不了人。大家可能还记得，“文革”过后，中国科技大学有一个少年班，招收了一批智力超常的少年，一时轰动全国。可是，在这些人当中，最后不仅没有几个是成了大器的，而且还有的人离群索居，甚至出家，一事无成，令人感到非常惋惜。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我想他们从小缺少人格教育是否也是一个原因呢？

其次，古人是做得多，说得少，而我们正好相反，是说得多，做得少。其中的原因，一是因为古人看重孩子的品行，我们看重孩子的分数；二是因为古代注重礼仪教育，明白礼仪教育是培养孩子良好习惯和品行必不可少的手段，而我们在“文革”中批判师道尊严，学校里原本就有的礼仪被扫地出门了，如何恢复和重建，似乎没有人认真地

考虑过。大概二十年前，有关部门提出了在中小学提倡“五讲四美”的活动，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主意，可惜由于没有礼仪这个工具，无法细化，也无法深入。什么是“讲礼貌”？没有细目。按照一般的理解，似乎就是不打人、不骂人。什么是“讲道德”？也没有细目。所以，尽管“五讲四美”学生都能背得出，可是，它始终挂在墙上，没有化到学生的言行上。说一套，做一套，成了两张皮。要改变这种状况，就一定要推行礼仪教育，让学生一举手、一投足，都能显示出应有的教养，动止进退，处处如仪。

第三，道德原则与行为规范要很好结合。我们前面谈到，朱熹在《小学》里提出了童蒙教育的许多原则，而在《童蒙须知》里列举了许多礼仪的细目，这是非常高明的。如果只会背诵为人的准则，而不能见诸行为，那么那些准则就是空道理。相反，如果只会按照规矩做，而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孩子的行为就有盲目性，也不能往德的方向提升。

第四，我们当前大中小学的办学理念，总体上是迷茫的。从小学到大学，孩子惟一的目标是升学，考重点学校、名牌大学，然后可以出国挣大钱，应试教育一条龙。我国古代的教育，有许多很好的理念，可是在浅薄的进化观的影响下，多被当作封建糟粕或者过时落伍的破烂抛弃了。他们总认为自己要比古人高明得多，所以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试图通过割断历史来创造辉煌，而不知道只有不断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才能发展的道理。他们总认为西方人比中国人厉害，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要与国际“接轨”。最后的结果是，人家的好东西没有学到，自家的好东西也丢了，造成了目前这种不中不西的教育，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的这个评语的。

（2004年2月25日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的讲演）本体?功夫?境界：

人文的知识与素养人生与知识的关系，古代有学者表述为：本体、功夫、境界。作为认知本体的人，几乎没有生而知之者。要想成

贤、成圣，做一名境界高远的人，需要付出毕生的功夫。功夫是提升本体境界的惟一途径。功夫在本体自身而言，主要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礼记》（宋刻本）、治国、平天下；在教师而言，便是传道、授业、解惑。

第56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11)

我国有悠久的人文传统，注重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把知识教育作为塑造“君子”的手段。《礼记?经解》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诵读六经，固然有获取知识的目的在内，但获取知识的目的却是砥砺人的品性，班固说“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可见古人的认识是相当明确的。

读书是为了明理，读书与做人是一致的，“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因此，检验读书好坏的标志，是人格提高与否。宋人程颢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因此，作为教学过程主导者的教师，责任也就不仅仅是文本答疑了，韩愈把“传道”放在教师职责的第一位，大有深意。

当今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什么？人文素质教育与人文知识教育是否等同？这是我们必须深入思索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不想透彻，课程设计和教学方式就会发生偏差，就难以达到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最近读到龙应台先生的一篇文章《为什么需要人文素养》，将人文知识与人文素养的区分说得相当之明晓：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龙先生认为，人文知识与人文素养是不同层次的东西，前者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因此，人文知识教育所关注的是纯粹的知识传授。而人文素质教育不然，它“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并且要把对“人”的关怀，作为自己的“终极关怀”。这是十分精辟的论述。

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格完善的科学人才，它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是学生的精神层面，包括人格修养、精神境界、文化自觉、社会责任等等；二是学生的专业技能，是学生改造社会、造福人类的手段。文化素质课虽有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的任务，但落脚点却是在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上；这是专业课所不能替代，或者说不能完全替代的。

近几年，我为全校学生开设了“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甲骨文与古代中国文明”等人文素质课。基于上述的认识，我在教学中比较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在此，我想以“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课为例，谈一些自己的体会。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钱穆先生说：“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体现。礼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思想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展现，否则就成了无处寄寓的游魂；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否则就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我国的传统礼仪，强调内在德性的能动作用，把道德作为礼仪的依据，而不是把礼当作外在的、技术性的东西。因此，礼的传授，一定要把人文精神作为重心。我在讲授中特别注重分析两点：

第一，“德”是礼的灵魂。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要依靠道德来维系。礼的种种规范，之所以值得我们去遵行，是因为它符合于道德的要求，《左传》说：“礼者，理也。”学礼首先要立德，让德在内心扎根，并且时时加以培植。《礼记》把“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作为礼仪教育的最高境界。品德高尚的君子，是因为他有“德辉动于内”，

“德”字在他内心闪耀着光辉；所以当“礼发诸外”时，他的言谈举止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第57节：礼仪传承与当代教育(12)

第二，“敬”是礼的核心。《礼记?曲礼》开篇就说“毋不敬”，郑玄说“礼以敬为主”，朱熹认为“毋不敬”是全篇的纲领。我们要求学生：心中要有一个大写的“敬”字，树立严肃恭敬的人生态度，把“敬”字扩大到敬己、敬人、敬业等各个方面。我们还注意将礼与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相联系。《礼记》说：“礼者，自卑而敬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即便是挑着担子做小买卖的“负贩者”，同样有做人的尊严，他们依靠自己的辛劳来生活，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为此，我们要求学生对学校的保安、勤杂工等都要有尊重之心，不要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以从事简单而繁重的工作为生而鄙视他们，他们的工作同样是文明社会所不可缺少的。

人文知识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不是两张皮，人文知识是人文精神的载体，只有将知识讲透、讲精彩，人文精神才能彰显。而如果离开了知识点的讲授，只讲礼学精神，就会将思想架空。因此，在教学中要很好地处理两者的关系。俗话说“画龙点睛”，首先要把龙画好，点睛之笔是关键之笔，可以赋予龙以生命，画龙与点睛的完美结合，才能收满壁生辉之效。课堂教学也是如此，某些关键之语，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谈何容易，无一不是费尽心机、绞尽脑汁。这正是我们在教学中苦苦追求的境界。

礼是要践行的，所以《礼记》说：“礼者，履也。”为了让学生在知识和行为上同时有所变化，我们做了若干规定，如上下课时，教师与学生起立，互相鞠躬行礼；学生提问要起立，不能坐在下面歪着身子指手画脚；听课时不得迟到、吃零食等。这些看似对小学生的要求，对大学生实行起来却并不容易。

清乾隆写绘本《圣迹全图》之一页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我们还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学生融入课堂教学的氛围之中，提高教学的实效性。例如，在详尽介绍古代礼

仪的形式和人文内涵的基础上，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时代特征，来为自己或者社会设计传统与现实相结合的、富有人文精神的成年礼、婚礼、相见礼等；用学到的传统书信知识，给父母、老师、同学写一封格式规范、文字典雅的信件。学生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提出了许多很有创意的方案。

古代的礼书，文古义奥，韩愈就感叹其“难读”。为了把这样一种专门之学转化为大学生都能理解的知识，我花了三年的时间来撰写教材，删繁就简，取精用弘，并且不断改进，每一轮教学周期完成后，我都会总结教学中的得失，包括使用的资料和引证的文献是否合适，学生的水平是否了解，反复改进，力求精益求精。希望能让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变化气质，涵养德性，提升境界。

（《新清华》2005年10月20日第3版）

第58节：礼仪践行与古礼寻访(1)

礼仪践行与古礼寻访

礼乐人生礼仪践行与古礼寻访变化气质，涵养德性：

知行合一与继承创新2001年秋，我开始为全校本科生开设“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的人文选修课，至今已经讲第四轮。在此过程中，我对文化素质教育课的性质、特点以及本课程的理念、定位、教学环节、教学风格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和摸索，得到了一些粗浅的体会。

知行合一：“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课的定位

开设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课程性质的定位，它直接关系到教材的设计、理念的贯穿、教法的特色等重要问题，不能不静心思考。

目前，清华大学文化素质选修课的承担者，大体是文史哲以及艺术类学科的教师，而听课的学生则是以理工科学生为主，因而，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认识：文化素质课的主要目的在于弥补理工科学生文科知识的不足，提高他们的艺术修养。按照这种理解，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只要将文、史、哲等系的基础课变成理工科学生的必修课或者选修课即可，但如此一来，“文化素质教育课”一词就没有了特定的涵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格完善的科学人才，它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是学生的精神层面，包括人格修养、精神境界、文化自觉、社会责任等等；二是学生的专业技能，是学生改造社会、造福人类的手段。文化素质课虽有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的任务，但落脚点却是在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上；这是专业课所不能替代，或者说不能完全替代的。在较长的一个时期之内，我国教育界为应试教育所左右，造成了人才培养的种种偏颇和缺失。文化素质教育正是为了纠正这一弊端而提出来的，它标志着我国教学理念正在实现从单纯的专业教育向素质教育或全人教育的的重大转变。

在古希腊的人文传统中，知识与人格不可分离，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就是知识”（参阅胡显章《明确办学理念，转变教育思想，深化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载《走出“半人时代”——两岸三地学者谈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第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这种认识也为当今国际教育界所继承，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全世界第一届高等教育大会”发表宣言，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任的公民。香港中文大学郑汉文教授提出“品质为教育之本”的观点，认为大学教育的终极目标，乃是培养具备优秀品质的人才。

基于上述认识，我为全校本科生开设了“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这门课程。我认为，这门课最大的优长在于可以从“知”和“行”两个方面展开，让学生同时受益。

众所周知，由于“文革”错误地将文明礼貌当作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一概否定，造成了文化传承的中衰和社会交往的严重失范，国民素质普遍下降。北京号称全国的“首善之区”，而各大商场的服务员连“对不起”、“谢谢”、“没关系”、“您请”等十个字的礼貌用语都说不好。由于多年批判“师道尊严”，师生之间几乎没有礼节，校园里失礼现象触目皆是，学生不知如何尊师敬长，不懂得礼让谦退：上课迟到者，旁若无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与人谈话时，嘴里嚼着口香糖；有的骑自行车在校园内横冲直撞，甚至撞到了老师也不道歉。整个社会也是如此，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国民腰缠万贯、出国旅游者甚众，但由于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举止粗俗，形象不佳，据报载，去年9月1日，欧盟整体对华开放旅游以后，蜂拥而至的中国游客不遵守公共秩序，不讲卫生，不爱护环境，损坏公物，已成为当地社会“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参阅《环球时报》2004年12月8日第7版《中欧交往面临的三个问题》）。

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许多学生意识到自身修养的欠缺，有一位接待过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学生的同学告诉我，新竹清华的同学言谈举

止都彬彬有礼，彼此之间都非常和谐亲切，洋溢着东方学子的文化底蕴和儒雅之风，这令他非常羡慕，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人，但不知到哪里去学。类似的感慨，在当今的学生中相当普遍。

纠正国民的不文明现象，引导大众走向文明，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我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有完整的理论形态，礼乐文明是东方文化最具特色的部分。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指出，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礼”。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统礼仪文化正可以成为我们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借鉴。

中国古代礼学不仅有精深的理论和博大的体系，而且有鲜明的践履性，即实践的特点，《吕氏春秋?孝行览》说：“礼者，履此者也。”在传统的礼学中，道德、道理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随处可以体现的，而礼正是道德在行为上的体现。学习礼仪规范，长期坚持实践，身体力行，可以使道德意识内化，反过来促进内心德性的培养。

学习和了解古代礼仪文明，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取得传统文化知识方面的制高点，深刻认识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且可以帮助学生克服读书与做人“两张皮”的问题，将知识与品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深入学习礼仪文化的过程中，去体验和践行礼学的真谛，不断规范自己的行为，让“行”与“知”并进。

第59节：礼仪践行与古礼寻访(2)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定：开设“中国古代礼仪文明”文化素质选修课，无疑是实施“知行合一”教学理念的有效途径之一。

返本开新：编撰教材的原则

教材是教学之本，课程建设必须紧紧抓住教材建设这一基本环节。当前有少数大学开设了礼仪教育课，其教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某些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编写的西方礼仪教材，旨在帮助将来从事国际交往的学生学习西方礼仪；另一类是某些普通院校为本校学生开的选修课，目的是要指导学生在就业面试时如何应对。后一类教材一般比较肤浅，没有理论体系，不谈内心素质的提升，而着重于外表，犹如某些宾馆训练服务员，行为固然得体，思想素质却不高。前一类教材作为了解外国礼仪的读本自无不可，但要作为在礼仪之邦的中国普遍推广的教材，显然是不适合的。任何民族都有自己文化表征的礼仪，我们决不能放弃本民族的尊严，去盲目追随西方礼仪。因此，我们必须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礼仪教育的教材。

迄今为止，海内外各类大学尚无一家开设过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的课程，因此，我们在撰写教材时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礼学自古以繁难著称，作为古代礼学理论形态的《周礼》《仪礼》和《礼记》等三部经典，文古义奥，韩愈就已直言其“难读”，故学术界每每有“殆成绝学”之叹，平心而论，即使是对文史专业的学生讲授礼学，也绝非易事；加之没有一本现成的教材可供参考，处于“零”起点，要编写出一本大学素质教育的教材，确实是非常严峻的挑战。为此，我用了相当的功夫来研究浩繁的文献，做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分析，并对基本素材做了大刀阔斧的处理。为了慎重起见，我将讲稿整理成文，用了三年的时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上连载，听取读者反应，最后才集结成书，作为教材正式出版。

为了突出中国传统礼学的特点，我将课程的结构分成两大部分：一是古代礼学的理论，包括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礼的起源、礼的学理、礼的分类、礼的要素、礼与乐的关系等等，希望学生由此获得关于中国礼学的宏观的、有理论深度的总体认识；二是古代礼仪的举例，例如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射礼、聘礼、丧礼等，多是学生在课外阅读时每每会遇到而又无处问询的问题，主要介绍它们所蕴涵的人文意义，使学生由此获得对于中国古代礼仪的生动、深刻的认识。

教材编写的宗旨是，求真实，求简明，求超越。所谓真实，是指忠实于原典，要把古代礼仪的人文精神准确地表达出来，客观地勾勒古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尤其是要把“文革”中被“四人帮”歪曲了的地方纠正过来，使学生获得对于“礼仪之邦”的真切认识。为此，我对每个章节的标题反复推敲，尽可能使用原典中最典型的语句来表达，力求精到。

所谓简明，是文字叙述简洁、明快，便于理工科学生阅读。例如古代礼仪之学是礼法和礼义之学，礼法即通常所说的仪式，是礼仪的物质形态，是礼仪得以寄寓的外壳；礼义是仪式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礼的灵魂之所在，两者互为依存，缺一不可。为了突出文化素质课的特点，我们对礼法部分的琐碎仪节进行删繁就简，只提取其最关键的内容，构成礼的梗概，向同学介绍，其余的忽略不计。

所谓超越，是指要有时代精神。介绍中国古代的礼仪文化，不是要让学生回到古代去，搞复古主义，那样做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我们的宗旨是“返本开新”，也就是说，要立足于民族之本，站到今天的时代高度来正确对待古代礼仪这份思想资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建立新的富于民族特色的礼仪文化。

本教材在连载过程中，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文史知识》编辑部曾经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对我主持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专栏予以充分肯定。教材出版后，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华和北京

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刘宁等撰写长篇书评，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在中国传统礼仪教育领域具有开创的意义。

第60节：礼仪践行与古礼寻访(3)

变化气质，涵养德性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将提高学生内在素质放在第一位，而将礼仪技巧放在从属的位置。我国古代礼学的理论体系，礼包括礼法和礼义两大部分，礼法即所谓仪式，是礼的物质形式；礼义是礼仪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礼的灵魂。礼法与礼义互为依存，如果失去了其中的一方，另一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没有礼义，礼法就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没有礼法，礼义就无从体现，成为无处寄寓的游魂。

礼表现在人身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徒具外表的彬彬有礼，其内心如何不得而知；另一种是发自内心的道德修养、处处中规中矩的礼。两种情况代表着截然不同的境界。我国古代的贤哲，旗帜鲜明地反对徒具形式的礼。例如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此外，《左传》记载说，鲁昭公到晋国访问，在漫长而复杂的仪式中，鲁昭公应对自如，完全没有错误，赢得了许多人的赞叹。但是，晋国的贤哲却说：鲁昭公昏庸无道，内心完全没有恭敬之心，他所行的不过是徒具形式的"仪"，根本就不是"礼"！失去道德和品性引领的行为，样子做得再好看，也不过是"做秀"，于人、于己、于社会都没有任何益处。没有这样的认识，势必会将教学的重心落在交际的技巧上，学生的兴奋点也会集中在如何揣摩对方的心思、如何通过"做秀"来取悦对方上。其结果势必南辕北辙，养成学生的双重人格。

为此，我在教学中处处突出中国礼学的人文精神，将它作为礼的神髓贯穿于每堂课的讲授中，务求学生在心悦诚服地接受教师讲授的过程中，变化气质，涵养德性，真正做到"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

我们讲解古代的乡射礼，标题就是"立德正己之礼"，说明古代的射箭比赛，是被提高到"道"的层次来对待的（射礼传到韩国、日本之后，被称为"弓道"），已经被哲学化，主旨是修身。孔子说："君子无

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意思是说，君子注重自身修养，不与人做无聊的恶斗。如果一定要说与人有所争的话，那么就是乡射，因为这是一种体育竞赛，是要决出胜负的。但即便是如此，君子也是恭敬地与对手谦让着上堂，下来后一起饮酒，这就是君子之争。这是君子对待竞争的正确态度。此外，古代射礼十分讲究射手的道德资质，“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得参与。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日寇肆虐。某日，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在辅仁大学的操场上对全校学生讲话时，引用了这段话，说：“古代体育运动，有三种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那就是对敌作战不勇敢的人，对亡国负有责任的官员，以及认贼作父的人！”陈垣先生引用的这段文字，不仅非常切合当时的社会局势，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乡射礼的精神内涵。我们每次讲完之后，教室之内总是一片肃然，学生对于德与礼的关系的认识由此得以提升。

此外，近些年由于社会上过度地强调法治，忽视德治，从而出现了某些误区。例如有些学生认为：“只要不犯法，就是好公民，犯了法自有公安在管，德行不德行，没有必要去想，何必苦苦地约束自己？”针对这一认识，我们强调法治与德治是社会进步的两轮，是时代飞跃的两翼，缺一不可。法是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底线，断然不可抛弃。如果将它当作人生的惟一原则，就降低了人的价值。人是具有理性的动物。人的理性不仅体现在不去触犯法律上，而且体现在道德自律上；作为知识精英，还表现在懂得用道德形象来引领社会向上。如果全社会成员都能从涵养自身的内在德性做起，不断增强道德自律的能力，许多社会问题就可以标本兼治，社会风气也就可以不断净化。

我们还将礼与关注弱势群体相联系。《礼记》说：“礼者，自卑而敬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也就是说，即便是挑着担子做小买卖的“负贩者”，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劳来维持生活，同样有做人的尊严，也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根据这一原则，我们要求学生对学校的保安、勤杂工等都要有尊重之心，不要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以

从事简单而繁重的工作为生而鄙视他们，他们的工作同样是文明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我们不仅要尊重他们，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帮助他们。

第61节：礼仪践行与古礼寻访(4)

我们认为，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授传统礼仪，才有可能给学生以理论高度，学生也才可能有礼的自觉，并且树立起人文关怀的理念。

在讨论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

讨论式教学，是教育界一贯提倡的方法，其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吸引学生的积极参与。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就不能调动学生的思维，也就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讨论式教学可以直接了解学生真实的思维状况，包括他们感兴趣或者苦恼的问题，以及对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等。只有不断贴近学生的脉搏，才能收到教学的成效。因此，我们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学生融入课堂教学的氛围之中，提高教学的实效性。我们采用了如下的方法：

首先，尽可能地让学生谈自己所闻所见的礼仪活动。每个学生都会参加或听说过某些礼仪活动，如成年仪式、婚礼、丧礼等，由于阅历和视角的不同，各自都有独到的感受。我们在讲授中，总是利用一切机会让学生讲述自己的感受，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例如，讲授到古代的“冠礼”（成年礼）时，就让在高中时参加过成年仪式的学生起来介绍礼仪的情况，并进行评价。经过多次的了解，我们发现学生普遍希望参加成年礼，因为它有助于确立自己的成年意识，但是，多数学生对学校设计的仪式不满意，认为形式主义的色彩太浓，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此外，我们还让不同民族的学生谈他们的民族礼仪。例如，让韩国留学生以“韩国人的一天”介绍韩国今日的家庭礼仪，让藏族学生介绍西藏的天葬等等，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也拉近了学生之间的距离。

清《光绪大婚图》中王公大臣跪拜场面

专题讲解一定要与学生的社会意识相结合。例如，当代青年人的成年意识普遍比较薄弱，许多学生上了大学之后，尽管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但依然依赖家庭来维持自己“体面”的生活，对家庭和社会都缺乏责任心。因此，我们在讲古代成年礼时，让学生谈什么是成年意识，当前有哪些不具责任心的行为，成年人应该具有怎样的责任心，又如，当今青年中流行未婚同居、“试婚”等现象，家庭观念薄弱，婚姻不稳定，我们在讲古代婚礼时，着重讲传统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追求“地久天长”的传统婚姻理念，让学生将两种婚姻观加以比较，分析各自的利弊，阐述自己的价值观和婚姻观。以此为基础，我们将期中作业和期末作业安排成实践性的，要求学生自己设计成年礼、婚礼、交往礼仪等等。学生们经过学习，对传统礼仪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让他们来设计既有民族特色，又能适应时代需要的礼仪，就会有很强的针对性。如当今的婚礼，大多比富斗阔，铺张浪费，失去了婚礼应有的内涵，许多学生对此也比较反感，他们对自己将来的婚礼充满憧憬，现在让他们自己来为自己或者社会设计富有人文精神的婚礼，学生们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提出了许多很有新意的方案。不仅让学生动了手，而且让他们动了脑筋，促进了学生深入的思考。

第二，某些实用性的礼节介绍。例如书信，如何给父母、朋友或老师写典雅、得体、富有书卷气的书信，社会交往中如何使用敬语，等等，也都采用讨论的形式让学生参与；或者模拟某个礼仪场景，让学生担当一定的角色，让大家来讨论。由于学生普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类似的讨论往往可以收到“困而后知不足”的效果，引起学生求知的热情。有学生在本课程的教学点评中说：“作业很能锻炼大家的能力，不妨增加到每学期三到四次。”

第三，通过教师躬身垂范来增加学生礼的意识。在课堂教学中，礼是无处不在的，教师要善于把握，及时提出要求，让学生将礼学知识内化。例如，从第一堂课开始，我每次都在开始和结束时给学生行

鞠躬礼，但是学生都安坐不动，坦然接受。此外，有不少同学提问时不起立，在座位上指手画脚。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提出“礼尚往来”的问题，即礼是讲互相尊重的，同学们如此举止，连师生平等都算不上，你们心中那个大写的“敬”字到哪里去了？于是，全场一片惭愧之声，学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礼。于是，从这节课开始，每逢上下课，大家都自觉起立向老师行礼。课上也很少有嚼口香糖、听音乐、写作业的现象了。

第62节：礼仪践行与古礼寻访(5)

第四，课堂之外的讨论。本课程的教学在学生中引起较好的反响。校学生会曾经邀请我就礼仪问题做讲演。清华大学环境4班的同学拟申请一个推广礼仪文明的素质拓展项目，邀请我就此问题去与班上的几十位同学做讲座，并进行指导。最近又有电子系、传播学院的同学来找我做讲座。我的教学、科研任务非常繁重，但凡是遇到这类活动，总是千方百计地挤时间去与学生作交流，因为这是课堂教学的延伸，这类讨论，往往更加自由和活泼，可以更为直接和深入地贴近学生、了解学生，对日后的教学大有裨益。

讲授传统文化的语言风格问题

本课程是介绍传统文化的素质教育课，为了体现课程的特点和授课风格，需要较多地并且是恰到好处地引用各种古典文献，如果远离文献管子像，就难以原汁原味地体现原典的思想。而对非文史专业的学生讲古文有相当的困难，由于教学时间的限制，所引用的文献必须非常精到，讲解时要十分简洁，否则讲授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是非常难处理的问题之一。

为此，我在课前总是精心选择原典中最具代表性的段落或者语句，在课堂上引用，以此帮助学生推阐原文大意，只要讲解得法，可以引起其课后阅读原文的兴趣。

即使是回答学生的提问，也尽可能从文献中寻找最为贴切的文句。例如，有学生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应该保持质朴的本色，何必要学习礼仪？”这种看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引《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语来回答，说明经济发展之后，人必然会从言谈举止等方面提出更高的标准，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总是会有相应的平衡。学生听后大多点头赞同，但还是有少数学生不以为然，于是我又引《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做进一步解释，儒家认为人的质朴和行为的文饰都需要，人必须

要有质朴的本色，但不能单纯强调质朴，不注意举止的文雅，那样会给人以粗野的印象，是与文明时代不合拍的；同样的道理，如果片面追求外表的文雅，而失去了自身质朴，就变成了“做秀”，同样是不可取的。儒家主张，只有既保持质朴的本质，又有文雅的言谈举止，才是君子的形象。类似的讲解，既从根本上讲清了问题，又使学生亲近了原典，从而有效地提升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由于在讲授过程中比较注重语言风格，学生反映较好，学生在对本课程的教学点评中说：“老师讲课生动，很吸引人”；“讲解生动，吸引人，知识渊博”；“生动有趣，学习资源很丰富”；“老师讲授课程既风趣幽默，又渊博儒雅”；“老师授课声情并茂、妙语连珠，用浅显风趣的语言把高深睿智的学问轻松道出，不仅拓宽了我们的眼界，也熏陶了我们的心灵，激发同学去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很有文化底蕴，有很高尚的人格，有很严肃的对待讲学的态度”；“除了说‘敬仰’，没有词能够形容对于彭老师渊博知识以及个人风采的钦佩与欣赏”；“真正提高了学生的素养”；“感觉精神升华”；“确实让人收获很多”；“授课内容切入角度独特，很感染人”；“老师很博学，在课堂中总是能讲出一些很有哲理的道理，而且老师在课堂上尽量给你一点继承中国古代文明的意识”；“希望老师继续延续现行的教授方法,现在已经非常好了”。

选修本课程的课容量，目前已经达到二百七十人，依然不能满足学生需要，教室最后总有站着听课的学生。也有的学生上学期已经选修过这门课，但本学期又来全程旁听，说是听一遍“不过瘾”。学生们不仅比较喜欢这门课，而且普遍希望将这门课程推广出去，他们在教学点评中说：“建议学校推广此课，多让彭老师做演讲”；“希望能把礼仪文化发扬光大”；“希望老师能让更多的学生听到这门课”；“希望老师和同学一起努力在清华发起一种找回中国古代礼仪的活动”。学生的教学反馈表明，本课程预设的教学目的基本达到，我们将继续努力，

希望能为在全国各高校推广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教育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增刊第1期）

第63节：礼仪践行与古礼寻访(6)

中华礼仪：

海外流播与国人疏远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在历史上，中国的礼乐教化、衣冠文物东传到朝鲜、日本，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唐代，高丽、日本大批留学生来华，中国的礼仪制度随之东传。另一次是明代，朱子学说在朝鲜取得正统地位，《朱子家礼》成为士大夫竞相仿效的礼仪，对朝鲜的乡风民俗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同样是接受中国礼仪最为系统的国家。时过境迁，如今这些国家是否还保存着古代的礼仪呢？这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1993年，中韩建交之后，笔者多次出访韩国。笔者的足迹遍及于韩国南北的城乡，所到之处可以感受到礼仪教育是韩国最传统、最基础的教育。在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庆尚道，有些家族还恪守着《朱子家礼》关于丧祭礼的规定；在全罗道的有些地方，居然还保留着古代的冠礼、笄礼、乡射礼，令人吃惊。限于篇幅，本文仅仅介绍都市中常见的交际礼仪。

韩国人的相见礼

中国古代把拜会他人叫“叩见”，见面时确实是要叩首的。如今，中国人在交际语言中偶尔还会说“改日登门叩首”之类的客套话，而叩见礼早已消亡。韩国不然，叩见的礼仪依然普遍使用。韩国人把初次见面时互相叩拜和自我介绍的仪式叫做“人事”。韩国人居家，坐、卧都是在地板上，坐姿依然与中国古代一样，屁股落在脚后跟上，上身正直。叩拜时，双方面对面，双手按在身前的地上，弯腰向前，头碰到地上，然后自报家门，说出自己的名字、身份等。礼毕，恢复正常坐姿。如果相见的人比较多，就围成一圈行礼。学生看望老师，也要行叩见礼，老师则要答拜还礼。到朋友家做客，见到长辈也要行叩见礼。

鞠躬也是韩国最常见的礼仪，彼此见面或者分别，都要向对方鞠躬。我在韩国参加过许多学术讨论会，发言者走上讲台，第一件事就是向听众鞠躬。电视台的主持人，在节目开始和结束时，也都要向观众深深地鞠躬致谢。同事之间也是如此。有一次，朋友陪同我参观汉城的“六三大楼”（高六十三层），适逢开高速电梯的小姐交接班，她们一位在电梯里，另一位在电梯外，两人面对面鞠躬，并互相问候；然后，互换位置，再次鞠躬，相互道谢，表现出十分和谐、亲密的关系。

韩国的行车礼仪也很引人注意。我多次乘坐朋友的汽车出入大学校门，门卫见到教授的车都会举手敬礼，而车内的教授也都会欠身致谢，或者举手回礼。在高速公路上，司机只要看到迎面驶来的是本公司的车，就轻按一声喇叭，并举手致意，对方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回礼。这种举止发生在汽车交错的一瞬间，却让人感到公司的亲和力。即使是不相识的司机，彼此也是彬彬有礼。比如，一位司机有急事，需要超车，希望前面的车让路；前面的司机知道后，一般都会礼让；后面的车在超过前面的车时，一般都会向对方司机摆手致谢。

在韩语中，礼貌用语非常丰富，也非常讲究。见到客人，主人一定先要问候，如“您好吗”“见到您很高兴”等。分别时，主客互道珍重，主人会说：“请安宁地回去吧！”客人则说：“请安宁地留步吧！”韩国人说话很有分寸，对尊长说话，绝对不允许用对平辈、晚辈的语言，一定要用敬语；相反，长辈对晚辈说话就可以用比较随便的语言。韩语中光是“您好”就有七八种说法，能否正确地使用，反映着说话者的教养。

韩国人待客的礼仪也非常周全。客人来访，主人都会端上水果等，主妇将水果削去皮后，剖成小块，盛在碗中，再放上专用的水果叉，客韩国人的待客礼人取用时既卫生又方便，与《礼记》中关于如何为客人削瓜的记载非常相似，真可谓是古风流泽。

商业性场合的礼仪更是讲究。在餐饮业，一些非常细小的礼仪，往往可以反映出从业人员的素养。有一次，朋友邀请我参观汉城的仁舍洞。仁舍洞是汉城著名的古玩街，类似于北京的琉璃厂。中午，我们随便进了一家饭店吃饭。女侍者用托盘盛着菜肴进门，在桌上一一放好，收起托盘后，她没有像通常那样转身离去，而是微微弯着腰悄然后退，直到房门旁，然后拉开门出去，再面朝前恢复常态。这一并不起眼的举动，使我感觉得到了尊重，内心非常之感动。在人际交往中，有谁不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呢？显然，这位女侍者深谙待客之道，懂得背朝着客人走路是不礼貌的，因而能在细微处体现出她的教养。

第64节：礼仪践行与古礼寻访(7)

韩国人的饮食礼

韩国礼仪非常注重突出老人的地位。老人卧床休息之前，晚辈都要为之铺好床褥，问寒问暖。每逢过年过节，晚辈都要向长辈行跪拜礼。平时老人宴席上，如果老人不抽烟，年轻人都不敢抽，只有得到老人允许，才可以抽烟。年轻人向长者敬酒，轻轻碰杯之后，要侧转身体饮酒，因为面对面饮酒是平辈之间的礼节。无论是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在地铁中，年轻人见到老年人，一般都会主动让座。韩国社会普遍流行的尊老风尚，正是从这些非常细小、具体的礼节上培养起来的。

诸如此类的礼仪成为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使得彼此的关系变得非常温和、亲切，人们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处处得到他人的尊重，从而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日本的孩子从小都要在家庭中受到系统的礼仪教育。例如，见到客人要鞠躬，鞠躬时要双脚并拢，双手紧贴裤线，弯腰的时间不得少于三秒钟，等等。日语中的敬语和谦语更是复杂，使用时有严格的规定，其难度足以令外国学生望而生畏。由于日、韩两国的礼仪情况非常相似，这里就不再细谈了。

除了韩、日两国之外，海外华人世界的情况又如何呢？本文仅就华裔非常集中的东南亚地区略谈一些情况。

东南亚的华裔长期脱离故乡，在异国求生存、图发展，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世代相传的中华礼仪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所以每每会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我曾经从东南亚华人报纸上看到整整一版“讣闻”，有一则讣闻说到，家属在处理死者遗体时，如何为之“饭含”、“小敛”、“大敛”；而从讣文的整个内容上来看，丧主已经入了天主教，不可能再按中国传统丧礼行事，但他们依然使用中华传统丧礼的词语。此外，有一则妻子死亡的讣闻，落款写作“杖期夫某

某”。“杖期夫”是传统丧礼的专门名词，表示丧主的父母已经故去、自己为亡妻服一年之丧。可见，中国传统礼仪的某些因子还非常顽强地存活在当代华裔的观念之中。

当然，毋庸讳言，由于他们生活在异国的土地之上，必然要入乡随俗，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原有的文化传统就会流失殆尽，成为没有“根”的族群。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局面。为此，他们不断从祖国大陆邀请学者前往介绍传统文化，或者撰写普及性的小册子，帮助他们的孩子学习和了解祖国的文化传统。

2002年，笔者应菲律宾华人团体之邀，前往马尼拉作讲演，主题是朱熹的礼学。没想到，我在上海飞往马尼拉的飞机上，就看到菲律宾报纸上已经对这次讲演发了消息，可见当地对这类活动的关注。讲演那天，听众很多，其中有专程从马来西亚赶来的，提问非常踊跃。有一位记者拿了一本朱柏庐的《治家格言》问笔者，要求介绍它的背景和价值。场面非常感人。

去年，马来西亚某文化团体给我来信，希望为他们撰写一本关于中华传统礼仪的小册子。来信说，这本小册子是他们的系列出版计划中的一种，读者对象是当地华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希望我尽可能写得通俗一些，有可能的话，最好配一些图。编撰这套丛书是一种公益性的活动，出版费用由华裔捐助，作者也都是尽义务，不取稿酬。我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最后，我们来看看到海外旅游的中国公民的表现。近年，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出国观光的国民越来越多，但是由于缺乏礼仪教育，许多人表现粗俗，没有修养，海外媒体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他们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喊叫，旁若无人；有求于工作人员帮忙时，毫无礼貌。每当从报纸、电视中看到这类报道时，我常常觉得脸上发烧。我们这个曾经向海外输出衣冠文物的礼仪之邦，如今在国外的形象居然如此，连礼仪文化的ABC都不懂，真是发人深思。为了改变这种令国人丢脸的局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2004年6月9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

后记

本书收入了我近几年撰写的十多篇文章，其中，有几篇是关于礼乐文化的讲演稿，还有一些是与这一主题相关的论文。最早建议我出版这本文集的,是郑州大学出版社的选题策划人孟巧颖女士。可是,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沉重压力,使我始终无暇来着手整理它。其后,中华书局编辑祝安顺先生也多次鼓动我结集出版此书,可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一再违约,迟迟不能结稿。而祝先生锲而不舍,不断给我提出新的交稿日期，令我深感惭愧,于是利用今年的寒假,日夜兼程,终于完成这部文稿的修订工作。

本书的修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有些讲演长达两三个小时,而节目播出的长度有限,所以做了比较多的压缩。由于同样的原因,有些媒体记者的访谈稿,在刊登时也多有删节。这类文稿都做了必要的恢复。二是讲演的主题都与礼乐文化相关,而听众则每次都不同,所以往往要先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背景。这些讲稿单篇出现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问题,而把它们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得重复芜累了。因此，这类文稿都做了删节和润饰。三是有些讲演并没有完整的文稿,只有一份提纲,现场也没有录音。这类文稿基本上是靠记忆追写成的。由于上述原因，彼此的风格不尽一致。传统礼学，学者历来惮其繁难，要在大众层面介绍礼学就更是难乎其难。若引用文献过多，则不仅有“掉书袋子”之嫌，而且令听众厌烦。若不引文献，则成无根之谈。为此，尽可能将大段文献消化成白话文，只将最关键的文字引出，这是折衷的方法，不得不为此。这些都是需要首先向读者朋友说明的。

书中还收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02级高雅同学撰写的《无怨无悔的礼道人生》一文。她是清华学生通讯社的记者,也是选修过我的课的学生,这篇文章是她对我的访谈,后来发表在《学生清华》上,其中提到了我的一些经历,关心我的读者或许可以由此了解我与礼乐文化的关系,征得作者同意,把它收进了本书。记得当年高雅同学采访我时,还是一个怯

生生的大一学生,一转眼,已经临近毕业,并且接到了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踌躇满志，行将赴美国读研究生,令人唏嘘不已。

本书所谈的内容，都是传统礼学的基本知识，卑之，无甚高论。但对现在的青年读者而言，却未必人人熟知。希望藉由本书的出版，让礼学成为大众的财富。

限于学力，本书的疏漏谬误之处，恐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提出宝贵意见。祝安顺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在此谨致三申谢忱之意。

彭林谨识于清华园寓所